

十周年扩展版

Kari Torjesen Malcolm
凯莉·托杰森·马尔卡姆

我们签下了 生死状

一个家庭如何为福音奉献一切



我们签下了生死状

We Signed Away Our Lives

© 2004 年 Evergreen Family Friendship Service (英文原本)

© 2025 年 Evergreen Family Friendship Service (中文电子译本)

中文电子译本出版发行: Evergreen Family Friendship Service

著 : Kari Torjesen Malcolm (凯莉·托杰森·马尔卡姆, 原名叶马利亚)

译 : 陈玲

责任校对: 刘澎、张颖

邮寄地址: Evergreen Family Friendship Service

6660 Delmonico Drive #201

Colorado Springs, CO 80919, USA

电话: +1 (719) 225 - 1366

<https://www.evergreenchina.net>

我们签下了生死状

We Signed Away Our Lives

[美] 凯莉·托杰森·马尔卡姆（叶马利亚）著

陈玲 译 刘澎 张颖 校

献给彼得和瓦波格·托杰森的十四位子孙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
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
述说给后代听。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
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叫他们仰望神，
不忘记神的作为，
惟要守他的命令。

-《新约诗篇》78章第4节、第6节、第7节

第一章 是血而不是钱	5
第二章 蒙召到中国.....	11
第三章 新婚先锋在河曲.....	17
第四章 黄河之歌唤我归家.....	24
第五章 在挪威平安度假.....	33
第六章 中国的战争.....	39
图片说明.....	48
第七章 任何代价都不昂贵.....	54
第八章 生活仍在继续.....	61
第九章 珍珠港和集中营.....	70
第十章 父母在内蒙古的事工以及在中国事工的继续.....	80
尾声.....	87
叶永青的遗产.....	92
10周年版后记	101
附录一	102
附录二	103
大事年表.....	104

第一章 是血而不是钱

“你们不是旅游者，”张医生强调地说，“我要告诉省政府，请他们不把你们看作旅游者。他们会理解你们都是河曲的儿女，你们需要回家看看。”

吃晚饭的时候，我弟弟哈肯[Hakon 叶但以理]就问来自山西的张医生说：“你听说过河曲吗？”令哈肯大吃一惊的是，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张医生说：“我不仅听说过河曲，我还负责那里的医疗卫生呢。”张医生答应帮助我和弟弟去河曲寻根。我们是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尽管当时这个城市并不对外国人开放。

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开放政策，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打算要回河曲。我一遇到中国学生，就问他们听没听说过河曲这个地方，但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倒也不稀奇，因为当初我的父母作为传教士，确实要求去一个没有人传过福音也没有人愿意去那里传福音的地方。

河曲是山西省最偏远的地区之一，位于山西省和内蒙古的交界处，那里的沙漠阻隔了来往的交通。河曲县有一万人左右，是全中国最贫穷、教育水平最落后的地区。1921 年我的父亲就是要求来到这里。现在当我和弟弟与张医生坐在一起，想到父亲当初的这个决定，直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就禁不住哑然失笑。

我们要回河曲，就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大使馆给每一位来华的外国游客都发一张地图，上面清楚地标出每一个开放的城市。言外之意就是，外国游客不能去其它未标明的城市。河曲就是一个不对外国游客“开放的”城市。此时，上帝预备了一位“使者”来帮助我们。

1987 年，来自山西的儿科医生张佩英大夫，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看望她正在读博士学位的儿子。在那里，张大夫见到了一位名叫卡罗尔·霍恩[Carol Hone]的教师，这名教师曾义务帮助她的儿子学英语。当张大夫了解到我的弟弟哈肯也来自山西，和她是同一省的人，再加上知道我的弟媳卡伦[Karen]也是儿科医生时，就请卡罗尔介绍他们认识。他们见面之后，哈肯就打电话让我也过来参加这个山西人的联谊聚会。如果不是卡罗尔老师我就无法认识张医生，而没有张医生的帮助我们就回不到河曲。上帝的“使者”使我们回家的梦想变为可能。当张医生回到山西后，她就帮我们办去河曲的手续。之后不久我就和丈夫还有弟弟和弟媳确定了 1988 年回家的日期。

期待与回忆

随着去河曲的日期日渐临近，我们的期待也与日俱增。离开河曲这么多年了，我不免心生疑问，我当年的朋友如今还在吗？我父母建立的教会如今还在吗？当地的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和我们这些老外交谈吗？我们还能找到父亲的坟墓吗？

与中国的基督徒失去联络这么多年，我总是揣测，在那里外国人的坟墓到底

无声地传达着什么信息呢？我们家在中国有两座坟墓。我父亲的墓在河曲，我外甥戴维[David]的墓在甘肃兰州。我想了解，每逢当地人路过这两座坟墓时会产生怎样的追思。

我的这种想法到了 1986 年就变得愈加强烈起来。那年我拜访了当初与父母一同在山西宣教的同工坦特[Tante 阿姨]赛纳[Signe]，她是一位独身的基督徒姊妹，住在挪威奥斯陆的退休传教士之家。我去拜访她，而她并没有太多的时间与我闲聊：

“你能想象我去中国宣教是多么的光荣吗？”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她的思想和灵魂显然脱离了八旬老人孱弱身体的限制，又回到了当年她作传教士的伟大岁月里。

“凯莉[Kari 叶马利亚]，想想看，”她说，“我那时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挪威女孩，才二十出头，正在接受护士培训并在圣经学校读书。但是上帝却呼召我去中国。当我听到这个呼召时，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竟也配为神的国度效力。”

“凯莉，坐近点，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我坐到她床边，她就朝我斜过身子继续讲。虽然我以前听过这个故事，但是每次拜访她并听她讲述这个美丽的故事时，我总会激动不已。

她从来没有说过她为什么吊着胳膊，也没有告诉我她为什么被困在床上。对赛纳来说，有人能为她在中国的经历前来拜访她，实在是太宝贵了，她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讲述自己的病痛上。她告诉我她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为要养育一个家庭，而是要在上帝福音化中国的伟大计划中扮演一个卑微的角色。

“后来我就去了英国，开始接受中国内地会的培训。就是在那儿我签下了生死状，承认我是心甘情愿地前往中国，准备像从前的殉道者一样为耶稣而死。耶稣值得我付出一生，甚至是我的生命。我甘心乐意地签下名字，没有想过要再回到挪威。我非常盼望能像你父亲那样死去。为耶稣而活、为耶稣而死是何等的荣耀！”

每次从坦特•赛纳那里回来我都为父母和他们的同工们所留下的精神财富而心怀感激。在我幼年的那个年代，为耶稣而活、为耶稣而死是清教徒从上帝那里接受的最高呼召。我们所寻求和切慕的就是能够完全被主使用，被差遣到任何属灵战场的最前线，丝毫没有出于个人的意愿和想法。父母那个时代的传教士有着超越自我的神国异象。

父母的人生准则

我父母的这种世界观可以从新约圣经腓利比书 1 章 20 节中得到一个概括：“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保存着父亲当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随身携带的圣经，他在这节经文旁边以工整的字迹写着：“为了中国的座右铭(MOTTO FOR CHINA)，1918.”。

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故事的主题，它也是我父母一生的写照。对他们而言，基督是值得他们献上生命的，但他们并不经常谈起这些。无论在我们家还是在其它

传教士的家中，饭桌旁的交谈总是充满喜乐的。作为福音的先驱者，他们在全新的环境中彼此分担传教的工作，不仅精神振奋，有时也会闹出一些笑话。比方说，我们有时会被看成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精灵。有些中国人会摸一摸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人。有一位妇女，在确定了我母亲是真的人之后，甚至掀起她的长裙，看她里面穿了什么。当她看到一条粉红色的丝衬裙时，她说，“你应该把它穿在外面。”只要不冒犯对方，这些小小的文化冲撞，总会使人忍俊不禁。

当传教士们祷告“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时，他们可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对我的父母而言，这个祷告意味着他们准备以自己甚至是以自己孩子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神国在中国的降临。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针对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的起义，导致 189 名传教士的殉道，包括 52 名儿童。这场大屠杀依然记忆犹新的时候，我父母到达了山西。

实际上，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山西在义和团运动中伤亡惨重，失去了 159 名外国传教士，占在这次叛乱中 189 位殉道人的绝大部分。但是危机已经过去，那位白发苍苍的牧师镇静的宣告实现了，他用最后一口气说：“国家会消亡，但基督的教会坚不可摧。”

为逼迫而预备教会

这种对上帝的信心和殉道的愿意传递到了中国教会中。传教士们没有想到在 1949 年以后中国向传教士们关闭了大门，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毛主席执政后中国将要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主预备他们操练中国的基督徒为耶稣而活为耶稣而死。他们无意中告诉了他们约翰在启示录中所讲到的士每拿教会所遭受的逼迫：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 2：10）

透过像我父亲这样的传教士们的死，无条件的爱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因为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 15：13）其他像我母亲一样的人，痛苦地看到中国的大门向他们关闭且从此不允许再回来，不允许向他们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们献出自己的爱。

尽管带着失望被逐出中国（很多传教士正处于他们事业的顶峰），这 8000 位弟兄姊妹仍然是一群独特的、有权柄的人。在那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起到的作用一就是在帮助中国的教会来迎接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其将要带来的逼迫。

但是他们知道了又能如何呢？如果那一代中国的传教士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整个情况会有所改变吗？我不知道。但是即使在上帝的旨意中他们并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虽然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有多么重大的意义，靠着上帝的供应，他们仍然成就了神的国度的旨意。

这将我从把父母那代传教士理想化的危险中释放出来了。我并不想写一本圣徒传，但是我只想写在历史中占有独特地位的 8000 名传教士的故事。他们都是罪人，和我们一样面临试探。（林前 10：13）他们中间很多人本不该被差遣到海外，但他们被那个时代的精神所感染，想要在中国的福音中有份。很多传教士也陷入当时的殖民心理。所以我所讲到的故事并不是关于一个完美的传教士群体，而是一群为了满足那段时间的需要而挤进上帝恩典中不完美的人。

一个讲了很多次的故事

当我讲到一个家庭，我们家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毛主席执政前大多数在中国的传教士家里发生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不知道记录当时中国的事工情况，所以我有这样一种感动要讲述一群平凡人所做的不平凡的工作。

所有 1300 名传教士都在中国内地会签下了“为中国而死”的生死状。我还清楚地记得约翰和贝蒂·斯塔姆[John and Betty Stam]的殉道给事工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震撼。他们两个都被奇妙地预备而献上了生命。贝蒂比约翰先到中国，读完语言学校后被派到安徽阜阳传教。她 1932 年到达那里，在此之前有一位年长的传教士被红军抓到深山。从此后再没有人听说过他。所以贝蒂也有可能殉道。

在语言学校里，有一首诗对约翰很有帮助，那首诗中写到一个传教士在中国北部死于非命。那些人手里拿着枪问这位传教士是否害怕，他回答说：不，如果你开枪，我就直接上天堂了。这首由中国传教士 E. H. 汉密尔顿[E.H. Hamilton]写的关于殉道的诗对约翰斯塔姆意义重大：

害怕？怕什么？
怕见救主之面？
怕听主声欢迎？
荣耀在恩典的破口中一闪而过？
害怕？怕什么？

害怕？怕什么？
电闪，坠落，心被刺破，
黑夜，光明，天堂的杰作！
伤口乃是主的印记
害怕？怕什么？

害怕？怕什么？
要做以死亡而非偷生才能成就之事——
用鲜血浇灌无情的土地来行施洗，
直到一个个灵魂蒙恩就地绽放。
害怕？怕什么？

约翰和贝蒂已经预备好“用鲜血浇灌无情的土地来行施洗，直到一个个灵魂蒙恩就地绽放”。这件事发生在红军长征到西北的时候，长征以红军的英勇著称，同时也让百姓经受了战争。战乱给一些百姓带来极大的痛苦。斯塔姆全家，包括刚出生不久的女婴在他们被差遣的地方刚刚安顿下来，这座城市就遭到了袭击。斯塔姆全家被捕。第二天一早，（1934 年 12 月 7 日）约翰和贝蒂并排跪着被砍头。一位基督徒医生因为竭力为他们求情也殉道了。女婴被奇迹般地忽略而存活下来，被中国基督徒救了。

当约翰和贝蒂被杀害后，红六军团已经转移到贵州省，中国内地会的其他两个传教士被当作“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而被捕。他们被迫参加长征。当我还是

个小女孩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在为他们祷告。有一个人在被捕 413 天后获释，此时另一人对他说：为我祷告，使我能放胆传扬基督。他这样做了，直到几个月后他被释放。

在日本侵华前后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所有的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都知道为基督而死是非常可能的事。因此他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使这种献身也可以服务于中国的基督徒。

为基督铤而走险

朋友们问我为何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危险的刀刃下而不灰心丧气。记得我父母及他们的同工们在参加了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之后，就好像从只考虑个人存亡的自我中心的桎梏中被释放了出来。对他们来说，个人满足或安全感只是某种需要而不是最终目标。他们认为受苦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想尽一切办法去逃避，正如我父母的同工所说的那样：“我们为基督铤而走险，从未想后退半步。我们为自己必须做的工作而感到无比兴奋。”

他发自内心地笑着说这些。我无法想象面对生命的复杂，一群这样的人还能开玩笑甚至大笑。在传教士的聚会中总是充满这样属灵的喜乐，这强烈的喜乐缘于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并且是神所喜悦的。

“我喜欢听你父亲讲故事，”这位老练的传教士继续说，“你知道，他讲故事总是发自内心地笑。他告诉我们他老家克里斯蒂安桑那些古怪的人物，我们的思路就跟着他来到了那里。他从来不会心情沉重地讲。强烈的确信，是的，严肃却不乏风趣。”

母亲，我们挪威人称为妈妈[Mor]，有着自己喜乐的方式。她来中国的第一天（1921 年 1 月 17 日），由于到达目的地的过度兴奋她彻夜未眠。她给家里写信说：“上帝的慈爱环绕着我，我就在那里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赞美感谢我的天父……想想啊，我在中国啊，应许之地！”

这种喜乐饱含了母亲的使命感。她感到被呼召加入到中国的福音事工中是她无上的荣耀和权柄，因着伟大的呼召而带来的属天喜乐湮没了她对可能出现的死亡的焦虑和沮丧。母亲和同工都不许自己被生活的琐事所缠累，相反，她们很严肃地对待耶稣的提出的问题：“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太 6: 25）

在物质需要方面我的父母看的很淡，因为按着内地会的政策，他们不会让传教士窘迫到自己供养自己的地步。传教士为他们的物质需要向上帝祈求，但他们不会公开地表达自己这方面的需要。宣教资金都是平均分配给所有传教士，致使他们有时贫乏有时富足。只有几件衣服、几乎没有任何财产的简朴生活让他们更容易集中精力在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上。

这种观点大大影响了他们对宣教的理解。今天太多的情况是，将宣教等同于金钱的资助，或当地教会的宣教预算，而不是听到上帝的呼召：“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之后，离开教堂的舒适长椅，走出去顺服上帝的呼召。与挑战基督徒顺服上帝的呼召—甚至献上生命相比，筹款似乎更容易做到。

与之相比，对前辈及我们而言，宣教就意味着流血，而不是筹款。“殉道者的

血是教会的种子”对于父母和他们那一代的传教士而言，这句话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对于已计算好了开拓国度代价的人而言，殉道的可能性非常大。

家人团圆

当我父亲于 1940 年元旦在河曲入葬时，我们这些孩子们还在芝罘海边的寄宿学校里。但妈妈注意到了朋友们送来的挽联里有一个带着我们签名：爱德华 [Edvard 叶保罗]，凯莉，哈肯和托杰[Torje 叶属基]，上面写着：“为了你所给予我们的一切一向我亲爱的父亲[Far]致以最后的敬意。”然后用大字印刷体写着：“一切为了耶稣” [IT WAS FOR JESUS' SAKE]。

42 年以后我们四个在挪威奥斯陆母亲的墓地举着这个挽联留念。这是个宝贵的遗产——我们父母生命的主题——有一位神值得我们为之而活，为之而死。托杰，我们中唯一在挪威定居的孩子，和他妻子赖登[Reidun]在他们家举办了一次家庭团圆聚会。我们分散在四大洲，虽然我们平常也会走动，但这是第一次每个人带着自己的爱人在一地相聚。这成为全家团圆的激情时刻，激发了我们写此书的热情。特别是我们在挪威这片土地上回忆整个故事，而这里正是故事开始的地方。

第二章 蒙召到中国

对我父亲彼得·托杰森来讲，他 17 岁时，生活发生了转折。那是个特别的教会聚会，他听到了路德维格·霍普，一个著名的挪威宣教倡导者，提到在中国所有福音未达之地的名字。

当布道会结束后，开始奉献，似乎我父亲只有一件事可做。他打开钱包，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奉献。但他觉得自己应该奉献得不止是刚才那点钱。于是，他找到一张纸，在上面写下：“还有我自己” [*Og mit liv*]。在那次敬拜中，他拿出了为数不多的金钱和他自己的一生作为为神国的事工降临到中国的奉献。

那天清点奉献捐款的人正是彼得的主日学老师，他一眼就认出了彼得的字体。他决定保留这个纸条，想看看父亲如此不同寻常的承诺将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他过去一直在为彼得祷告，但是在看到这个年轻信徒向上帝发出的誓言后，他的祷告又有了新的意义。

故事的开始

彼得·托杰森[Peter Torjesen 叶永青]是爱德华和埃莉斯·托杰森[Edvard and Elise Torjesen]的孩子，出生于 1892 年 11 月 28 日。他们在家乡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以敬虔出名。爱德华接任他父亲的位置，负责管理打扫烟囱，也就是确保全镇的烟囱都可以定期得到打扫。大家希望我祖父托利夫[Torleif]在为各家打扫烟囱的时候可以读圣经和为他们祷告，就像他父亲一样，并希望他的儿子托利夫也是如此。所以他既打扫各家的烟囱，也清洁他们的灵魂。

我记得当时镇上的一位长者说：“每次托利夫到来，和平也随之而来。他在打扫烟囱的那个家中还做祷告服事。”然后她说起每次扫烟囱前，总是提前把报纸从门口的地板一直铺到起居室桌子下（以防烟灰弄脏地毯），起居室的桌子上总是铺好白色的台布，摆上咖啡和糖果，当然还有一本圣经，等候扫烟囱的托利夫来开始他的服事。“托利夫和人们交谈并劝慰他们，他总是有合宜的言语劝勉他们。”另外一位长者补充道。还有人向我讲起他拜访我父亲和他哥哥托利夫长大的那个家：“那里特别有圣灵的同在，是一个美好的家。”但我祖母并不觉得非常美好，她总是抱怨枕套脏得快。“好像他们流的不是汗而是烟灰。”

这么多的烟灰，加上一屋子要养活和清洁的男孩子，我的祖母总是垂头丧气的。我祖父建议说：“别理会那些烟灰和你的家务，穿上外套去贫民窟体验一下。”祖母一回来就不得不承认：“哦，我所拥有的一切是何等美好！我看到了有人在醉酒和贫穷中挣扎，我再也不抱怨了。”

我父亲后来在他的布道会上提到他的属灵遗产：

我出生在一个信仰基督的家庭里。家中有 10 个孩子，8 个弟兄，2 个姊妹。每天早上母亲都召聚我们一起读经祷告，父亲则每天以上帝的话语来结束一天的生活。我的父母都有宣教的意识，我从孩提时就有很深刻的印象，成为一个传教士是人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我还记得十一、二岁的时候从主日学

里我开始和上帝建立关系，主日学成为我当时的敬拜……

我的姐夫爱德华·杰勒德[Edvard Gerard]在1910年前往中国宣教。他过了不久就因病归回天家。在他出发几年前，他邀请我去一个他和很多青年人每周参加的祷告会。因为他的邀请，我没敢拒绝。我知道这就意味着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那时我刚刚毕业参加工作，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强烈的情感在内心震撼着我，第一次祷告会的时候其他人都祷告完了，等着我祷告，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求神帮助我。”第二次的祷告会开始，我就和天父建立了关系。

那时候镇上相当多的男孩子愿意接受耶稣。他们经常在彼此的家里聚集，查经祷告并且参加各种形式的社区服务。彼得参加了一个年轻人的小组，他们在1909年建立了一个青年弟兄联谊会，这是这些年轻人跟随耶稣的开始。他们是基督教青年会管理下的“青年”[Ynglingen]，一个复兴的团体。

但这次我父亲刚刚从商学院毕业，在当地一家公司工作，做图书管理员、出纳、文员、挪威语、英语和德语的通讯记者。他在这个职位上做了两年半，然后在1911年，来自在美国的挪威自由福音教会[Norwegian Evangelical Free Church]的迪特里克·安德森[Ditrik Andersen]和德尼思[C.T. Dyrness]在克里斯蒂安桑镇上开设圣经课程。彼得参加了，三周课程结束后，他前往美国，为他即将奋斗的禾场——中国而预备，就是当初上帝呼召他去的地方。

但在彼得启程前往美国之前，他注意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和他一样有信心地前往祷告屋[bedehuset]。他们虽然住在同一条街上，相隔一个半街区，但在参加祷告会的路上却走在街的两边。他们同年出生，小的时候一起玩。作为青少年，他们对宣教非常认真，刻意保持一段安全距离。他们不愿意让任何事使他们分心，影响他们全心全意地服侍神。

我与克里斯蒂安桑镇上那些记得我父亲的人交谈时，他们告诉我，父亲年富力强，是个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但因为信主而放弃了这项运动，因为比赛总是在星期天举行。女孩们注意到了他，但他无暇顾忌到她们。女孩子抱怨说：“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把生命朝着认识上帝的方向努力了。”一个退休的校长对我说：“他也曾注意到陶波得格滕街上的那位女孩，但我们谁也不敢拿她取笑他。”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瓦波格·托尼森[Valborg Tonnesen 端正方]生于1892年6月22日在陶波得格滕[Tolbodgaten]。她是船长的女儿，3个孩子中的老大。她的父亲在海上遇到风暴，沉船失踪。那一年，大家都盼着他回家过圣诞。当时瓦波格只有6岁。和她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翘首期盼着，但他们的爸爸再也没有回来。许多年后他们父亲的船在北海[North Sea]海底被发现，随之沉没的还有父亲常在甲板上弹奏的、带领船员们一起唱赞美诗时所用的风琴。

小瓦波格像宝贝一样珍藏着父亲的一封信：

写给我亲爱的女儿！爸爸现在一切都顺利，因为耶稣每天恩待我，使我健康而充满活力，我为此感谢他。现在你和妈妈必须感谢他，祈求使爸爸能回家

见你们。爸爸每次听到你对妈妈很好都很开心，耶稣同你们在家中，你妈妈告诉你的圣天使们也都在你们中间。你要代我向你的老师转达爸爸的问候，告诉她，听说你唱诗赞美耶稣，爸爸很高兴……

好好生活，

你的爸爸

外公给家里留下了一个可爱的两层砖房，我外婆[Mormor]一辈子都住在那里。她靠楼上那层屋子的租金生活，那时还没有寡妇抚恤金。为了养家糊口，外婆买了一个编织机，开始接单织衣服。小瓦波格是送货员，她告诉我，为了完成订单，她当时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跑着送货是多么辛苦。脚步临近房前的人行道时，她就会告诉自己说，只需要再迈一步！她每次都是这样鼓励自己。这就是她怎样操练“一次一步”。

为了贴补家用，妈妈 17 岁时进了当地的一个进出口公司，不久就成为了当地店铺的主管。20 岁的时候她得到了一份在镇上最大的百货公司服务的工作，在那儿她也升为了主管。当她出发前往中国时，她的前任老板成为她最慷慨的支持者。当她被童年的贫困刺痛时，她总是会回想那些年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她经常和那群年轻的基督徒朋友们坐雪橇或乘火车出去，通常是参加复兴大会。在这种集会上，大家总是开心地唱诗、生动地做见证。

当妈妈看到宣教事业的巨大需要时，她意识到自己必须受更多的教育，于是于 1916 年进了护士学校。一位令人景仰的外科医生非常赏识她，在推荐信中称她“动作敏捷” [snar l snuen]，她也是他最赏识的麻醉师，因为她总会给病人讲故事，使病人放松直到麻醉工作结束。

重大的决定

同时，父亲被迪特里克·安德森推荐到明尼苏达的拉什福特[Rushford]的圣经学校深造（现在伊利诺伊州戴尔菲尔德[Deerfield]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前身）。父亲写道：“师生中间有一种清新的活力，并且敞开心扉，这让我难以忘怀，且满怀感恩和喜乐。我在拉什福特度过了三个冬天，直到 1913 年我们作为第一届毕业生毕业。那时我得到了与自由公理会一起工作的机会，但因为宣教才是我的最终目标，而我当时还不够做传教士的年龄，所以就去穆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继续深造”。

由于中国的大门仍未敞开，在 1916 年的秋天，他来到芝加哥的北浸礼会神学院[Nor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在那里他接到了祖父从挪威发来的电报，让他回去服兵役。于是他停止了读书，回国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很快应召入伍：“1916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10 点，到奥德罗恩[Odderoen]的新兵训练营集合。”

接下来的两年里，父亲重新认识了瓦波格·托尼森，5 年半的时间里，他心里一直珍藏着她留给他的美好印象。一次，奥斯陆的护士培训学校放假了，她回到镇上。假期结束的时候，父亲在火车站为她送行。突然他决定跳上火车和她一起走，他已经等得太久了，就在那时他向她求婚了。朋友们期盼他们订婚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在镇上举行了庆祝活动。父亲的哥哥戴维常说：“如果你能跟瓦波格

在一起，一切就会顺利发展。”

结婚计划已经定好，父亲的兵役也已结束，父亲就向挪威会[Norwegian Mission in China]提出申请，该组织由内地会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在挪威创立。戴德生的观点是欧洲国家应该有它们自己与中国内地会联络的宣教机构。父亲和他的未婚妻与分散在各地的祷告团体越来越熟悉。他们是宣教机构的中坚分子，他们在面对另一个长期分离之前，在巴尼厄亚[Baneheia](克里斯蒂安桑镇的情侣大道)一起走了很多次。

出发前往中国

1918年父亲在去中国的路途中路过美国时，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挪威自由福音教会也已经准备好任命他了。当然，他可以在挪威被任命，但这就意味着他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满足传道的需要，他当时很渴望尽快到达中国。

就在那一年，他选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圣经章节。在来中国的路上，他在腓立比书1: 20的旁边写道：“

中国座右铭 1918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教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

然后他参加了中国内地会指定的两年汉语课程。先参加语言学校，由一个导师负责帮助他，语言学习从未停止。汉语里大概有6万个单音节的字，如果一开始不学会两千个，就无法阅读新约。

当父亲在中国学习的时候，母亲正在奥斯陆的圣经学院[Indremisjonen's Bible School]完成她的护士学习，并在英得勒米斯乔恩圣经学校学习一年。随后她到伦敦和内地会一起接受为期四个月的培训，1920年年底，她和另一位来自俄国的内地会女传教士一起登上了一艘开往中国的德国邮轮，开始为期七个星期的旅程。最后，她从上海写信：“现在我非常开心，一切都好，这是到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入口。”

当母亲还在海上旅行的时候，父亲从山西写信道：

上帝帮助我在四五个星期里走访了40个村庄……与人交谈很容易，在这儿比在家里容易。在这里心底刚硬拒绝真理的人并不多，我想上帝一定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因为我比从前任何时候身体更健康，灵里更喜乐。

语言学习

虽然父母都在中国，但是他们已有几周没有见面了，母亲从上海出发到江苏扬州参加语言学校的学习，父亲到达山西不到三个月，在那里见到了未婚妻，她在那里继续自己的汉语学习，父亲后来向我们抱怨说，她甚至不允许他在饭桌上向她眨眼睛，因为这在中国传统里不合宜。母亲写信给外婆说：“聚在一起真的很好，要是从前也能在一起就更好了，这四天过的真快，非常的精彩，我们也为这四天感谢上帝。”

内地会也要求所有的传教士不论男女结婚前必须在语言学校学习两年，为什么呢？

那时内地会还不接受夫妻都做完全独立的传教士，即使在今天，很多宣教机构也仅仅把妻子看作丈夫的鼓励者，而不是直接安排在自己的传教地区工作。但是内地会看到了中国福音化需要妇女的参与。如果妻子要成为运动中的一分子，她们也需要懂得当地的语言，但是很多人认为一旦夫妻有了孩子，妻子就必须面对家里的很多责任，很多事就必须放弃，诸如语言学习。所以戴德生定下一条规矩：只有单身男女才可以加入宣教事工。如果没有完成两年的语言学习，是不可以在中国结婚的。于是，每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是单身，这样就不用很麻烦地在住宿上区分单身和已婚了。

这个规矩很合理，但也很难做到。等待母亲两年的学习时间，意味着父亲要在中国单身四年，直到 1923 年 1 月 17 日才能结婚。母亲在 1921 年 1 月 17 日到达中国，一旦两年结束，谁也不愿意再等一天。

今天，等待两年才能结婚实在是不可思议，但对于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工来说，这是将福音带给中国的传教事业的组成部分。在单身的日子里，父亲写信回家说：“去年秋天我第一次感到时间如此漫长，我是唯一和中国同工在一起的外国人，我们一起传福音，但我并不感到孤独，和他们一起四处奔走的时候，我的灵魂充满了奇妙的平安。

山西饥荒

在 1921 年的春天，父亲被中国政府要求在山西的饥荒中协助铺路。红十字会拿出 100 万元中国的货币，支付成千上万的铺路工人的工资，工人们出来做工是为了保护家人，免得他们饿死。我的父亲和其他两个传教士被指派轮流为给省里的机动车公路第一路段做发薪员。但是，这场表演的明星却是未来的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lwell]将军，他是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ttee]从部队借调过来的。

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在她的著作《史迪威和他在中国的美国经历》[*Stil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写到他的此次参与：

听说有修路工程，非常想找个机会出去，用他刚刚学会的汉语。他就主动申请了这个工作……这个工程计划修成一条 82 英里长的公路，沿黄河从汾州一直修到军渡……他有 12 个外国助手包括一名标准石油[Standard Oil]的工程师，一位瑞典采矿工程师，两名挪威传教士还有一个英-印裔预备役军官。

同年，母亲作为一名护士也见证了这场饥荒，她写道：

每天都会有几个病人过来，你无法想象帮助别人是多么美好，有些天会从灾区过来一大群的男女老少。有时我们这里可能会有 30 多人在这儿留宿吃饭。很多人病得很可怜，我们都不忍心看到他们。

父亲到达河曲

和红十字会一起工作后，那时他已经来到中国 3 年了，他打算建立一家他自己的服务站，他就要求被派往最艰苦的地方，也就是没有教会也没人愿意去的地方。刚好那时需要一个人到山西省的西北部地区去传教。在河曲，黄河从西边将山西和陕西分开，从北边将山西和内蒙分开。父亲确信自己得到了神的呼

召来到那里。他骑着骡子走了 5 天，终于在 1921 年 5 月 21 日到达了河曲县城。“河曲”这个名字具有双重含义：黄河转弯的地方，或者更深刻一点——黄河之歌。

父亲不久就发现，以前有一个瑞典的传教士到过那里。在义和团起义期间被杀（在山西南部），人们依然记得他，但是宣教效果并不明显。

对父亲来讲，他一定是很清醒地踏着殉道者的足迹前往那个地方。当父亲选出腓利比书 1 章 20 节作为他的中国座右铭的时候，甚至更早一些，当他 17 岁为了中国许下“还有我自己”的诺言时，难道不是怀着同样的承诺吗？

怀着开拓福音新土地的热情，父亲开始在他的住处开会，而且受邀给罪犯和警察讲话。在 1922 年 3 月 12 日，河曲新建的教会迎来了第一次洗礼，3 人受洗。一位是警察局长的秘书，还有邮局局长和一个看门人。

后来他写下了前往内蒙古的经历：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河水清澈碧蓝，两岸高树耸立。我第一次在渡船上看到蒙古人，他们戴着项链和手镯，穿着皮鞋。其中有一人是同路的喇嘛……所以我们要一起旅行。

但是当他于 1922 年在静乐拜访他未来的新娘，她似乎更关心他的身体状况，远胜过传教工作的发展。她写道：

彼得一个人在河曲，上帝与他同在，他能在圣诞节过来真的很好，因为我们这里用两周时间刚刚为他培训了一个新厨师。他原来的厨师就只会做一种饭，早餐和晚餐，彼得吃的都是米饭。现在可以有所改变了。我列下很长的一个清单，上面都是这个新厨师会做的食物。到目前为止，彼得只有一个杯子和一个瓷釉盘子。我又送了他几个碟子和厨具。

难怪父亲开玩笑说，他无忧无虑的单身生涯结束了。

准备结婚

那时候母亲以不同方式体味着她的孤独，她写信回挪威：

我已经 30 岁了，还没有结婚，这在中国人简直都无法想象。这边的女孩子会在 12 或 13 岁就把自己嫁出去。所以当我们在拜访的时候，一个新来的女人走进房间，其他的人都大叫道，“瞧她，已经 30 了还没结婚。”有一天在一个漂亮的家里，4 个媳妇用既惊讶又嫉妒的复杂眼神看着我。年龄最大的那个说：“到现在你能保养这么好真是太了不起了！你都 30 了还没结婚。”她觉得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我很快就要结婚了，但是我没告诉她们，否则我们的谈话就没完没了了。

这封信写于父母结婚前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后来就在山西岚县举办了挪威传统的婚礼。婚宴上他们有用鸡胸脯做的肉丸子，手工剁得很好，这是中国菜式，但吃起来很像挪威的鱼丸。当地官员的太太派她的厨师过来烹饪助兴，给婚礼带来了一丝官方气息。那个官员是中央政府派驻到当地的代表。

第三章 新婚先锋在河曲

托杰森夫妇的蜜月是前往河曲的旅行，母亲写道：

我们的旅行很美好。既不冷也不刮风，这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个时节所能出现的天气。上帝在各样的事上都为我们预备好了。最后两天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山上颠簸。6天后，我们在周日的晚上到家了。能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真的很好。我们的中国朋友让一切变得很喜庆，我们的屋顶平平的小院在阳光下绽开笑容，如此热烈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在我们的新家的门上，基督徒在上面写着一句格言：“主恩无限[GOD'S GRACE HAS NO LIMITS]。”

尝着他们所预备的美味中国菜肴，我觉得自己很受欢迎。后来我们又为祷告会做了一些预备，我们在家里的每个窗户都挂起帘子，桌子上铺着桌布。

在主日，我们从上午到下午都有聚会。第一次有妇女来到河曲的教会，这看起来很奇怪，尤其对男人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单独待在那里。我们在男人和女人中间挂了一个绿色的帘子将他们隔开。在帘子后边你能听到女人或喃喃而语，或大声交谈。如果在保罗的时代，保罗无疑会叫这些妇女们在敬拜的时候保持肃静。（林前 14：34-35）

河曲和哥林多

真有意思，母亲居然把河曲的妇女和哥林多的妇女联系到一块。当神学家为哥林多书的意思辩论了两千年的时侯，妈妈却在真实的事情上上了生动的一课。

两个地方的两群妇女（尽管时间的跨度将她们分开）有着很明显的共同点：妇女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压迫和缺乏教育，在中国，1949年之前妇女的地位之低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情况在1911年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之后还是没有太多改变。传统习惯和道德观是由孔夫子（公元前551-479年）在他的著作中定下来的。他可从来没说过女人的一句好话。在中国的宇宙论里，世界被分为两部分：阴（女）代表一切黑暗、软弱和消极；阳（男）代表一切强壮、光明和积极。

由于妇女的社会地位仅强于奴隶，妇女和男人公开地混坐一起是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的。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个妇女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就像我母亲一样，可以被邀请作为自己的客人。那第一个主日对河曲的妇女来说意味着一种神定的 [*kairos*] 机会，我可以想象我的父母所经历的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讲：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赛 9：2）对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妇女来讲，这是她们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她们甚者手足无措，因为她们从来没有去上过幼儿园，甚至连小学一年级都没有上过，所以她们的母亲们也没有用类似下面的话来教授给她们：“现在安静地坐着听老师讲话，不要插话。”

对河曲的妇女来讲，和其他妇女聚会就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来聊天和捕捉新闻。因此她们就在那儿聊天（哥林多前书的 *laleo*）。后来到她们开始认真听的时候，她们总是提出各样的问题来打断讲道。我母亲就会走过去低声对她们说：“等

一下，结束后我会和你谈。或者等回家后和你丈夫讨论这个问题。”像保罗一样（林前 14: 35），她总是鼓励夫妻之间讨论属灵的话题。这在中国的长者中从未听说过，在哥林多的长者中也未曾听说过。

新娘在河曲安家落户

刚到河曲，母亲就这样被抛到一个现实中的时候，她并没有和其他的现实失去联系。就像她所写的那样：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们为让一切就绪而非常忙碌，在住处和接待处都是这样。一个单身汉接待处是非常特别的。如果你见过它，你就不知道是该大笑还是大哭，但现在已经一切就绪了。你难以想象我们得到了一个多么惬意舒适的小家。在客厅我们居然拥有木地板！我们还有一个房间作为诊室。许多拜访者来到为了看热闹，却分别被迎到男女接待室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想来看看我们的家，所以我们的家里就挤满了人……在主日我们的教会也满了。

一个单身汉之家需要如此多关注的原因是父亲完全投入到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中，那就是有一颗愿意的心，给予另一个人想要的任何东西。我们孩子们听说那时候有人想要家里墙上的挂毯，父亲就毫不犹豫地摘下来送给了人家。不论他的墙是不是和他的厨房一样光秃秃的。我们还听到了关于一套帅气的白色丝绸西装（那时最时尚的男装），这是当年母亲用她微薄的津贴为她的未婚夫买下的。她告诉我们他穿上那套西装有多帅气，他有着宽宽的肩膀和健壮的体型。但是毫无疑问，另一位传教士向他要了这套西装，活在文明的边缘就像他以前那样。他要这丝绸西装真的有用吗？所以那珍贵的礼物就这样被送出去了。在我们小时候，母亲眼睛闪着泪花跟我们叙述这些，当我们长大了甚至有一丝愤怒。她钦佩他的价值观，但不确定她也被呼召过同样的简朴生活。既然她已成为河曲妇女中的一员，她最大程度地利用一切当地的材料使这个家更舒适。

很快家里的地下室已井然有序，父亲非常渴望带母亲在这个城市兜转，以至于他非常激情地描述这里。他把河曲描述为“是一块东边的草原，黄河蜿蜒穿过这个镇的西边，就像托里戴尔河[Torridals River]穿过克里斯蒂安桑镇一样。人口大约 10 到 15 万人。和克里斯蒂安桑一样，10 万人在河曲的农村。如果你有很多时间，我们可以在蜿蜒到河曲的长城的臂弯里散步。”建于公元前 246 到 209 年间，长 1500 英里的长城确定了中国和蒙古的界限。

把这个故事讲给从来没听过的人

很快新婚夫妇习惯于一系列的福音布道会，看顾病人，后来又为孩子们建立了一所小学——在河曲历史上第一所接受女孩儿的学校。

对母亲来说，讲述上帝的爱意味着拜访在家中的妇女们。对父亲来说，这意味着和男人们在市场上分享。后来当他尝试在商业区租一个地方作为街上的会堂时（这样福音将不会轻易被市场上的嘈杂声打断），他发现人们太迷信了，不愿意把地方租给这个“洋鬼子”，却愿意半价租给中国人。

在那些来看母亲的妇女中有一种迷信。依照中国的优良传统，每一个来访的人都会有一杯茶，但是母亲写道：

大部分妇女害怕在妇女接待室喝茶，尽管那些就是在当地买的中国茶。她们认为我们在茶里放了一种药，施了魔法，让她们转向我们所传讲的上帝。而男人们则相反，他们和我们交往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有信心和我们在一起，也敢喝我们的茶。

六个月后拜访其他传教士

经过了新的调整，我们在山区的暑假发生了变化。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外国人，我们还有六天是在骡子背上度过的。

Sommerly 是我们所住的空无一人山区地方的挪威名字，四面都是松树和岩石，一条小溪从中间穿过。每一家都建造自己的平顶泥砖墙的小屋来躲避酷暑。

对父母来讲，在那个山区里度过的假期意味着又有机会进行婚礼接待。因为当地以骡子为交通工具，只有三个传教士参加了婚礼。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提前几个月从挪威寄来糖果，但对于婚礼来说仍为时已晚，但却正好在此次接待中派上了用场。母亲在给外婆的信中写道：

我们请每个人都到我们家上面的松树林里，你可以想象我们揭开盖子的时候，他们看到真正的挪威鱼丸浸在白色的酱里时脸上惊讶的表情，然后他们就着蒸熟的热土豆吃。然后我们就吃到了传统的婚礼蛋糕[kransekake]，还有你送的巧克力。每个人都赞扬你送来了这么好的礼物，并且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和感谢，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有多激动！

鸦片的罪恶

随着时间的流逝，父母振作起来又回到了河曲，以新的活力面对艰难的任务。他们常常写信提到那个有 10 万人却只有不多几个信徒的县。他们讲到那些不道德的行为和鸦片成瘾毁掉了很多家庭。当时鸦片在山西是非法的，跨过那条河到了内蒙古内，禁止鸦片的法律就没有那么强的执行力度了，所以很多从河曲到北方找工作的人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被毁掉了。

母亲在她的一封信里写道，她很关注一个 12 岁的女孩儿，她被父亲卖给一个吸食鸦片的人，等她到 16 岁，就要做那个人的新娘。但是这个未来的新郎对这个女孩儿的父亲非常愤怒，仅仅因为女孩儿的父亲对福音感兴趣，他在一条荒凉的路上差点把女孩儿的父亲杀了。

鸦片是西方带到中国最大的祸根，“它掠夺了中国的大片土地，毁掉了数百万计的家庭……并最后导致了 1840 年的战争。”凯林顿·古德里奇[Carrington Goodrich]写道。在 1729 年，皇帝颁布法令：禁止销售鸦片。1800 年，进口毒品也被禁止。“尽管有这样的禁令，”凯林顿·古德里奇继续写道，“每年 5000 箱鸦片被运到广州，直到 1821 年，大部分是由英国运来的，只有一部分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船只上。”

当中国政府销毁了大量鸦片后，中英战争就爆发了。但在此之前，一位逮捕过很多鸦片商的中国官员向维多利亚女王控诉道：

在这群野蛮人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因此就有人走私鸦片来诱惑中国人……试问他们的良心何在？我听说吸食鸦片在贵国是严令禁止的……假如有从其

他国家携带鸦片出售的人到了英国，并且诱使你的国民购买吸食……女王陛下您能否在你们国家的坏公民来到中国之前对其进行审问呢？

1911 年英国国会终于禁止运送鸦片到中国，那时我的父母已经到了河曲。云南省会的南部有 90% 的男人和 60% 的女人已吸毒成瘾。幸运的是，河曲和内蒙古都没有这么严重。但我的父母得知鸦片的来源后感到非常羞耻。在 19 世纪中叶，就是那些国家，他们当时想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现在又提出要来宣教。

裹脚

并不是所有的罪恶都指向西方，自从我母亲第一次到河曲，她就持续不断地为改变妇女的次等公民地位做斗争。女人裹脚只是他们在整个国家受压迫的一个具体表现。当河曲的新生女婴不再缠脚时，大部分的成年女性已经有了小脚。

女人缠脚要追溯到第十世纪，把脚缠成三寸是文雅的标志，这个完美的漂亮的脚被称为金莲。但是努力地使这个野蛮的习俗变得浪漫的真正目的可以用一句中国谚语来概括：“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门户，千缠万裹来拘束。”

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隐秘的。为了确保妇女永远不会背叛她们的归宿，她们的脚就永远被削掉了。她永远也不能离开房子，除非她不怕裹着的脚的疼痛。

缠脚的过程是从一个小女孩一岁时开始，极其疼痛，我还记得大家围炕而坐时听到了这个在不久的过去发生的故事时，尖叫和愤怒伴随着整个过程。最初只是用布条，后来居然用金属丝来缠脚，确保脚不会复原。从某种意义来说，什么时候脚废掉了，什么时候金属丝才能取下。

有一次我叫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妇女给我看一下她的脚，当她把布袜去掉后，她慢慢解开缠在脚上保持形状和安全的裹脚布，我看到的只是一只又短又粗的残脚。这个情景让我心怀愤怒，且对她充满同情，这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些女人如何忍住每一步的疼痛来完成这个过程。我还想到了那些和母亲一起走街串巷传福音的小脚女人。

这些妇女后来也被称为“圣经妇女”，因为她们总是带着圣经，也是镇上为数不多的能识字的妇女。通常当她们跟一家人联系上的时候总是先给她们读经，后来“圣经妇女”这个名词也被用来称呼在教会做妇女事工的人。

建立家庭的喜悦

在调整适应新文化的过程中，上帝给我的父母带来了第一个孩子爱德华，他们满心喜悦。爱德华出生于 1924 年 1 月 17，是按我祖父的名字取的。从那之后，家书总是谈论着这个新成员。在这个荒凉的新村落里，爱德华填补了他们生命深层的需要。“很多男人和女人来看我们的小爱德华，”母亲后来写道，他冲每个人笑，呀呀学语，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来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在爱德华两岁之前，母亲还指望他来做宣教的同伴，她写信回家说：

每周有 3 个上午我要教来这儿的女孩子们认字，3 天我要去妇女家中探访。爱德华会和我一起去而且他也乐于这样做。我现在没有圣经妇女和我一起，

所以他就是我的同伴。在那个城市，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方便一个人走出家门。但是有儿子陪同就可以了。就这样，他取代了一个圣经妇女的位置，这么早就开始宣教了。

全家享受假期

1925年8月8日，我出生在山区里的 Sommerly，我随外婆，名字也叫卡罗尔 [Karoline]，简称凯莉。他们告诉我说那天下着雨，我们泥做的房顶也在漏雨，而且不管装着我的小篮子挪到什么地方，那里就开始漏雨下来。但是家信里他们把我称为“一缕阳光” [solstralen]，看来我的性格并没有因为下雨而产生太坏的影响。

那年夏天，一个叫斯威勒·豪特[Sverre Holth]的宝贵同工，刚从挪威过来和我们在我们山区里的名叫“Solbakken”的小屋度假。我上次在他所牧养的奥斯陆教会拜访他时，他还记得当时的很多故事。“哦，你们在山区的时候你母亲非常擅长把家里装扮得像过节一样，她常常把我们聚在一起吃饭喝咖啡举办音乐晚会，我们都弹奏各自的乐器。她是整个聚会的生命。那个镇上的人的典型特点就是很会娱乐。”他接着讲到：

你知道你父母有很强的确信，并不总是跟其他人意见相同，这会引起一些冲突，但我喜欢跟他们闲聊，来来回回地讨论很有意思。你父亲总是认为我自由主义，他喜欢和那些跟他不同的人辩论，讨论神学对他来说就像是一项运动。他有很多故事，讲那些故事的时候，他总是会开心地笑起来，都是他们居住的镇上的人的故事。他很风趣，很有信心，从来不会灰心丧气。

他接着讲他们的婚姻。

瓦波格是一个能给任何事情增加色彩的能人。你父亲经常说：“瓦波格，你来决定吧。”当然，他也总是参与一些重大决定，但是人的生活中总是有更多小决定。我从来没见过他们起摩擦，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他们很幸福。秘诀就是他们彼此真诚。不管他们在哪儿，他们都是喜乐的人。

每个夏天我们都会回到那个山区，和像奥克尔[Onkel 叔叔]斯威勒一样的人待在一起。他后来结婚了，也在山上盖了一个自己的小房子。我长大一些开始发现这个小山区不止是度假的地方，因为那是唯一一个所有传教士都聚集的地方，工作上的区域合作都是在那里决定的，每一个工作站的报告都是在那里分享的。1925年父母的报告包括：4个男人受洗。他们每周和外面来的人有两次聚会。父亲在2个分站工作过，举办了367次街道聚会，拜访过242个村庄，约有22000人听到福音。卖出2000本圣经和小书，分发出16000本小册子。很多病人得到医治，药品也分发出去了。探访了很多家庭。周日上午有大约20人参加敬拜服事。

第二年母亲和我们两个孩子决定去临县，和那儿的传教士们一起过秋天。父亲将独自回到河曲，修理我们那几年久失修的房子。那时候还没有可能去租或者买更好的房子，但他们急切需要更好的设施。根据中国的习惯，他们会把院子分开，一边给男人、一边给女人。1925年度年报提到：由于缺少空间，刚开设的学校已经关闭，但那些小女孩儿还跟我的母亲一起进行非正式的学习，因为那儿没有其他学校让女孩儿们读书。

父亲因伤寒病倒

父亲独自一个人在河曲待了 2 个月后，在回临县过圣诞节的路上，由于得了伤寒，走到朔县就病倒而不能前进了。有几个好心的瑞典传教士把他抬回去，并打电报给母亲。母亲打电报回家说：“我们经历了至关重要的时刻——生死挣扎，第 18 天彼得烧退了，上帝以他全能的膀臂扶持了我们。今天是第 28 天，最近几天没有发烧”。她继续写道：

彼得在病中仍非常喜乐，就像生活“在地如天”，对我们这些围在他身边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祝福。在他发烧出现幻觉的时候他还认为上帝在中国为他预备了很多工作，为了我和孩子的缘故他也要活下来。我想到所有在山西和其他临近几个省死于伤寒的传教士们，也想到在中国，伤寒是内地会成员死亡的主要原因。我意识到这真是上帝特别的怜悯，父亲的生命才得以存留。

我们刚回到河曲团圆，另一场危机，一个政治危机就在全中国爆发了。1927 年春天，红军和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和领导权问题上发生冲突，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各省的军阀开始考虑他们各自的利益，大部分外国人因中国出现的问题或正确或错误地被指责。因此大部分传教士被迫离开他们的岗位。5000 名传教士撤离，有些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挪威休假

因为 1927 年是父亲在中国服事第 9 年，母亲服事的第 7 年，我们就被批准回挪威休假。外婆带我们去克里斯蒂安桑的陶波得格滕，在那里我们两边的亲戚有一次大团圆。每次我回家，关于我和爱德华举止的故事都会增加。就像在中国一样，我们很早就进行了宣教工作，那时爱德华三岁，我两岁。我们会把订单写在一张纸上卷在付账的硬币上。在路上，我们就在房子的台阶上停下来玩硬币，看到硬币滚到人行道的水沟里非常有趣，但我们到了商店就没有足够的硬币付账了。

还有一些是关于我跟着爱德华到处跑的故事，如果我不说“我也去[Kari ogsa]，”他就不去洗手间。在那些旧日的美好时光，有 2、3 个蹲坑的洗手间，并不存在像今天这样的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

在度假期间，1928 年 5 月 9 日哈肯出生了。名字取自我们那位在海上失踪的外公[Captain Hakon Tonnessen]，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住房子的主人。家里再次充满了 3 个小家伙的欢笑和吵闹，就像外婆刚刚守寡时一样。那一年她是多么地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啊！但是我们在那里不能住太久，不久房子里就吵吵闹闹的，因为我们开始购物，打点行李。衣服和装备足够 5 个人生活 7 年，全都塞进了父亲做的木箱里。哈肯当时只有 4 个月大，但也要开始准备旅行了。

旅行就是我们的家

于是我们开始了回河曲的为期 7 周半的旅程。首先我们坐船到奥斯陆，然后坐 2 个星期的火车到瑞典，走水路到德国和波兰，途径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到中国。可以想象母亲带着 3 个活泼的孩子，父亲还在车站买食物的时候火车就启动了，他想尽办法搭上最后一节车厢，最后在车厢上走了好久才找到我们。全家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热烈欢迎他。火车上的旅程到大连就结束了，我们在那

里等了 7 天搭船去天津，然后坐火车到太原，等骡子又等了 6 天，骡子载着我们，10 天后，我们终于到家了。

尽管旅途非常劳累，但父母想起要回来就非常激动。当他们抵达河曲，传教士乔治·林沃德[Georg Rinvold]正在那里等着他们了。他们不在的日子里，他一直在河曲。乔治在宣教报纸上写道：“当中国内地会在世纪之交给我们这样一个任务——前往这个无路可通的山区，我可以这样评论说：只有不屈的挪威人才敢接受这个任务”。

在漫长的旅途中，最后 10 天是最艰难也是最快乐的，我可以看到父亲走的路跟他骑着的那头慢吞吞的骡子差不多。这头顽固的动物似乎印证了诗篇中的一句话：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至摇动。（诗 16: 8）然而，这个慢节奏的骡子也带来几分平静，而且我们可以在路上走在它前边，然后等着它赶上我们。

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漫长的旅行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家。旅行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朝圣者之家，很容易在那首赞美诗《永恒君王》中看到我们的经历：

前进吧火红柱子，我们毫无畏惧
我们将欢欣跟从，喜悦源于泪水；
彷徨也不会迷失，借君王光而来、
永远为上帝子民、旅途就是家乡！

第四章 黄河之歌唤我归家

1928年内战结束，全中国的传教士都陆续回到自己的岗位上，“黄河之歌”（河曲）也吸引着我们回去，它和其他歌曲合在一起，用我们挪威语说就是：“去为你的主人捕鱼[*Ut a fiske for din mester*]。”然而这些歌曲在我父母的心里比那些外在的环境更和谐。三个难题继续蹂躏着这个国家：第一、蒋介石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红军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第二、内战期间成百上千的士兵被征入伍，他们现在在社会上闲逛，对和平和秩序造成威胁。第三、成千上万没有当兵，也没有醒悟的人开始把偷盗当作他们的生活方式。

爱德华还记得我们骑着骡子行走在山西的沙山上时遇到了匪徒。父亲看到那些强盗的时候，他就到峡谷的那一边和他们谈判，其他的家庭成员就为此祷告。父亲赤脚而归。抢匪头子想要他的鞋子，但是奇迹般地把父亲安全地送回了我们中间。

还有一次在山区度假，我们听说匪徒又要来，所有的成年人都聚集在一起祷告，我们大约有 10 个孩子也决定祷告。我还记得当时我确信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当大人们结束祷告，找不到我们这些孩子们时就慌了。他们祷告的时候盗贼把我们带走了吗？后来他们发现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都跪着，我们信心刚强，但还会心存疑虑，每个人都扫视着地平线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最后，从村子里传话给我们说匪徒已经逃走了。有些匪徒告诉村民们说，他们看到我们的房子上有一群人身穿白衣，手拿亮剑。他们问道：“这些人在哪儿屯的军队？”所以我 5 岁起就知道：“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诗 34: 7）。

我们在早年就听说过这世界有很多罪恶，但是在我们家里却有极大的平安，没有仇敌。在家里有爱和拥抱，当然也有严格的纪律。父亲过去常常笑着说：“你们的意愿在我的后裤兜里”。他并不刻薄，但这也是事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界限，也知道我们是被爱的，所以家是这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家有一张相片我一直带在身边，是母亲坐在父亲的腿上，他乐意让她在那儿坐几个小时，但一般她都会去做她要做的工作，我们这些孩子们就会打闹着看谁会有幸坐在这把椅子上。坐在上面真的非常安全。早晨和母亲一起躺在床上是一个美好的依偎时光。我们总是抢着坐在紧挨着她的位置。当我坐在她旁边时，哈肯总是偷偷地坐在我们两个中间。我坐在母亲床上的时候，父亲已于 5 点钟起来。后来爱德华也学他的榜样。

祷告的一家

父亲不止是私下里祷告，他还当着我们的面祷告，我可以看到他在起居室里半闭着眼睛走来走去，我们可以围着他玩，彼此交谈，但不许和他谈，因为他在和上帝说话。然后他会拿起圣经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读了又读，好像他在读一本全世界最激动人心的小说。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带着纸和笔，还有注解。他读经文的时候会在我们面前读，母亲也是这样。我能看到母亲跪在那里把头埋

在椅子上，我们也可以围着她玩，甚至爬到她的背上，脱掉她的鞋，但我们不能和她说话，因为她在和耶稣说话。我们那儿的人认为耶稣所教导的在密室祷告意味着不要在家以外的地方表演。他们在我们面前祷告的时候是完全自由的。在家里树立了祷告的榜样。

另外，作为个人奉献，全家人每天有 3 次聚在一起祷告。早饭后我们会有读经，凡是识字的都可以加入，之后有祷告。晚上有一个睡前圣经故事。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祷告。中午的时候，我们把中国内地会 1300 名传教士的名单分配到一周 7 天中进行祷告。这个活动导致我们发明创造了“某某先生和女士的游戏”，因为单上的人来自不同国家，所以就会听到发音比较有意思的名字。

我们骑骡子长途旅行的时候，还编出了更有趣的某某夫妇。编完后我们会大笑不已。还记得一个名字叫海蒙，哈肯就会大叫道：“海-曼-特拉拉拉夫妇”我会紧接着说：“凯普切特-切-查特夫妇！”我们也喜欢把不同的名字变成挪威语。这些活动让我们忘掉了那头慢吞吞的骡子。

一家人的工作和娱乐

父母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家庭，同时也要建一间教会。他们会把教会和家庭分开，休假之后他们买了一间独立的房子作为教堂，进行修缮。父亲写信回家说：“现在我们去教会就像其他人一样，而且在路上还有遇到去做礼拜的人。以前都是他们去我们家礼拜。”

1921 年父亲搬进的那地方已经重新修复了。在这期间，父母与其他四名妇女在骡子背上度过了 4 天，去参加一个为期 2 天的妇女大会。这四位妇女从未骑过骡子，也从未出过城。包着小脚的妇女不能从骡子上跳下来，也不能在陡坡的时候走路，但她们就勇敢地骑着骡子继续走。有一位精力充沛的丹麦传教士被神使用，来满足这些妇女深深的灵性需要。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时，爱德华和我回家后和父亲一起玩，父亲开玩笑说尽管每个橱柜都被母亲整理得很整洁，但还是找不到我们的衣服了。父亲对我们管得很松，我们在堆满新建筑材料的院子里想玩多脏就玩多脏。

母亲和那些妇女回来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关于那次开会经历的故事要讲。拉格恩黑尔德·斯威特森[Ragnhild Syvertsen]和她们一起在河曲参加妇女事工。马丁·杰森[Martin Jensen]已经去帮助男子事工了。这两个同工都参加了父母的婚礼，非常高兴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坦特·拉格恩黑尔德[Ragnhild]谈到父亲在市场上讲道时最爱用的引人注意的办法。人们在市场上总是忙于买卖，可能会听一会儿然后又回去做生意了。父亲会突然说：“你们知道吗？我有 8 个兄弟在家里，我们都还活着。”马上人们就又回来了。在年长者的文化里，多子多孙意味着好运，因为当时婴儿的死亡率高，几乎没人听说过有 8 个孩子都能长大成人。所以，基督徒总是被镇上的人问道：“那个有 8 个兄弟的人住在哪儿？”

当传教士陶拉·约翰森[Thora Johansen]一年后到达河曲，父亲可以在现实的玩笑中进行竞赛了。他们有一种方式彼此怂恿。有一次她挑战他说你敢不敢在下个主日只刮半边脸就在讲台讲道，而他就是这样做了！正是这些外国人，面临一位弄了一张滑稽的脸的讲道者很难保持恭敬。父亲真的不担心当地人会如何想他的滑稽可笑：“不管怎样我们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奇怪的人，我们的习俗很不同。”

再多一个反常也无所谓。”

父亲开玩笑和讲故事的能力伴随着我们在河曲的生活，在山区度假的时候也常逗乐他的同事们“你看着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酝酿一个故事。”有人这样告诉我。

我们会看着他，摩擦他的膝盖，然后开始大笑，我们就会告诉他：“你现在最好讲出来吧。”然后他们就会听到一个关于传教士说耶稣再来的故事，有一个人就回应说：“嗯，不错！当他走的时候我可以继承他的牛。”

然后彼得就回到了忻县参加同工会，骑着骡子走了一天，到家的时候非常饿，咖啡和三明治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但是他没有看见食物，他又开始搓膝盖讲故事。等上饭的时候他说：“应该吃点东西了。”虽然很饿，他刚才被讲故事分心了，没有注意到食物。

父亲在讲道时常常讲述传教士的故事，但却会因为错误的汉语发音而失去听众，因此他经常会讲一些在河曲工作时亲历的故事。他为母亲在诊所的工作而感到骄傲，她每天都以这种方式向人们证明：基督徒不只在言语上关心人，也有实际行动。母亲的诊所是镇上唯一一家能够提供现代药品的诊所，但是不久以后，她就遇到了竞争对手。有一个人到省会买了一些药品，回到河曲做医药生意。他还请人帮他写了一个英语招牌：“我是个医生[I AM A DOCTOR]”。但他回到河曲挂起他的招牌时，把语序打乱了，写出来是：“我是个医生吗[AM I A DOCTOR]”。那是河曲好多年来唯一的英文招牌。

有时父亲会给我们讲一些遇到一个中国基督徒的故事，那人称自己是爱尔兰长老会的，或是遇到一些自称是德国路德教会的，或是瑞典五旬节派的中国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国籍和我们基督教派混在一起。但是至少父亲能够拿这事开玩笑。他有时候会问一些让自己的孩子和同工都惊讶的问题，如：“你更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比你看起来更愚蠢？还是看起来比你更愚蠢？”当我们费尽心思想搞清这难以回答的问题时，他却笑着向我们大吼，尤其是我们把他的玩笑看得太认真的时候。

饥荒过后的严寒

父母笑对环境和自己的本事使他们仍能在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存活。根据中国专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大致估计，从1929年到1931年在中国西北部死于大饥荒的人就有五百万到一千万。1929年是饥荒之年，1930年冬天还是饥荒，在这样的严寒中有许多犯人冻死。早些时候人们还能够靠树叶和树皮充饥，但如此的天寒地冻，即使吃这些也是徒劳，难以计数的人死去了。在一个宗族社会里，每当有饥荒逼近，最先遭受痛苦的就是女人。因此女人经常被卖为奴，再在其他地方转卖给作老婆或小妾。母亲写道：

在河曲有人卖掉自己的妻子，看到这些都让人非常难过。去年是饥荒迫使他们这样做，但是现在仍然没有转机，大家还是弄不到吃的。最让人难过的是，许多家庭就此破碎了。没有母亲的孩子哭着要母亲，不幸的母亲哭着要孩子，丈夫开始用鸦片来麻醉自己排解伤痛，最后还是沦落为乞丐。我们家附近有个女人已经被卖掉了。从去年到今年我们都尽力帮助他们，但当东西都吃光了之后，饥饿的现实仍就严酷。

5岁的小女儿是第一个被卖掉的，丈夫威吓妻子说下一个就轮到她了，她哭着求丈夫留下自己，却无济于事。不久她真的要被卖了。时间推迟了几天，因为重要的是能够找到一个出钱最多的买家。买家一般都是从南方来的。幸好那个买家允许她带着最小的儿子过去。但是打那儿之后，听说那个丈夫只会哭，而且不再干活了。留在家里的一个10岁的男孩儿神情悲痛，嫁为人妇的16岁的女儿看起来也痛不欲生。母亲被卖了，做了奴隶，家也没了。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昏暗无光。在极度的悲苦中，他们没有一点儿盼望，更没有上帝能够去仰赖。

随着逐渐的成长，我越发地感受到一种强烈地对比：一端是在河曲的基督徒家庭，而另一端是不认识上帝而又走投无路的家庭。我们一直都能体会到上帝无法比拟的良善，他让我们衣食无忧、身体强健，还有一个平安的家。在这种背景下，会有一些来自饥荒重灾区的人们，腹部肿胀，面色难看，他们围坐在院子里等着我们为他们预备食物。

这也是我第一次向大家介绍妇女歧视问题。为什么只有卖掉母亲和女儿，家人才得以充饥呢？虽然母亲能够理解，当一个家庭忍受饥饿时，卖掉一个成员就能有钱买食物是多大的诱惑，但她仍然把这种行为归咎于异教价值观。她告诉我：“所有对妇女的歧视都来源于异教。”杀女婴在穷人中间很普遍，因为养女孩儿是一项开销，结婚时还要给她置备嫁妆，而她却把大部分的劳动时间用在丈夫家里。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一次在峡谷的散步，我们发现了一具女婴的尸体，上面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苍蝇。

传教士孩子的喜乐与痛苦

所以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是悲喜交加的。1931年10月29日托杰出生了，这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当父亲第一次抱起他的第四个孩子时，他决定让这孩子成为上帝忠贞的仆人，一个传教士，他说：“这个儿子将会是我老年的喜乐。”但是当托杰还未得着机会表现他的杰出，而是个只会吃、睡、说、笑的婴孩儿时，爱德华就已于1932年3月返回挪威。就像卫兵换岗一样，我突然拥有了得到一个婴儿弟弟的喜悦，同时也承受着失去一个哥哥的痛苦。

孩子们的教育是这几年里祷告的主题。当爱德华要上一年级的时候，母亲按挪威的课程在家里教他，但是父母认为除了简单的读书写字，我们还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最后宣教机构派了一个老师到了临县的学校，他从河曲骑了8天的骡子才到了学校。因此，如果我们被送到那儿去，就只能在夏天见到父母了，而回家则意味着父亲要想接我们回家，就要在骡子上要待上32天。

因此，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父母决定把爱德华送回挪威。母亲在爱德华离开前一个月写信给外婆：

在做了许多祷告之后，上帝的旨意似乎是让我们亲爱的小爱德华回挪威上学。我们为这个问题考虑了一段时间，神似乎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为他做了一些预备，使他回挪威读书能够行得通。爱德华自己也向上帝祷告了很久，求神向他显明他应该去哪里读书。我们每天感谢上帝显明他的旨意并回应爱德华的祷告。

所以 8 岁的爱德华跟着回去休假的一个传教士家庭回到挪威。在克里斯蒂安桑镇上，爱德华由舅舅和舅妈接回他们家，他们没有孩子，收养了另外两个外甥，他们的父母是马达加斯加的传教士。现在来自传教士家庭得三个外甥成了他们的家庭成员。那是一个美好的家，但爱德华在学校被人叫做“中国佬 [kineseren]”，就像之前他在河曲的时候被叫作“洋鬼子”。他刚在那里适应一种文化，而现在又要在这儿适应另一种文化，而且没有父母帮助他。这时候，母亲从中国寄去一封信：“感谢上帝为爱德华在挪威敞开一个美好的家，但我和你父亲一天也没有忘记这种分离。”

我当时只有 6 岁，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种痛苦。我每天早上一觉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爱德华走了”。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没有他，生活突然变得无聊和空虚。

对我父母来说，在他们的宣教生涯当中，这无疑是一个最艰难的决定，但同时也是让他们凭信心去仰望神，求神带领的决定。在他们那个时代和习俗面前，他们依然是孩子。我们都顺从了我们同辈们的基督教价值观。然而不管我们跟随主有多么忠诚，都不能保证自己所听的是上帝的声音而不是听周围基督徒的声音。对我的父母来说，爱德华应该在一个基督文化里和他同龄的人一起上学，这样比起和自己父母在一起，有更重要的教育意义和社会意义。

几年过后，爱德华回到中国，送爱德华回挪威正确与否的这个问题又出人意料地出现了。那时有一群在芝罘学校读书的传教士孩子在海里受洗，这是一个动人的场面。突然，爱德华脱口而出：“但是他们没有为水祝福。”

父亲看着母亲说：“你看，那时候我们真不该把他送回挪威。”爱德华竖起耳朵听他们讲话。父亲知道在爱德华四年的生活中他只接受了路德宗的基督教培训，跟内地会这种比较普世的教导相比，爱德华学到的是用来受洗的水是需要祝福的。然而，爱德华并没有执迷于那些水的细节问题，他感兴趣的是父亲那番话背后的意思。长期以来父亲都在质疑在 8 岁时就把爱德华送回挪威的决定是否正确。

不管怎样，在爱德华离开的日子里，比较实际的母亲就把照看小托杰的任务交给了我。这让我在过去的 4 年里，把目光从失去爱德华身上移开。随着托杰的长大，我和哈肯的关系越来越近，我们俩之间更加同心合意。几年之后，上高中的托杰写信提到那些年的时光：

我还记得我童年的家在中国北部，那里临近长城……它是由泥砖和稻草建成的，内院里种了许多美丽的花……外院里我们种番茄。在那儿我们还养了 5、6 头山羊和小鸡。我们从来不缺奶，母亲会做很好的黄油和乳酪。还记得我大姐凯莉总是对我格外照顾，我欠揍的时候她总是为我伤心，有时她甚至愿意替我挨打。还有些时候，当我们收到从挪威寄来的糖果，她总是留着她那一份。当我哭泣需要安慰的时候，她就拿给我吃。

我还记得帮忙照看我们的中国妇女，她对我们也很好，给我们讲让人非常兴奋的童话。另一个记忆是聚集我的中国队友并传福音给他们……我童年的记忆很有限，却相当美好。

我有相当多相似的记忆。任何一个地方的番茄都不能跟河曲的相媲美。我还念旧地记得那产奶颇丰的山羊的气味儿。但当我们去中国海岸要在一些瑞典人的

家里过夜的时候，我对羊奶味道的认可却给我惹了麻烦。“他们在奶里面掺了水”，我在早餐的饭桌上低声对母亲嘀咕。那时我三岁，第一次尝到了挪威牛奶的味道，还导致母亲瞪了我一下，然后向主人道歉。

在去海岸的路上，我们的第一个夏天在北戴河度过。父亲写信给爱德华说到那次旅程：“要是你跟我们在一起该多好！我们非常想念你，尤其是现在我们正计划一些好玩的事。我们多么希望你也在这儿。”在北戴河有两处比较吸引人——可以游泳的大海和唐纳德·巴恩豪斯[Donald Barnhouse]博士。他那年夏天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多年以后我向他讲述 1934 年我们长途跋涉去听他讲话，这足以表达我对这位伟大的圣经教师的敬畏。当时我们骑骡子走了 8 天，又坐了一天的人力车，又坐了一天的汽车，最后坐了一天多的火车。

当然当我们到达那里，一天能游 2 次泳，这些付出就显得太值得了。但当我们和其他的传教士孩子玩得非常愉快的时候，夏天也结束了，我们就奇怪为什么父母不能在北戴河给人传福音呢。有这种反应是非常自然的，而且也没让父母为此担心。一回到河曲，我们就重新回到以前的惯有生活里，享受着家里的氛围所带来的温暖和安全。

母亲写信给外婆说：“哈肯也是一个恬静、喜欢作乐的孩子，总是很容易满足，就算是周围没有太多新鲜好玩的事，他也有自己的一个梦幻世界……看到孩子们之间的不同，我感到很有意思。托杰真的很像爱德华，但哈肯让我想起了父亲，他将成为一个克瓦涅斯[Kvarnes,外公的老家]男孩。”她还给外婆写信说：

哈肯现在想着他和外婆如果没有彼此是多么的孤单。“我是在外婆家出生的，所以她很喜欢我，没有我她会孤单”……昨天，他突然停止了玩耍，跑过来对我说：“我讨厌待在这个国家，我们不能回挪威吗？”我们不能理解他从哪儿有了这样的念头，但他真的很有想象力，他甚至也是这样祷告的。我们那一位很严肃的传教士延森在祷告的中间也不由得发笑。

家的和谐

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们生活在很多不同的世界里：在河曲，我们坚实牢靠的家是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之外是县里那 10 多万需要听到福音的人们。尽管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它们之间仍旧是和谐的，那是因为我们一家人都因着独一的焦点而结成了一个完全真正的整体——我们要在河曲通过生活和宣讲来展现基督如何改变人的生命。

如果是作为传统的牧师和牧师的妻子，他们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特别的角色，分工明确，但由于父母二人都是被呼召来传福音的，他们之间就有了一种传统牧师家庭中没有的“同事关系”。母亲和父亲在家中地位平等，这个婚姻中没有“船长”发号施令。相反，做决定、讲道和照顾孩子（包括家庭学校）都需要丈夫和妻子共同经营。

由于中国独特的传统，男人给男人传福音、女人给女人传福音是必须的，这就意味着父亲和母亲有时都需要出门。但他们很看重我们身体和灵性的安全，所以不会单独留下我们跟我们的中国玩伴、或是当地成年拜访者在一起，以防止他们向我们灌输异教迷信思想。他们定的规矩是：他们中的一个必须在家。这也对他们的事工有好处，因为长途跋涉来看他们的人肯定可以见到他们中的一个。

但这个安排是需要经过精心策划的。母亲故意将诊所和一些妇女的圣经学习搬到了我们的家。但当她出门挨家挨户地拜访非教徒的家，或是在家教导一些对查经感兴趣的妇女时，父亲在家学习。当然当父亲拜访一些村落的时候会出去一周或是更久，母亲就必须限制她自己在当地的活动。

在河曲教会，母亲和两个单身的传教士姊妹轮流讲道。不久就有经过讲道训练的中国弟兄们起来讲道了（我父亲认为培训当地的妇女需要太多的文化跨越）。母亲的讲道常常会比父亲的更生动，会穿插很多来自圣经和日常生活的故事。父亲的讲道则更多是集中在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事件以及每个人该如何在生活中应用和效法耶稣承受苦难。人们会在会堂、市场甚至是大路上听到他的讲道。他不骑自行车，因为当时大多数人是步行的，而他又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想问他问题的人。

有时他也会感到失落。给别人解答很久之后，提出问题的人为了礼貌地结束这次谈话，会对他说：“谢谢你，真是个不错的‘故事’。”还有一种情况，他确实觉得他的听众离耶稣更近了，因为那个人离父亲越来越近。但当父亲最后问他：“你还有其它问题吗？”那人回答说：“你戴的太阳镜多少钱？”

谈到他去河曲周边村庄的旅途，父亲还讲到他在那些拜偶像和因邪灵而惧怕的人群中感到的压力。父亲说，想要克服周围环境的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背诵经文，唱十字架的诗歌，并在祷告中与主保持亲近的关系”。

我回想起父亲从冬季的宣教旅程归来，得了重感冒，这种情况下他会拒绝母亲的护理方法，而采用中国方法驱寒，就是用辣椒、姜和蒜煮水喝。接着，他也不马上睡觉，而是不停地走路，通过出汗把寒气驱走。他告诉我们：“如果当时就躺下，会有更多的寒气逼入。”若是走路之后还是流鼻涕，父亲就抓起一张被单使劲儿擤鼻涕，戏剧化地表示对于这么严重的受寒，他的手绢实在是太小了。我记得他的眼睛这时是闪着光的，我也知道，父亲这么做都是要逗我们这些孩子开心。

父母的工作和家庭生活规律而有节奏，我们的日子也平稳安静。除了暑假，基本上没有打破过这样的生活规律。我们不在其他地方停留，所以也没有其他传教士路过河曲。但是有一天，一个德国的工程师的出现却是出人意料。他来是受政府的雇佣，研究在山西建立公路系统的可能性。只要他待在河曲，母亲就会每天给他送去温暖的欧式餐饭，当然我们也会在家里款待他。他很喜欢音乐，当他看到了那个我们骑着骡子带来的小风琴，就请求母亲为他弹奏一曲。母亲先弹了她最喜欢的曲子之一——亨德尔的《广板》[Handel's "Largo"]，然后又自弹自唱了一首爱德华·格里戈的《索勒维格之歌》[Edvard Grieg's "Solveig's Song"]。也就在那时，这位工程师突然哭了。他不敢相信，在像河曲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还能听到如此的天籁之音。父母也像那个德国人一样感动，因为他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来看望他们，也正是在他们最需要休息的时候。

河曲复兴了

重整旗鼓后，父母再次回到了他们的传教工作中。在他们回国休假之前的最后几年中，这次回归是最令人兴奋的一次，直到现在也是：经常有人认罪、悔改，并在上帝那里找到了他们的平安。除了在集市上、周围的村庄和家里的讲

道之外，这里每年都有特别的礼拜聚会。父亲记录过一个系列的复兴大会和一个姓张的传道人：

过去，我们总在强调耶稣的拯救，并且邀请人来信靠基督。但是很多愿意接受这些的人却不认为他们自己是罪人。因此对张传道人的讲道我们特别地感恩。他这 10 天来的主题就是“罪”。许多基督徒对那些从来都不被他们认为是罪的事情也开始认罪了。对罪的认识也带给他们对恩典的一个全新视野。上帝帮助我们改变了这里的人们，我们为此心怀感恩。希望现在牧者更容易带领信徒进入更大的喜乐，因为对罪的认识已经成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宝贵财富。

然后就到了 1934 年的秋天，上帝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临到了河曲，看起来好像是父母为之祷告多年的突破终于实现了。从新西兰的内地会来了一个传教士，名叫吉恩·格雷厄姆 [Jean Graham]，她在整个中国的布道会中很受欢迎。很多人信主归向了主耶稣基督，母亲就迫不及待地写信，将这个复兴的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了爱德华：

结束了上午的布道会，我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 2 点钟。从神来的圣灵真的在感动会众，当我们邀请那些想摆脱罪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毫不犹豫地积极响应。另外还有大概十几、二十个妇女，虽然她们在与上帝同行的道路上仍有罪的阻隔，但也还是来了。还有一些人被罪重压，绝望地大哭。那一刻让我铭心刻骨。我们为我们能在河曲如此经历而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激，……几个女人就此放下了她们心灵的重担，离开教会时脸上还挂着喜悦。许多人在这些天中加入到我们中间，其中也有不少男人。圣灵同样在男孩子们中间做工，包括你主日学的朋友克基金 [Dijion] 和曼斯基恩茨 [Mansjeentsi]。一个男孩儿昨天回到家后，告诉他不信主的父母说他成为一名基督徒，今天他还是第一批到这里来的。哦，这对河曲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很多人将得到灵性的释放。

父亲往挪威寄了封家信，“上帝使用新西兰的格雷厄姆小姐在我们中间带来了复兴，这一切简直太奇妙了！她对圣灵充满有着合乎中道的见解，无论走到哪里，她对传教士都是极大的鼓励。”在我的记忆中，那些聚会也是我生命中最棒的属灵高潮，那年我 9 岁，我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与上帝相遇的经历。作为孩子，我们在这次复兴中紧紧地抓住了如此明显的属灵喜乐。关于这件事父母后来给家里写了两篇文章：

经历一场圣灵对整个教会的复兴是很难想象的，就像你几乎不会想到一个思想守旧的挪威人竟然会在礼拜后痛哭流涕地认罪。我们以往从不奢望这事真的会在这儿发生，而这种想法是何等地缺乏信心啊！虽然一些人的认罪我们曾看到过，但看到整个大会被圣灵浇灌却从未经历……一个女人坐在那里，看起来心里有许多负担，于是我靠近了她，“我是一个大罪人哪，十诫中的诫命我全都违反过”，她这样地忏悔说。经过完全倾心的祷告之后，她笑着起身了，眼中还含着泪花。当坐在旁边的女儿看到她妈妈如此的悔改转向之后，她也被神征服了。

接着，母亲还描述了这个女孩儿怎样使她的一个朋友也加入到祷告中来，“哦，甚至在孩子中间也有如此的悔改。”当那个朋友回家时，讲起这个女孩儿的一些

事情，她的哥哥哭了。后来他也将他的心交给耶稣并开始参加聚会。妈妈还写到：

有一个基督徒信主已经有几年了，但突然开始被圣灵责备有罪，于是我们必须不住地为他祷告，却没有什么果效。但当他向上帝保证，将把他以不诚实的途径获得的钱送回去时，他才真的经历了平安和特别的祝福。在复兴会结束后，他就把家里的钱全都拿了出来，发现数目不够后，他就当了家里的细软这些值钱的东西，才凑够了所需的 60 块钱。那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大笔钱。但最终预备好拿出这笔钱时，他却感受到了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喜悦。为了还这笔钱，他徒步走了 25 公里才到达黄河的另一岸。这故事在河曲被人们竞相传颂：当一个人在自己的情况还很糟糕的时候竟然还愿意归还这 60 块钱，那么---在他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全中国的复兴

在 1937 年日本侵华之前，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还记得那些被神使用的很有名的中国人，像宋尚节、倪柝声、王明道，还有几个伯特利教会的成员（信仰复兴运动者巡回布道团）。神还使用了外国的传教士，有来自内地会的吉恩·格雷厄姆、伊丽莎白·吉斯彻巴彻尔[Elizabeth Fischbacher]、安娜·克里斯坦森[Anna Christensen]，还有来自中国基督教路德会的玛利·摩逊 [Marie Monson]。

整个中国，上帝都在为应对将要出现的逼迫而预备教会——1937 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即将到来。我的父母和 8000 名在华传教士当时并不知道他们预备教会是为了这些事情。如果他们提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们可能就会把事情搞砸了。

正是因为人不能预知未来，所以才能通过对神的依靠，完成当前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他们在从事一项远远超过自己能力的任务，也是非人力所能及的，就是为神的国度而工作。虽然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却亲自见证了神的国度降临在新信徒身上，我对此深感敬畏。在河曲甚至在中国，人们开始向神俯伏跪拜，承认并高举这位全世界的救主。

如此，1935 年父母离开河曲休假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工作还有另外的深意和重要性。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已经闻到了战争的味道。就在他们离开前的一个月，成群结队的日本飞机飞过了河曲的上空。

第五章 在挪威平安度假

1936年3月12日，在挪威醒来的第一个早晨，我发现辫子被缠在了床柱上。爱德华出现在我的面前，满脸的坏笑。我曾经担心过他会不会变得世故，但是他的恶作剧表明他还是当年在河曲的那个爱德华。

他等我们等得都不耐烦了。这也难怪，从河曲到克里斯蒂安桑镇上，整整花去了我们两个半月的时间：首先我们得先去上海，这是个漫长的旅行，需要骑驴，再换板车，再换汽车，然后是火车，最后是轮船；两周后，我们再乘船由上海往英国的南艾普顿[South Hampton]去。我对此仍记忆犹新，是因为我的主日学老师知道了我们在上海已经度过两个周日，就千里迢迢坐车来到上海带给我一张的画片，上面画着各种肤色的孩子们依偎在耶稣的腿边。

路上不晓得停了多少次，我们终于到了英国，后来乘火车去伦敦，到达中国内地会的总部。因为当时乔治五世国王刚刚过世，父亲就买了三条黑色领带给自己的三个儿子，那是他在伦敦花的第一笔钱。在伦敦的另外一个经历是，一个照顾内地会传教士孩子的保姆带我们去了彻斯欧德公园[Chisold Park]。许多年以后，当我带自己的孩子去看《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也曾有个保姆陪我去过伦敦的公园。

离开伦敦之后，我们又在丹麦停留了一站，父亲的姐姐安娜[Anna]结婚后住在那里。她丈夫爱德华·甘纳德，1910年到了中国后得了肺结核，不久就离世了。然而他对父亲的生命却有深刻的影响。安娜在1910年怀孕，本打算生完孩子后去中国，但终身未能实现。所以这个中国情结是跟家庭关系连在一起的，对她来说一直很特别。

在这次旅行中，给坦特 安娜[Anna]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四岁的托杰。这个小家伙穿着一套英国西装，举止得体地问，她是否愿意他为她唱首歌，她当然同意了，接下来还有个问题：“您希望我用挪威语、汉语、英语还是德语来唱？”经过六个星期在德国轮船上的生活，他现在可以往他的点歌单里添上德语歌了。

全家再次团圆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中途停留，我们终于到了克里斯蒂安桑，爱德华还以为我们回不去了呢。当从丹麦回家的小船终于靠岸时，他比海关人员和警察都先等在那里。母亲给中国朋友写信时说起这次团圆：

再次见到我们的孩子简直太好了，你们都很难想象现在他在我眼里是多么迷人多么英俊！他现在也特别懂事。那天晚上我们回到我姐姐家，四个孩子彼此依偎着睡在我们的大床上，这真是个动人的场面。第二天早上，几个孩子再不像从前那样吵闹着谁该睡在母亲的怀里，现在他们一致决定让爱德华和托杰跟母亲睡。从那天开始，凯莉和哈肯都决定这个位置应该让给爱德华，因为他离开我们太久了。

再次团圆——我们六个人的团圆——真是太美好了！我们把这两层楼的首层租了下来，花园里种满了浆果和鲜花。我们的房子靠近大海和一位朋友所开的乳品商店。父亲看着母亲，还是和在中国时一样清瘦，就对她说：“你应该去那儿喝点乳酪，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我们的信仰传统

在互相了解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我们基督信仰的传统。我只能从照片和信件里依稀记起这个大家庭，因为自从我三岁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们。但是不久我们就重新开始熟悉起来，而且我被家族的历史深深吸引住了，在故事中把每一个人对号入座。外婆最容易亲近，因为七年来，她每半个星期就写信过来。

我祖父母的家就在伦德桥那里。我喜欢一个人走过去，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我贪婪地听着雨声，闻雨的味道，呼吸着河面上的新鲜的空气。风会很冷，我脚穿沉重的雨鞋，身披渔夫的雨衣，戴着防水帽[*sydvest*]，兴致勃勃地走在寒风中。十岁的我，学会了在雨中吹口哨。

到了祖父母家，他们总是对我盛情款待。在阳光明媚的夏日，我会看见祖母坐在外边的花朵和果树丛中。自从父亲离家去了中国，她就建立了一个为河曲祷告的小组，每个月聚在一起并为我父母的工作祷告。她是我们最忠诚的祷告支持者，对河曲也非常有兴趣。

我也经常去探访我的姑姑和表亲们，他们家住在老公牛街[*Ole Bull's Street*]的一栋可爱的白房子里。八个表兄弟一个表姐妹已经在克里斯蒂安桑定居了。从家族不同的成员那里，我听到了“扫烟囱的托杰[*Torje Feier*]”的故事，我的曾祖父是家庭烟囱清理企业的鼻祖。弟弟托杰是随他起的名字，所以我肯定知道他，但却从来不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我知道他常穿一件燕尾服，一顶短版大礼帽，在和市长及其他镇上的领导会面时显得与众不同。他因致力于传福音而闻名，正因为如此，他身材浑圆的好友克里斯廷·豪格主教[Bishop Christen Hoeg]有一次对他来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俩可以互换工作。”但曾祖父说：“哦，我觉得我能做好你那份工作，但我不敢保证你能做好我的。我觉得主教爬不了烟囱。”

有一次，曾祖父在半夜起来穿好衣服，准备前往医院。曾祖母想尽一切办法劝他回床上睡觉，恳求他说：“托杰，你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晚上是睡觉的时候。医院里没人在这个时候还需要你。”但祖父还是去了。在医院门口，他碰到了一个护士，那人对他说：“哦，托杰，我们正盼着你来呢，有一个可怜的灵魂快死了，但他现在不能死，你得帮他到救主那里去。”曾祖父顺从了内心的声音，而且带领那个病人信主，与神和好了。

镇上的一位长者告诉我，如果有一个人正在规劝另一个人认罪悔改，而又感到受挫，不知怎么处理时，这个人通常会向曾祖父求助，“我对你说无能为力了，我还是把你交给托杰吧”，总有人这么说。

那时我的曾祖母还健在，住在一栋旧房子里，他们曾在那里款待镇上的贵宾。虽然她并不是我祖父的亲生母亲（她很多年前就过世了），我还是称呼她曾祖母。我的曾祖母是位小巧玲珑，性情温良的女性。我们去拜访她的时候，她总是用苏打水[*brus*]招待我们，这在中国可喝不到。在听到关于曾祖父故事时，我能够想像她的样子。有一次，曾祖父在没有通知曾祖母的情况下就带了主教克里斯廷·豪

格回家吃饭。她就把曾祖父拉到一边说：“您该提前告诉我，今天咱们只有粥。”他俏皮地回答说：“好吧，如果喝粥对我来说很不错，我想对主教也应该足够好了。”

曾祖父不仅是一个个体工人，他还是当时在复兴运动中那些脱颖而出的非神职传道人之一。他经常赶着马车去教堂、祷告室、学校、私人家里召集大家聚会，奔波于镇子的各个角落。

19世纪末，神的灵倾倒在挪威人身上，于是出现了非神职传道人运动，使得非神职的传道人无论男女都被赋予讲道的自由。路德宗作为国教为了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在教会接受洗礼、领圣餐，就支持这场运动，允许他们中的领袖建立一些祷告屋[*bedehus*]，从而能够在里面举行非正式的晚间聚会和主日学校。

事实上，我的曾祖父和外曾祖父都是兼职传道人。1880年9月，他们参加了同一个聚会。我的外曾祖父叫克里斯滕·黑尼斯[Kristen Hanes]（我弟弟托杰·克里斯滕[Torje Kristen]也是继承了他的名字），是一个农场主，他想办法把耕种和讲道结合起来。他会把风琴放在马车后面，走半天路程去参加一个聚会，边唱诗，边分享福音。就在他日记的同一页里记载着那天早上猪圈里有五个小猪仔出生了，还记录了那天晚上的复兴大会上有三个罪人归向主，四个从前离开的人重新回到信徒中间。日记里真的无所不有：从庄稼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收获，小牛什么时候出生，卖了多少牛奶一直写到他到哪里传了福音、谁回应了神的呼召。这个“传道农场主”并没有把世俗的生活和属灵生活严格分开。

我们很高兴度假期间有两个夏天是在外曾祖父的农场度过的，我们帮他收干草，摘浆果，还在那里学会了认一些农场上的牲口，并陶醉在农场的气氛中。那个农场上的人，从我曾祖父一直到三、四代，每个人都是爱神的。这也是我发现我们家族的基督信仰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经历。母亲还是一个小女孩儿的时候，在这儿度过了几个夏天，这儿也是她的家。

母亲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还有外婆都会在那个夏天搬到农场附近住，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是个很大的家庭。我们在峡湾里游泳、钓鱼。父母喜欢钓鱼，直到很晚才到家。带回来能装满一条船的鳕鱼和鲭鱼。家里人就逗他们说，他们是神所喜爱的孩子，因为他们捕到的鱼最多。

我们选择了贫穷

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远不如亲戚们过得富裕，这不是一个秘密。父母会公开地和我们讨论这件事，他们希望我们明白，我们简朴的生活不是上帝强加给我们的，而是他们成为传教士时，为了神的国度而做的主动选择。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因贫穷而受苦待了，尽管我们不能像表兄妹们那样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我们很配合父母的选择时，我们感觉到这似乎也是自己的选择。

当然，在挪威要想做到这点，会更困难一些，因为在这儿，我们都是些“穷亲戚”；不像在中国，我们会比周围大多数人过得更富足。但是无论在哪，父母都为我们做了好榜样，他们不会从别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所拥有的，而是从供给我们日常需要的上帝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父亲会坐在风琴旁，用他深沉的男低音唱赞美诗：“在我父那里有许多的住处。”然后他会扬起头来，用他最大的音量唱起副歌“我是王的儿子[I'm a child of the King]”，这时，我们全家人的信心也会随着

父亲高亢的声音而增加。

父亲有这种观念，是因为他从小也是在这种观念下长大的。当祖父扫了一天的烟囱，黛丝[Tes]姑妈报告说，祖父的口袋里只有六个小钱了，这时候黛丝正在为八个饿肚子的兄弟准备做饭，就问到：“难道没有更多了吗？”

祖父回答说：“没有了。今天我在贫民区干活，我没法向人家要报酬的，他们连吃的都没有。”

黛丝争辩道：“但是爸爸，我们也没有啊！”当姑妈给晚辈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她会加上一句：“父亲就是这样，心肠太好了。如果他看到别人有需要，他宁肯自己受苦，也不愿看到别人受苦。”

在学校里，我们会做一个类似于“富人穷人”的游戏。按字母顺序，把我们将来长大以后可能成为的那种人排列出来。“百万富翁[millionaire]”的后面才有“传教士[missionary]”，当然每个人都想成为百万富翁，所以嘲笑我想做传教士。就在那时，我带着坚定的信念却不够谦卑地回应他们：“你们有谁周游过世界，去过 18 个国家？”然后我就很快列出一张让他们惊叹的清单，上面写满了我去过的地方，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小瞧我这个小传教士了。

我们选择的贫穷可以有很多补偿方式，有时那甚至不是我们有意为之。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必须由公立学校的牙医为我们检查牙齿，因为我们家孩子的牙齿都很好，牙医就问母亲，她在中国给我们吃了什么。

母亲回答说：“没吃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没有糖果给他们当零食，所以就只能给他们吃葡萄、喝羊奶。”

“这就对了”，牙医说：“没什么东西比这两种东西对牙齿更好了。”

母亲继续解释我们是如何把两头强壮的瑞士山羊进口到河曲的。我们当时在骡子的鞍上绑了两个木箱，让它们在里面站了五天。然后她讲到河曲位于黄河岸边的葡萄园，我们全家去摘了很多葡萄，把葡萄弄碎，存储起来，以备冬用。那个医生对此惊叹不已。

以父母为荣

十岁那年，我逐渐地开始看到父母在性格和价值观上的另外一些侧面。从上次休假又过去了将近八年的时间，他们“终于”各自置备了一套新衣服。母亲从陶拉克森[Rasmus Tallaksen]的商店回来，就是她从前作主管的那个地方。裙子、帽子、大衣，还有围巾和手套，都极其相配，穿着那一身的新衣服，她真是光彩夺目。身材苗条的她穿起这些衣服非常合身，而且我还突然注意到她那姣好的面容：秀挺的鼻子、深色的眉毛，衬托出她那温暖、碧蓝的双眸。父亲还是那样气宇轩昂，从外表到举止都更像一个运动员而不是传道人。在克里斯蒂安桑镇上，他倒立着走过这个城市的一个街区，赢得了表亲们的一片赞叹。夏天我们在家时，他会和孩子们一起玩翻跟斗或叠罗汉，他垫底，小托杰在最上面。当我发现其他孩子多么喜爱他的时候，我对他又有了新的认识。

如果有大人担心他，觉得他应该在下一个聚会之前休息、安静一会儿，他就会讲一个旅行布道家的故事。有个布道家要去一个农场，那儿的人已经准备好在

晚上聚会前，用美味的晚餐宴请他，但他却让这个家庭主妇极其失望（她已经准备好了饭菜），他说，他从来不在讲道之前吃饭。后来，这个农场主就驾车送他去聚会，他们回家后，那个传道人就上床睡觉了。农场主的妻子问起讲道的事情，农场主干巴巴地说了一句：“我看他还不如吃东西了。”

我对父母的公开讲话也有了新的体会。我还记得一个主日上午的布道会，父亲证道经文是传道书 12 章 1 节，当趁着年轻，记念造你的主。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信息。1988 年我去克里斯蒂安桑的时候才发现，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还记得父亲讲道内容的人。有一天，我记得一个亲戚，他回想起父亲在 1937 年关于《圣经》的诗篇 16: 8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做的讲道。就站在街上，那位 90 岁的老人告诉我父亲怎样活出了那篇诗章的精神，就活在上帝的同在中，不论他在挪威或是在中国的骡子上。

偶尔在传教士的聚会中，我们孩子们会被要求唱一首中文歌曲。爱德华可以不必，结果就剩下哈肯、托杰还有我唱。我站在中间，用我最大的声音唱，而让我为难的事，我的小弟弟们都太腼腆不敢唱得太大声。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对付他们，就是想让他们唱得大声的时候掐一下他们的后背。这招儿真是屡试不爽！

母亲休假的时候也很忙，她在克里斯蒂安桑镇上开设了护士宣教小组。母亲虽仍属于奥斯陆的这个团体，但她认为当地也应该有那样的团体。母亲的目的是在做传教士的护士和待在家乡支持她们的护士之间建立一个共同体。一天母亲通知说，所有感兴趣的护士都要来我们斯凯普园 [Skippergarten] 街的小家。向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护士说，我们家当时甚至不能给客人提供足够的椅子，但是我们却拥有其他阔气的家庭所缺少的热情。每个人都喜欢那次的活动，尽管很多人从始至终坐在别人的腿上。她告诉我，母亲的笑声和阳光般的性情延续了下去，“她的精神仍活在我们这个群体中间”。五十年过去了，她们的成员人数已经逾百。

还是那个护士告诉我说，托杰才五岁的时候有多为他妈妈的医学成就而自豪——他在我们的斯凯普园街上来来去去，大叫道：“我的母亲是全中国最好的医生。”当然，介于最近的诊所或医院需要十天旅程，母亲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聚散两依依

父母作为传教士，我们为他们的公众行为而骄傲，同样的，他们卸去外面的身份待在家的时候，和家人、朋友在一起也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一方面，他们有一个超越自己的理想和使命，因此不像我所见到的许多成年人一样陷入日常琐事之中。然而另一方面，这种与世人的分别并未有碍于他们成为一个热心的人，反倒使他们更乐于跟人建立个人的关系，甚至是跟那些不想跟基督信仰扯上关系的人。

父亲有一个侄子，那时候才十几岁，现在依然记得叔叔亲切的目光总是让他很自在。“在他的心里，他和孩子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距离，”他说，“他能马上跟我们这些男孩儿打成一片，我们也从不把他当长辈看。”

“他对人生任何一个观点，我都乐于遵从而不感到有任何压力”，他接着说到，“我还记得在你们家花园里和他一起踢足球、翻跟头。但是我最讨厌跟你们一起在码头唱诗，因为那也是你们要离开去中国了。”

十八个月的休假即将结束，这也令我们伤感。作为一家人，我们曾多次一起步行十多公里去爬山、看海，在冬天还有很多次的滑雪旅行。

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很快离别的日子就到了，那天似乎半个城的人都来到港口为我们送行，还都拿着鲜花和大红盒子装的孔哈肯[Kong Haakon]糖果。记忆中，全是岸边的横幅，唱赞美诗，还有泪水。但是在老公牛街的那个家里，祖母却躺在床上正独自伤心。每当她的某个儿子要离开家，她总是会这样。但是这一次，她感到了有些不同寻常，哽咽着说：“我将再也见不到我儿子彼得了。”

第六章 中国的战争

几天以后，我们乘火车从奥斯陆出发，路过瑞典，到达德国。在那里我们上船出发前往中国。在那列火车上，也就是8月8日早晨，我度过了十二岁的生日。就在那时，我不知怎么的，感到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结束了。我听了太多的成年人关于中国紧张形势的谈话，才知道了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但我们还是照旧庆祝了我的生日：家人为我预备了礼物，带我去汉堡一家舒适的餐馆生日聚会。然后在布莱曼[Bremen]我们登上了斯查恩豪司特[Scharnhorst]号，开始了漫长的海上航行。

其间，在挪威，宣教机构的管理人员不得不在宣教刊物上解释，为什么他们把传教士派去一个被日本已然侵占的国家（1937年7月）：“当我们的传教士在八月六日离开的时候，情况不像今天这么严峻。当时动乱只限于北京和天津。我们的计划是避开有动乱的地区，从上海直接到山西。”

热那亚危机

他继续解释道，我们的差会和挪信义会已经发了电报，告诉那些还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停留的正准备去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可以终止旅程。那封电报是在我们的船在热那亚码头靠岸的时候打过来的，那时我们正在计划我们的观光。所以中国的战争打破了我们安静的航行。

每当每日新闻在广播喇叭里面响起的时候，我们都会被打回到我们正前往战争之地的现实。日本人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先进的战机，他们正在向那些中国的大小城市快速推进，那些地方离我们的家很近，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没法视而不见。相比之下，地中海却相当平静，玻璃似的天空中几乎没有半点动静。我在铁路旁站了几个小时，守着这片宁静。

正当父母和其他挪威人在一间小屋里聚集一起祷告、商议时，那片宁静似乎也被打破了。他们应该回挪威吗？还是进入那个前途未卜、极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

同时，我们孩子们也在甲板上挤在一块儿分享我们的恐惧。我们会被杀吗？另外，如果返回挪威我们难道不会失望吗？就像在冒险开始之前就被打断一样！

大人之间也表达着类似的恐惧。父母没说太多话，但鼓励他们的朋友们说出他们的忧惧。所有人围在一起分享同一个的信仰和同样的恐惧，这种方式有利于消除紧张。虽然有些摇摆，但是正像他们说的，他们记得所有的传教士都有一个从上帝而来的使命，这使命超越他们自己，超越他们的人身安全和个人目标。不论有没有战争，为了神的国度，他们都愿意将这使命带入中国。也许他们想的跟我们孩子一样，如果回去了，就会错过他们这一生中最伟大的冒险。他们引用了耶稣在路加福音9: 62中的警句，作为对其困境做出的明确答案：“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于是，当斯查恩豪司特号从热那亚离岸的时候，所有的挪威传教士都还在船

上，并且要前往中国。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所有人都放松下来并好好地享受着旅程。在海上的五周，时不时地在许多港口停泊，被我们当作是对坎坷的宣教冒险的奖励，因此我们充满感激地接受。在甲板上为孩子们举办聚会，和密友们游泳，还有母亲每晚穿着长裙，像一个女王一样，跟她的国王手牵着手一起赴宴，我记得我当时真希望航行永远都不结束。然而，我们还没有享受够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骑大象，也没有看完苏门答腊岛的棉兰上的风光，它就结束了。

出于船上一半旅客的要求，这次航行到了马尼拉就突然中断了。当听到日本人向中国推进的消息时，人们似乎一下子恐慌起来。我们没有像原计划的那样在上海抵达，而是在香港上岸，后乘火车到达长江沿岸的湖北汉口（现在是武汉的一部分）。爱德华还记得我们从火车上就看到年轻的士兵们等候过江的情景：许多人绑着绷带，大多数人都骨瘦如柴，他们憔悴的脸上充满了恐惧；一个士兵躺在担架上在痛苦中呻吟着，但他得到的唯一“安慰”就是他长官的飞来一脚。战争残酷的现实撞击着我们的神经。

在汉口，我们遭遇了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空袭。开始，我们站在房顶上，看着飞机企图炸掉河上的船只。作为孩子，我们总是爱看中国的放鞭炮。但这是不同的——炸弹是巨型的爆竹，它的光使我们头晕眼花，声音震耳欲聋。我们紧盯着河上的船只“守卫”它们，看到它们一个都没被击中，没有在我们眼前炸成碎片，我们松了一口气。而炸弹都栽入了水中，在里面安全地爆炸了。

当投炸弹的人离开河面而飞向我们时，我们都叫回到我们寄宿的内地会家里，藏在楼梯下面以求庇护。所有的隆隆声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从未听到如此震耳欲聋的大声。许多飞机在头顶咆哮的喧嚣，会突然被在某处刺耳的爆炸声所淹没，而那爆炸就好像在隔壁一样。我想起了那些声音，还回忆起在那之后的想法：在这些飞机的上面，我们的神他顾念我们。

南下桃花岭

山西被卷进了这场与日本的冲突，而且很快就证实了，四个孩子已经不适合呆在这里。然而上帝早已预备了一条新道路。在我们还在斯查恩豪司特号上的时候，我们的挪信义会朋友曾向我们发出邀请，说如果我们不能定下来去山西的挪威学校的话，我们可以去湖南。所以我们搭上了南下的去长沙的火车，然后由那儿去桃花岭，就是挪威学校所在地。由于当时没有提供食宿的设施，所以这就意味着母亲必须留下跟我们一起，同时，父亲还探究了独自去山西的可能性。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报纸上的新闻，看战争不太紧张的时候是否有条路线能回山西。

当父亲等待着来自同事们的建议，告诉他如何走、走去哪儿，却是上帝在桃花岭为他开了一扇门。一个传教士为《传福音者》[Evangelisten]（一本在挪威流行的基督徒杂志）提供的撰稿中，写到过父亲在桃花岭的事：

我们很荣幸能和托杰森一家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宣教的心尚未满足……然后有一天，我们被号角声惊醒，开往前方的部队正经过那里，他们的头盔闪闪发亮。又有一天，另一队士兵路过，但是没有闪亮的头盔，也没有号角。他们身负重伤，衣服破烂，蓬头垢面，疲惫不堪。其中有一个头上还缠着绷带，另一个人失去了一条胳膊。还有一个人拄着拐杖跛行，他们

都是从前线回来的。

接下来进城的是一群难民——妇女和儿童，年老的和年轻的。他们精疲力竭，身上肮脏，衣服破旧，背井离乡。他们所爱的人被日本人杀害了，或者在成千上万的人逃离战场时，被踩在脚下。现在他们和陌生的人一起出现在陌生的城市里。

大部分来自北方的伤员和难民都听不懂湖南方言，但是托杰森他们听得懂。突然间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起早贪黑地忙碌着，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传教士的样子：先是有一群士兵围着他，听他讲他个人生命中经历神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又出现在一个古老的大院里，那儿有成百上千的难民，正寻找栖身之所；接下来他又快速飞奔去河边的一个寺庙里，去看那里的和尚。

当他和人们讲话安慰他们时，他的笑容给他们带来了勇气。在那儿，他给他们发小册子，或是说几句与他所爱的主有关的话。他在这些人群中走动着，心里平静安稳，灵里感到极大的自由。这就是我对他的印象——总是时刻准备着安慰和帮助别人，热心向人传福音，当看到新生命哪怕一点点成长的曙光，他都会充满宣教的喜乐。

但是最后父亲离开了我们和这份新的宣教工作，想回到河曲。他最远到了河南，一个位于山西南面的省份。在那里他和路德宗的朋友们待在一起，继续服事伤员。没能回到河曲还是有一点好处，就是父亲可以回到桃花岭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路上他在汉口停了一下，从斯查恩豪司特号上取走我们的行李，因为之前我们离开汉口的时候它还没有到。武汉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非常冷，我们又没有冬天衣服，所以父亲的到来是双重祝福。

母亲写信给外婆说：

我们非常感谢上帝，能让我们全家相聚再次共度圣诞。并且解开那些自从离开挪威就没有见过的包裹，也真是让人高兴。看到我们收到的东西，真的发现你们对我们太好了。在这些日子里，想到自己是被爱着的，被别人在祷告中惦念真的很好。所有这一切都在我们圣诞节的庆祝中用上了：我们穿上了新衣服，家里所需的也都有了，还有山羊奶酪，挪威腊肠、巧克力……孩子们总是不断听到战争新闻，在路上看到受伤的士兵。但令人惊奇的是，孩子们不再为害怕战争而恐慌。这真是神的作为！

所以尽管在打仗，我们还是度过了一个完美的圣诞节。父亲带回从挪威寄过来的大箱子，里边有许多用来装饰房子和树的东西。桃花岭还有几棵常青树，所以我们就把松树枝插在门上、窗户上、还有门口的地板上，就像我们以前在挪威农场的房子里做的那样。假期的时候我们邀请一些朋友来我们家，他们有的是夫妻俩，孩子在挪威读书，也有一些孤独的丈夫们，他们的妻子带着孩子回了挪威（为了躲避战争）。他们都喜欢和我们这个有四个孩子的幸福家庭在一起。父亲给他们讲故事逗乐，然后又会突然谈到上帝，让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就像讲笑话一样很自然。有一个年轻的传教士说道，他很佩服父亲能这样轻松的谈论上帝。

父亲回到河曲

这个温暖的圣诞家庭团聚后，父亲又和那些伤员和难民度过了几天。但是他的心已经回到了河曲，那也是他 1938 年 1 月的目标。春节时他到了山西，而且给宣教机构写了一封信：

很高兴在我们这些传教士及其他宣教机构中，大部分人都选择坚守岗位，而不是选择逃离。他们选择留下来和人们一起经历患难，我很感恩能重新回到这里。过去的四个月里，我在湖南和河南帮忙做一些工作，主要是在伤员中间传福音。每次我遇到从山西来的伤员，我就好像碰到了老乡。北上的旅程非常顺利。有一天夜里在火车上，我和士兵们待了一夜，尽我所能地回答他们有关福音的问题。他们似乎不会厌烦。

士兵们会问：“你怎么知道你的神就是真神呢？”父亲就会拿出他那本已经很旧的中文圣经，给他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士兵们围着他，一起看圣经。回答了很多关于创造的问题之后，父亲接着讲人类堕落、需要救主的故事。中间总会穿插一些讨论，就会又花上几个小时。然后他讲起了十字架的故事。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士兵认为，让全能的上帝去死在十字架上太不可思议了，并且问道：“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按着孔夫子的教导做个好人呢？”这就需要举例说明我们是多么的邪恶有罪，甚至在我们想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行不出来。就这样，一夜就过去了。

与此同时，留在桃花岭的母亲很诧异父亲居然回到了山西。于是写信回家说：“因为山西是战区，所以没有办法拿到通行证，但他从位于汉口的八路军总部拿到了一些药，说要带回临汾医院，他还随身带了一封介绍信……现在八路军占领了山西。”

又等了一阵子，我们听说父亲已经安全到达河曲，但是对母亲来说，从那之后最大的试炼就是，接下来的六周里，没有收到任何的信。我记得我每天都会查看有没有从父亲那里发来的信件。在 1938 年愚人节那一天，我们给母亲开了一个无心的玩笑。我们激动地拿着一封信，对她说：“这是父亲的信。”而当看到母亲那张失望的脸，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罪恶感之中。当然，母亲后来还是原谅了我们。

五月的时候，她写信回克里斯蒂安桑：

孩子们和我都想知道，他们的父亲在战争当中怎么样了。我们知道，也许他遇上什么不测。三个星期以来，我们每天都在看河曲那边的新闻，也了解那边的战况。但是复活节过后，开始有信件过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彼得得到的很及时，正好赶在了道路被封锁之前，因日军正朝那儿进发。

知道彼得已经到了河曲，我们真的很兴奋。前一天那边教会的会众还打电话给保德确认他什么时候过去。当他骑骡子朝河曲走到时候，沿途遇到了一队又一队的人。当他到达山顶的大门时，另一队人在等着他。当时，下边是城，还有黄河像银线一样在树叶间蜿蜒着，那个地方的风景美到让人窒息。在山下更远的地方，有一群裹脚女人在等待，在更远的平原上，有一些拄着拐杖的老年妇女也在那里等着。多么喜乐的团圆啊！在教会里，盛宴已经准备妥当。饭后，还举行了感恩活动。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会让我对河曲

如此依恋。

父亲继续讲事工的故事：

首先要面对的是二月份发生的危机，当时三千名日本士兵占领了这个城市。战败的中国军队在从河上逃走之前，将城市洗劫一空。但在这个混乱的时候，我们却有极好的机会照顾那 300 名向我们寻求庇护的难民。这时候，中国基督徒如果单独行动可能会很危险。比如说，有一天，一位日本军官过来命令 3 名中国女孩儿[作军妓]。当他从我这里得到了一个非常坚定的拒绝后，他放弃了，并羞愧地离开了。

所有这些都让母亲更加思念父亲和河曲，她希望自己能够在那里去亲身经历一切，但母亲也知道如何能在她所处的环境中更好地生活。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在那个春天，她去医院慰问伤员，她们大部分来自北方，她就讲她们的方言。但因为母亲需要有人和她一起，而正好有一个名叫安东尼·哈根[Antonie Hagen]传教士对此非常感兴趣，因此这就成为他们的合作计划。但起初安东尼很怀疑妇女能否去拜访伤员。她传统地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男牧师的工作。她把这个冲突和母亲的性格写在她那本精彩的著作《在中国的生活和悬念》[Life and Suspense in China]里：

“这确实是男人的工作”，我对托杰森太太讲。

“正好相反，”她回答说，“这些粗心的男人更乐意向我们女人敞开心扉，我们能让他们想起家里的母亲。”

在任何一个需要母爱的人面前，她都把自己看作一位母亲。当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对她做出回应时，她感到无比快乐。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行为与文化相悖，因为在她看来更高的价值是，在人们受伤最重的方面满足他们。

到了五月的时候，我们在桃花岭上的学习已经结束。我们谈到要回芝罘和父亲见面，一家人一起度过暑假，但是那个五月，父亲在河曲的工作站收留了一千名难民，十天以来，每一天都有空袭。当日本兵就在城市的几公里之外的时候，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于是他们就朝另一个方向走了。但伴随战争的来临，伤寒在难民中流行开来，伤寒是由受伤的士兵传播的，而平民本应收留这些士兵并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父亲写到在河曲已经有一百个这样的病例，有一些被疾病折磨的人待在教会里。一个老基督徒领袖很关注父亲的健康，对他说：“不要走近病房，你的生命太宝贵了。”

父亲写道：“但我还要担负起责任，当情况不那么危急时，我要帮助病人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第二天上帝降下了赐福的雨。这倾盆大雨下了一天半，冲走了一千个伤员与我们在一块儿后产生的所有废物。这也对农民有益。这一年人们需要种出庄稼才能生存。”

在这剧变和恐慌的时代，也是他们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会众的带头人来找父亲，请求他不要因为芝罘的暑假而离开他们。父亲也看到许多敞开的门和敞开的心在这个时期对福音作出了回应，于是他决定留下，并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因此我们没有如原计划去芝罘，而是去了一个在山上名叫甜草坪[Tienchaoping]的一个避暑的地方，实际上那地方是在彩云之上，挪信义会夏天在那里开的退修会。我们跟这个基督徒团体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

撤离学校

同时，战争正在逼近湖南，我们还在山上的时候，挪信义会决定撤出学校，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送到香港。当然，我们也包括在内。首先，我们到了长沙，湖南的省会。由于所有的机动车都用于战争了，我们没有常规的交通工具，于是趁着一辆卡车在路上加油的时候，藏在了它的油布下偷偷搭了个顺风车。这就像神话里的一个段落。当我们傻笑了一会儿后又开始抱怨时，大人就责备了我们。他们远比我们更紧张。

当踏上了从长沙去香港的火车，我们就开始清醒过来。战争的现实再一次撞击了我们。我们经历了好几次胆战心惊的祷告，求他保守我们，因为当时日本人想轰炸我们。感谢上帝，我们钻到了一个隧道里藏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飞机放弃了轰炸我们。在我们到达香港时听到的第一个新闻就是日本人放火烧了长沙。我们再一次向上帝感恩，谢谢他及时地将我们救了出来。

香港有另外一个基督教团体接收我们。开始，我们待在巴色会，并在挪威海员宣教会[Norwegian Seaman's Mission]上学。当学校上课时，挪威的国旗被升起，所有人都可以看见。

我们在香港待了几个月，父亲终于来看我们了。我在学校的一篇作文里写道：

一天，我们放学回家后看到了手提箱，隔壁房间传来了欢声笑语。不可能是父亲回来吧？他离这儿那么远。但我们进了房间后看到他就站在那里，他张开膀臂跟我们拥抱，亲吻。啊，我实在太开心了！……我们跟他有说不完的事情要讲，就是在我们和父亲分别的这十个月发生的一切事情……他所经历的一切说也说不完……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些东西——装了满满的一个大箱子。这是父亲回来的第一个晚上，我们都睡得很晚。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很快我们就明白父亲又要离开我们了。但在他走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在一起。我们先去看了猴子，都非常开心，后来我们又去了海滩。跟父亲一起游泳再好不过了，他像往常一样技艺精湛，翻筋斗，倒立走路，他还让我们从他的肩膀上跳入海里。我们随他游向大海里的一艘大船，然后我们吃了冰淇淋。就这样，跟父亲在一起的最后一天结束了。”

我没有写进作品的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在中国人面前失态。通常他对中国人非常礼貌，他们也很恭敬地对他。但是那个海滩俱乐部门口的门卫却用很世故的方式对待他，这种方式让父亲促不及防。那个人说了入场价后，父亲忘记了这里是英国殖民地，开始跟他讨价还价。毕竟他在中国的这二十年，每次花钱的时候他都要讨价还价，现在又有何不可呢？尤其是父亲刚从饱经战乱之苦的山西过来，在那里一碗煮粟都会像筵席一样倍加珍惜，而付这么多钱进去游泳似乎显得不太道德。但对于被英国人训练出来的中国门卫来说，任何讨价还价的外国人都要被拒之门外。这时，父亲终于发火了，他以这种方式想让那个警卫知道，价钱实在太高了。

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因他的行为而感到难堪，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有一种安全感，它告诉我：父母所做的都是对儿女最好的事情。父亲没有变，是我变了，

而我那时才刚刚十三岁啊！后来父亲平息下来，付了那统一的价钱，在海滩上加入了我们中间。

父亲回河曲不久，我们搬到了在道风山的南京景风山基督教丛林道友会总院那里，那就在沙田站附近。那里的宣教士给了我们一个房子，我们就挤在那里——三个母亲、我们的老师还有七个孩子。然而我们度过了由许多基督徒聚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虽然我们从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逃出来，而且被叫作“难民”，但我们却在香港度过了丰衣足食的一年。每个周日，挪威路德宗海员的牧师都邀请我们参加一场礼拜，然后在饭店吃午饭，最后在海湾里游泳。他知道以我们的宣教薪资是无法支付午餐和在丽都湾海滩俱乐部的费用，所以他就说我们也是和他一起服侍挪威海员的，所以一切由他买单。他热情地向我们保证，在水手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需要自己付账，因为这些人自从离开家以后就没见过像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家庭生活了。我们从未想过“做事工”也可以如此享受快乐。

独自在河曲

与此同时，父亲正享受着另一种快乐。他看到了基督徒在事工，而他对此感到非常满足。由于在各处发生的爆炸，靠教会过活的，从原来的三百人增长到超过了一千人。父亲写道：“我们已经跟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起祷告过了，但也许基督徒能做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和难民一起住……日复一日地帮助他们转向上帝。在晚上我们常可以听到在不同房间的祷告和唱诗的声音。”

父亲在他 1938 年的年度报告上写道：

这一年有光明也有阴暗。我从未见过神的国度有这样的进展，也没有见到如此的黑云这样地笼罩着……秋天，日本人又开始轰炸河曲和偏关。一个原因是傅作义将军和马占山将他们的司令部设在了这些城市附近。我们的站点最近被击中，但没有人员伤亡。我们在河曲和偏关还有很好的联合会，我们在那里奔走了十年，到如今，我们终于见到了成果……现在一对宣教夫妇在那里住，他们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在河曲，我们每天晚上都在街上的小礼拜堂里聚会，教会今年有三十五个人受洗……不管是在河曲工作，还是在去往禾场的漫长旅途中，我们都能体会到那看不见的上帝正在一步步地使大门敞开。

这个报告还附着一封父亲写给我的私人信件，还交代母亲把这封信作为航空邮件寄到挪威去。他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收到了自己孩子的信件，对此他深感欣慰。那年的圣诞，父亲和我们大家分开了，但至少他收到了我们的来信。可他并没有谈到自己的圣诞节是如何度过的。相反，他告诉我，我在河曲的朋友们非常虔诚地去礼拜，还有很多孩子在大街上拦住他，问他主日学圣诞节的庆祝会什么时候开始。基督徒们都在忙着为孩子们做准备，买了成袋的水果和坚果，还有麻糖（我最喜爱的中国糖果，用糖蜜和芝麻做成）。他也写到他的同工们，住在离他有两天路程的地方，送给他一匹马，希望父亲可以骑着马过去和他们一起过年，但父亲说他走不开。他是多么热爱河曲的人们啊！

学校危机

那时，我们在香港开始过圣诞节的假期，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学校里最后留下的学生。由于战争原因，学生要么是没有从挪威回来，要么就撤离了。所以我们所热爱的学校在1939年夏天不得不关闭了。在那两年里，我们被全世界最好的老师激励着，爱德华谈起她的时候说：“我想再也没有像她这样影响我的老师了。”我同意他的观点。她是那种少有的既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同时还能激励学生的老师。她很喜欢历史，所以在讲历史的时候她能让奥拉夫二世国王（公元995-1030年）鲜活起来，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都看着我的眼睛，好像教育培养我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现在母亲必须要做出一个没有父亲参与的决定——因为写信太慢了，而这个决定她又必须马上做——我们要在哪里继续读书呢？在香港还是芝罘？当然她给父亲写信讨论了这些，但还没来得及等到他的回信，她就已经被迫做出了决定。两个决定都意味着上课的时候都不再用挪威语而是用英语了。当我们意识到母亲思想上的沉重和不安时，我们为此跟她讨论，并且一起祷告。她跪在那里很长时间，而且也一个人慢慢地散步很久。当她毫无保留地向别人谈起这个决定时，她知道最后她必须独自去听上帝“那微小的声音”。

她这样度过了沉重的几周，然后宣布芝罘似乎是最正确的选择：那是内地会的学校，同时兼顾学生的属灵生命长进和知识的教导。母亲再次提醒我们，她和父亲以前就一致认为，我们不应该待在发生战争的地方。虽然芝罘也在中国，但它是日寇占领区，在那儿没有战争。芝罘被称作“在一个幽静的港湾，面朝黄河、背靠大山，能给传教士的孩子属天的平安”的这样一个地方。

最后一个团圆的夏天

我们又一次离开香港那个不错的基督徒团体，到芝罘加入另一个团体。当我们坐船到达芝罘时，几乎不认识任何人，但是很快，我们就像家人一样被接纳。在中国战乱时期，神的家真的是又真又活。

我们到达芝罘一周后，父亲从河曲赶来。我们再一次为一家团聚而感恩，因为我们现在学会了不把这种团聚当作理所当然的，而是神所赐的礼物。除了这个礼物，上帝还给了我们一个小屋，我们在那里庆祝团圆。母亲写信给外婆提到这些：

这是一个主日的下午，港湾在我们面前寂静祥和，我们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船只，更增添了几分平和。我们仍然能在这片充满灾祸的土地上活着真是很不寻常，但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夏天，最感恩的是我们全家能再一次团圆。感谢神把彼得带到我们身边。而且他也看顾彼得在战区所受的压力，因为神的看顾，彼得才没有被击垮……村舍位置很高，在那儿可以看到秀丽的景色。这让我们又想起了克里斯蒂安桑，房子在村子里就像一座小别墅，我们把它当作自己的家，这让我们感到似乎又回到了挪威的家里。现在已经到了八月中旬，时间太快了，我们在这安静的家里待了两个月了，马上又该离开了……我们再一次地要面对分离。

我们很享受在村舍的那些日子，每天都到海里游泳，大部分时间母亲在忙着给四个孩子缝制四个季节的衣服，在每件衣服上缝上每个人的名字。那时，父亲

带我们去海边游泳，也做一些小孩和年轻人在海边做的活动。母亲独自在家，她很担心会离开我们。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她不仅要面对她作为一个母亲和一个传教士职责之间的冲突，更难的是还要在跟丈夫在一起还是跟孩子在一起的愿望中挣扎。

现在我们远离了父母，进入一个有三百名孩子的英属的寄宿学校。母亲将这看作是上帝对她祷告的回应，可以让她跟丈夫一起回河曲，但她这么想并没有让我们的分别更容易接受。在这一点上，她实际上还计算过租一个房子陪着我们的可能性。但这个计划被放弃了，因为她想着那个她深爱着的、和她有一样呼召的男人，他们已经分开快两年了。

父母二人在战乱时期中国的生活没有让他们有简单明确的选择。他们都知道离开孩子会很痛苦，可他们也知道带我们进入山西战区绝对是错误的。同时，他们意识到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亲近了，同时也期待着田园生活能够继续。

但我们在行动上仍是一个朝拜上帝的家庭。尽管表面上我们都忙于为上学收拾行李、关闭那间小屋，但潜意识里我们这些孩子却在吸收着一些父母关于上帝国度、超越我们自己的那个使命感。当他们谈起河曲是上帝呼召他们去的地方时，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不能叫他们无视那呼召。所有这些不成系统的概念都在我们面对分离时藏在表面下，每天我们都为多了一天在一起而感恩，粘着彼此，因为那分别的日子近了。有很多情不自禁的拥抱、止不住的眼泪，虽然我们试图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勇敢。

分别对哈肯来说是最难的。他就要在一间英国学校中念五年级，但在这之前的挪威学校里他甚至没有上过英语课。然而这决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一天他突然推到了已经打点好、就要合上的行李箱，挑战母亲说：“上帝让你作了我母亲，所以你必须留下。”听了这话，母亲的心被刺痛了。谁能跟他这样的逻辑辩论些什么呢？这次哈肯的爆发使分离变得更难了。

1939年9月2日，我们作为一个朝圣的家庭，最后一次聚在一起，读《圣经》的诗篇121篇，这是我们在旅行前总要读的诗：“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对父母来说是可以信靠的永恒的应许，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要离开我们了。

图片说明



图 1：彼得•托杰森（叶永青）即将出发去中国之前，19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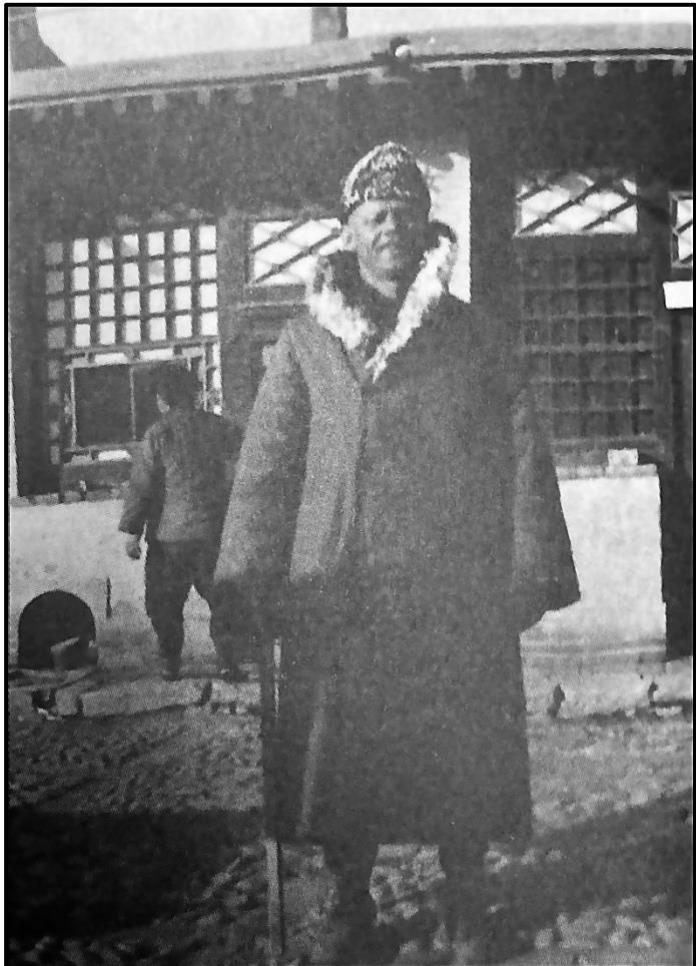


图2(右图): 彼得·托杰森在山西的一个中国家里, 1930年。

图3(下图): 河曲当地的信徒。





图 4：托杰森一家旅行时乘坐的出租车。



图 5：托杰森和瓦波格、爱德华和凯莉在山上，1926 年。



图 6：瓦波格领着 1 岁的凯莉和 2 岁的爱德华准备乘骡子出行。



图 7：爱德华、凯莉还有哈肯在山上。



图 8：爱德华和一个朋友准备玩冬天的游戏。



图 9：哈肯、凯莉与托杰乘一头毛驴前往沿海地区。



图 10：最后在挪威的全家福，1937 年。



图 11 (左图): 瓦波格在 1930 年末。

图 12 (下图): 托杰森家四个孩子 1982 年重聚, 爱德华(和詹妮[Jenny])、凯莉(和鲍伯·马尔卡姆[Bob Malcolm])、哈肯(和卡伦[Karen])、托杰(和赖登[Reidun])。



第七章 任何代价都不昂贵

在我们延长了所有的告别仪式并不止一次地擦干眼泪之后，父母上了黄包车，我们踮起脚得到最后一吻。当时，爱德华十五岁，我十四岁，哈肯十一岁，托杰七岁。当他们离去时，我们毫无激情地向他们挥手告别，他们要坐船去天津。然后我们机械地踏入了院门，从砖墙上面看过去，瞥到我们父母，他们的头随黄包车的节奏跳动着。这时我就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俩一起了。

这个念头像一个微妙的奥秘一样来自我的内心深处。我没有马上认为这是上帝向我说话，但后来我认出这是上帝那“微小的声音”。这不是个令人恐惧的经历，却是一个平静的内心确信，它被包含在上帝对我们家无限的爱这个更大的确信里面。

当父母到达北京后，一封来自哈肯的信已经在等着他们。在信中，哈肯写到就在那个没和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他上床之后就像约伯那样跟上帝理论。而上帝温柔地对告诉他，他会像充满爱的父母那样去爱哈肯。第二天早晨他就写信给他们：“现在耶稣就是我的父亲了，所以你们离开了我也没关系。”

就在父母离开我们的那天晚上，学校的晚祷会上，我们唱了赞美诗《我时刻需要你，亲爱的主》。我从未感到我需要某个比我无限大的一位，而事实上那时我就是需要上帝。我知道我们过去的那种家庭生活一去不复返了。由于日本人发动的这场战争，我们四个的生活翻了个儿。现在我们在一所英属寄宿学校，英语成为我们获取教育的媒介。爱德华和我之前学过英语，但哈肯和托杰开始在那上课的时候甚至在此前没说过一句英语。然而，语言的问题并没有使与父母分离变得更容易。

秋天写信给挪威的外祖母时，我从另一个角度来面对分离：“我们现在自己在芝罘，期待着一个美好的圣诞，尽管这是第一次远离家的圣诞。《圣经》中《马太福音》19: 29 说到，为上帝的缘故离开家的人会得到特别的奖赏……这是让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前往山西

其间，父母刚到达北京就听到山西所有城市都被攻占的消息。日本人的下一站就是河曲。很多从山西撤离的传教士认为通过日军的防线是无望的，还说最好不要在这个危急时刻尝试这样做。由于日本人的反英姿态，英国的传教士被迫撤离，但这只是更增添了北欧的传教士对坚守岗位的紧迫感。那时还没有一个北欧国家被卷入二战（二战在欧洲打响是在 1939 年 9 月），这就使北欧的传教士在日本人面前显得中立。

“挪威人和瑞典人身上的责任看来比以前更大了，既然大门对其他人已经关闭，我们就是唯一可以得到许可进入内陆的人了。”我的父母这样写给在挪威的宣教机构。河曲内忧外患，父母去了位于北京的日本最高当局申请通行证。

“我们跟挪威是好朋友，”那个军官说，“那是个小国家。那个写《培尔·金特》的人叫什么名字来着？”他们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写下了“亨利克·易卜生”。父母都震惊了。

“还有另一个——辛诺夫·邵巴肯[Synnove Solbakken]？”他们的日本朋友继续说道，“哦，对，是布久恩斯提杰恩·布久恩森[Bjornstjerne Bjornsen]。”他就又在垫子上写下了这些名字。“在我的国家，我们收集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将他们译成日语。但中国人却没有。”他自豪地说道。然后他给了父母到河曲的通行证。

到达山西

父母没浪费任何时间就上了去山西的火车。1939年9月20日，他们从大同写信给在挪威的宣教机构：

现在我们终于到了古老的山西这个好地方……我们的祷告是如果这与上帝的旨意一致，就请上帝为我们在去河曲的路上开路，让我们再次与那里亲爱的人们一起工作，在剩下的时间里帮助更多人归信耶稣……我们还感觉到中国这里的门会对我们关闭——也许比我们预料的还更快。

在乘车到达终点站山西的宁武后，他们还要走四天。当时几乎所有的骡子都因战争被征用，然而奇迹般地出现一个男人提出可以带他们去河曲，他有两头骡子。但两天后，当他们到达神池（日军控制下的最后一个前哨），那个驾骡子的人被吓怕了，不肯再往前走。母亲写信回挪威的家说：

房屋都被遗弃，部分城墙已毁。镇上的主要大街——平时是个热闹的地方——却像给死人预备的地方。见不到一个中国人——除了穿外国制服的警戒。我们继续走，就发现房子几乎都被炸毁了……在孤单的朝圣之路上，几个卫兵拦住了我们，他们很惊讶我们居然是往驻扎很多中国军队的河曲去。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小旅馆或是人家可以让我们落脚过夜的。所以我们走出了城，去了周边的开放村庄。来了一个农民，他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墟中的房子。我们在一个棚子下搭上了我们旅行的轻便床。那儿曾经是一户人家，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被毁了。我们没有食物，没有水，也不能取暖，那个泥炉子也毁掉了。最糟糕的是那个驾骡子的把我们的东西放下时，告诉我们他不敢穿过敌军防线去到中国人的那边。

回河曲需要驴

“对我们来说这似乎不太妙，”母亲继续道：

在这样一个被遗弃的地方，我们从哪儿能弄头牲口来呢？但我们知道上帝会看顾我们的。他从来不让我们失望……几个小时后，一个男人赶着牛过来了，于是我们有了开水。一小会儿，那个人又拿来了一脸盆的面条！我们为食物感谢上帝，就没有想太多关于那个脸盆和那个男人瘫痪的手。（通常中国人不会用脸盆装面条，一个人的手瘫痪了也通常不会供应食物，但这是战争时期！）但当这个人走后，我们准备入睡时，却感觉到分外压抑的寂静，这使我们甚至更加紧张。这个镇子和周围的景象一片死寂，唯一我们能看到的活的生命就是城墙上的外国士兵，在怪诞的月光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但后来，我们又一次将我们的情况向上帝陈明，我们就马上入睡了。

后来我们在夜里被人弄醒了，就是那个先前那个驾骡载我们、又离开我们的人。他来告诉我们他在村子里找到几个有驴子的农民，他们愿意带我们去河曲……我们敢肯定他是上帝派来帮助我们的，虽然这个人不敢去，但他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愿上帝祝福奖赏他。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安静地离开了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沿着城墙，我们来到了前面的山，又经过了一个日军的哨岗后，我们终于又一次到了中国的领土上。

进入河曲

骑在虚弱、几乎要饿死的驴子上很辛苦地走了两天（因为没有可用的骡子），父母在 1939 年 9 月 30 日终于成功地到达了他们魂牵梦绕的河曲。没有人想到他们会来，因为基督徒几乎已经对穿过敌军防线失去了希望。但两个传教士回来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家兴奋地跟过节一样。

母亲写信给在寄宿学校的我们，提到他们回家的旅程：“这是何等的喜悦啊！我们下午一到就在教会开了祷告会。很多满怀信心的妇女都来了。会后，她们都来看我们，你可以想象那种欢欣的场面。邻居们也跑来了。所有人见到我们都特别地高兴。”

尽管母亲极度疲累，因为不习惯骑驴，还是那头小驴，身上磨了一些伤，但她还是坚持到跟每个人打过招呼后才休息。主日好像成了节日一样，教堂里上午下午都挤满了人。庆贺还在继续。

但回家的另一些方面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对母亲来说，她自从休假就再没回过河曲，而河曲也起了变化。“这场战争给人民和土地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她这样写信回挪威：

第一件震撼我的是这里揪心的沉寂，好像这城市被遗弃了一样。许多人扔下这儿的一切跑到偏僻的小山村，另一些人逃到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去了……留下来的人则饱经忧患，每天担心的就是日本飞机会不会来扔炸弹……城市里随处可见倒塌的房子和废墟。主要街道的生意都停了，稍大一些的店铺也都关闭了，只有下午晚些时候，一些小商铺才会开门……战争爆发了，瘟疫也随之而来。两年来，斑疹伤寒和流行性伤寒在河曲附近的几乎每个村庄里肆虐……全家人都病了，躺在那里，没人管就死了。因为怕被传染，所以没有人敢帮助他们。

她接着描述了饥荒和干旱，还有在他们甚至连自己都喂不饱的时候，还需承受供养中国军队的重担。知道了所有这些坏消息之后，母亲又返回了信徒中间。在回到河曲的第一个月里，她就办了一个三天的秋季聚会，参加的基督徒把房子挤得满满的，于是母亲又把这个聚会延至第四天。

位于镇上主街道上的福音堂再次开放，镇子附近的许多人对父母能回到他们中间也分外感激。在日军空袭最猛烈的时候，父亲独自在这里工作，他们中有许多人就是在父亲的帮助下在教会找到了避难所，当时得到帮助的有一千多人。人们在紧急关头走投无路，是教会的两层大房子和防空洞给了他们安全感。母亲在信结尾用了《圣经》中的《路加福音》19:44。她渴望人们能向主打开心，他们就可以“知道[神]眷顾[他们]的时候”。

令人不安的消息

在 1939 年 12 月 12 日，母亲写信给她的母亲，说起一个只有作母亲的才能真正理解的试炼：

我们回家后只收到了一封孩子们的信……就在这时，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走了四天的路，拿回了整整一捆他们寄来的信！对我来说那真是如同盛宴！但这种欢喜也就这么一次。接着，我们就接到一封电报，说两个星期前托杰得了白喉，但正在好转。是的，我是觉得这些都太折磨人了，但是……若没有主的允许，什么都不会发生。无论什么情况，他都是我们的避难所。

知道孩子们托给了可靠的人，而且朋友们都在尽最大可能地帮助他们真是很好。但当有孩子得病时，我们巴不得陪在他们身边，我现在真是这么想的。希望托杰能好起来，那样就可以在圣诞之前出院了……他们的寒假是从十二月到一月，大部分的孩子都回家了，但今年对我们一家来说，这些都不太可能了。就快到圣诞节了，我们还不知道能否有人把他们的信及时地带过来。他们所在的宁武在日军势力范围的边上，但穿过那道防线仍然很难。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托杰病了，除此以外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焦急地等着他们的来信。

然而，怀着无惧的心，母亲在同一天又写了另一封信：“只要门户仍然开放，我门可以毫不隐藏为上帝工作，就已经是很好了。不过我们感觉好像……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了。”父亲也在早些时候寄了一封信回挪威，其中表达了相似的感情：“很多人认为，外国人很快就不能得到许可在山西生活和工作的了。但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只要这里还有机会，我们就要继续下去。”

这些信是在一所倒塌的泥砖房里写成，就是从我还是一个小女孩儿的时候就住的地方，每年它都需要修补。它没有地基——只是由一些泥砖、少许木梁和一个平顶组成。最糟糕的是，父亲甚至没法挖一个防空洞。母亲写信回挪威说：“彼得想挖一个防空洞，但发现水位和水平面太近了。所以要是挖一个几尺深到地下的洞，水肯定会渗进去的，这会使土壤凹陷。不过，教堂的防空洞情况良好。”

在他 1939 年初的一封家信里，父亲写到了这个防空洞：

一帮人为了这个防空洞辛苦地工作了三个星期，而我是其中之一。为了防止日本人来的时候给他们提供防护，古老而美丽的河曲城墙被拆毁，而我们也因此免费得到了很多砖。这些砖是现代砖的五倍大，更结实，就好像是专门为我预备的，因为我们正需要足够结实的材料来建造防空洞。更妙的是，我们在地下二十尺深的地方砸到了岩床，所以现在地基也足够结实了。尽管，如果大量人涌入的话，这里的空间只能容得下妇女和儿童，但这仍然增加了这些基督徒的安全感。

轰炸和事工

在那最后的一年，父亲多次提到在防空洞里的时间，“挤得就像在罐头里的沙丁鱼”。在他写给差会的最后那封信里，他写到：

昨天，我们又待在了防空洞里。我们在那里坐了半个多小时，其间三架飞机扔了二十颗炸弹……有个人纳闷，为什么他们会持续轰炸这样一个不设防的城市……镇上没有士兵，只有很少军队分散在深山里……人们还在撤离这个镇……去内蒙古找个地方安家。很多信徒也正离我们而去。有时我们也希望能跟他们一起走，然后在河曲逃出去的难民中做些工作，他们甚至可以搭火车去那儿[内蒙古]。但，我们必须在这儿坚守岗位。

这次回河曲非常不容易。我们的房子必须修理，我们才能再过一个冬天。希望很快就能买到一块儿地方，这栋随时可能倒塌的房子不值得差会每年为它所付的房租。

事工一切进展顺利。瓦波格已经开始每天给男人和女人们上课。有许多人来主日聚会，特别是在下午来的人很多，就是他们不那么害怕飞机的时候。昨天飞机来的时候，主日学校正在上课。还好当时只有五十个学生，防空洞足以容纳他们。他们一起站在那儿——一些孩子在哭，一些孩子在祷告。信徒们在这段时间有很多祷告得到回应的经历，昨天就有三个年轻人亲自给我们讲了他们这样的经历。他们被日本人投入监牢还差点枪毙，其中一个人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十七个月，当他在急难中向上帝祷告时，果然获释。这事的成就使他信心大增。

但有一件事情父亲写家信的时候没有提到，就是他还在芝罘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军队要求使用教堂开会，而当时负责的传道人觉得没有能力拒绝他们。当父母听到这事的时候感到非常不安，但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也知道军队施压意味着什么，也知道传道人面对这压力的时候会多脆弱。

但这后来被日本的情报机构发现了，他们就进行了两三个星期的空袭，目标正指宣教站。难民和伤兵在宣教站找到避难所的事实也被报告给了日本间谍，他们就把传教士看作是中国人的支持者，反对他们侵略。于是，父母就失去了日本对待像挪威一样的中立国的保护。

1939年12月14日

但父母完全不知道日本人态度的转变，他们在12月14日照常把挪威国旗摆了出来——把国旗铺在地上好让敌军飞机在天空飞的时候可以看到。这就像每天吃早饭和读日历上的经文一样的习惯。那天，他们手牵手在日历前面读经句并背诵给另一个人听：“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9）

对父亲来说，这经文有更深的隐含意思，母亲这样告诉我们。他安静地与母亲讨论如何才能到达应许之地，就是我们可以领受上帝话语的地方。他们一起祷告：作为至高者（上帝）的仆人，他们愿意寻求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他们自己的。

那天的晚些时候，父亲就像我们记得的那样，走向那伴随他来到河曲的风琴，边弹边唱赞美诗。母亲永远不会忘记那天他是用挪威语唱“*Takk min Gud for alt som hende*”，有一节歌词特别意味深长：

感谢神祷告蒙应允

感谢神祷告不听
感谢神赐家庭温暖
感谢神在甘甜尽头仍有盼望！
感谢神赐喜乐忧愁
感谢神赐属天平安！
感谢神赐明天盼望
感谢神直到永远！

那天的余下的时间和往常一样。父亲刚去一个临近的村庄传福音回来，正赶着处理一些文字工作和其它一些实践的细节。母亲照料来诊所的病人。他们吃了午饭，小憩一会儿。就在他们准备喝下午茶时，大概两点半，就听到的空中让人不快的爆炸的轰隆声。父亲跑到院子里看了一下又迅速跑了回来。空中好像有三四十架飞机，比他在河曲见到的任何一次都多。

“我们必须原地不动，”他告诉母亲，“没时间跑到防空洞了。快，藏在床底下！”

在他跑到床底下之前，母亲刚弯身藏在了床下，这时，他们听到了第一颗炸弹爆炸的声音。这比先前在空袭中出现的声音更尖。震耳欲聋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涌过来。危机只持续了几分钟。母亲被声音震聋了，并且发现很难在浓烟中睁开眼睛。但仅仅晕乎乎地向外斜了一下眼，她就本能地知道墙压在了她丈夫身上。

母亲生得又小又轻，不知怎的突然被爆炸的风卷起，扔到一堆石头、碎玻璃和碎木头上。片刻后，她听到了丈夫的叫声，就在他被完全埋在家的废墟之前。

她认为自己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刻已经来到了，不知道自己怎么还活着。当她想起身的时候发现大火已经包围了她。她就站在那里——孤独地，无助地，在废墟之下，失去了世界上最亲的人。附近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跑到了防空洞里，除了五个小脚女人，她们跑不了。

天空又黑又沉，满是伤员的呻吟。突然，来自教会的中国朋友和年轻的商人跑来帮助母亲，尽管他们自己的家也已经被埋在废墟里。他们花了半个小时把他们的牧师从碎石里挖出来。

老全是跟父母一同在教会工作的，他从防空洞跑到教会时，还记得当时母亲的哭喊。他告诉我们，父亲是被房梁击中的，那根房梁正好掉在父亲藏身的床上。由于墙是用泥砖垒的，所以很容易倒塌。当他们从废墟里把父亲挖出来的时候，母亲在一边不停地哀求说：“小心他的头”。

然而他已经停止了呼吸。那根房梁击中了他的头部。老全告诉我们，他把盖在被子下的牧师抱在了怀里。（“我们祷告了七天，希望他能活过来”，老全补充到。）

母亲是一名护士，她看着父亲，就知道希望渺茫，但她还是做了人工呼吸。两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她休息了一下，想为父亲找一个地方躺下。十二月，刺骨的寒冷，她站在那儿，看见她的家就像一个朝街张开的大裂口子，满眼是混乱，到处是灰尘。她甚至找不到一个地方，来安置那个她所爱的人。

好像她心里也被炸弹轰了一样，她的世界从里到外地崩塌了。有那么一刻，她甚至想知道她是疯了，还是只是做了一个噩梦。而下一刻，她又希望她能和父亲在一起在一个美丽的地方，而不是在这个被分开的世界里，他的家曾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在她的绝望中，母亲和她忠诚的朋友继续围在父亲周围，直到黎明时分。他们一起交谈，一起哭泣。突然一位中国朋友过来告诉说，有人正从其他炸开的房间里抢东西。

母亲简直不敢相信。尽管她不认识那些来抢她的人，但她也想不到河曲的居民会有人在她这么痛苦的时候来偷窃。后来母亲更真切地看到了人们生活在怎样可怕的贫穷中，她就理解了这个举动。但在那时候，这无疑又给了她一个沉痛打击，进一步摧毁了她的希望。

母亲还是不愿意相信她亲爱的彼得已经去世了，这时她突然就听到了全能者（上帝）的声音：“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约 13: 7）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听到来自上帝的可听的声音，于是，她得了安慰。

当她看到日历还挂在废墟上，上边写着父亲听到的信息，她又想起了她亲爱的丈夫的声音。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和她分享这些信息。她回去一个人读那些话，那是他们在那天上午的早餐后手牵手一起读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虽然她不能理解，但她相信，神的道路高过她的道路。

然后她再次看着亲爱的丈夫，他脸上的神情很安详，没有任何疤痕和伤口。他看起来就像就是很快奔到了他所服事的主面前。她的思绪也回到了曾经相处的那些年月。突然她看到了一个事实，虽然她不能理解这所有的一切：是的，彼得·托杰森遵守了他向上帝的承诺，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就用那一句“还有我自己”来签下了生死状。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为了让别人得着生命，他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第八章 生活仍在继续

第二天早上，当黎明降临在河曲，母亲还处于惊吓之中。到了夜里，她恢复了些意识，知道还有一些很实际的细节需要处理，这些事情使她继续向前走。首先，她开始在碎石堆里寻找可以给父亲洗身的东西，并准备为他举行葬礼。外面不断传来受伤者痛苦的声音，母亲暗自庆幸父亲能无伤无痛地离世。

四天后，她在写一封信：

直到午夜时分，他才被装裹妥当，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看上去英俊而安详——脸上甚至还挂着微笑。我们忠实的同工传道人老聂和看门的老王，自始至终地在帮助我，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他们才坐下来，暗暗流泪。就这样我们坐了很久很久。他们必须发泄出来——我们就一起哭，我们三个人。

这给他们所有人心里留下了烙印，就是彼得不得不以这种方式牺牲自己，而且是“为我们牺牲”——他们是这么说的。不论是帮工还是会众，他们全都哭了。由此我愈加坚信，河曲的人们与他们这位外国朋友、这位传教士的联系已多么亲密，他们是多么敬爱他啊……很感谢上帝这次我能跟随彼得回到河曲，并且现在站在我亲爱的丈夫旁边——若是彼得一个人在这里，就不能像今天这样了。

坦特·陶拉来了

陶拉·约翰森[Thora Johansen]是他们在运城的同工，在那儿传了六周道，很快她也得到了这个消息。父亲那段时间都是和她一起在那里传道，爆炸发生的前一天才回到河曲。现在她的中国基督徒弟兄来告诉她，他已经离世了。极度的悲痛中，这一小队朝圣者在黑暗中赶了四个小时的路，只有一盏油灯来照明，到达河曲时是已经凌晨两点。当母亲看到多年的好友，自然宽慰了许多，但接下来，又是哭泣。陶拉告诉母亲说，彼得在运城的最后一次讲道中提到了天堂。但是当他在市场上几百人的人群里布道时，他所宣讲的要点仍旧是十字架的救恩。他讲道时站在一个小土堆上，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图片。当他和这些他所爱的人讲道时，他似乎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能体会人们的需要。“趁着还有时间，快救你的生命。”那天晚上，母亲和坦特·陶拉在一间残存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个能睡的地方，但是天已经快亮了。与此同时，父亲的遗体在另一个房间里很快就冻住了一——就在他属世家中的废墟里。这样当他们等候同工来参加葬礼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对他采取什么防腐措施。

“你母亲惊吓了好些日子，”坦特·陶拉后来告诉我。由于河曲持续不断地被轰炸，这两位女士找到了一处连在长城上的房屋并把它租了下来，这下她们有了最坚固的容身之所。她们白天就在城边的很少落炸弹的地方过，白天和晚上都很冷，在战争期间，穷人很难买到煤。所以，坦特·陶拉说他们可以把大块的煤绑在绳子的两端，这样她们就可以尽可能的多带一些煤在肩膀上，带回新的避难所。

12月14日这天是悲惨的一天，日本人投下了250到300颗炸弹，而后来的

日子里，平均每天都有 60 颗炸弹落到河曲。但是母亲有很大的信心，为了她的孩子们，也为了安慰她在河曲的朋友们，她相信神一定会保守她的生命。

目前的问题就是找一块墓地。母亲写信提到，在这个被父母称为家的城市里，居然找不到一块墓地，这真是一种不相称：

我们在河曲从来都没有财产，只是住在一所租来的房子里，像朝圣者一样，而现在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地方去掩埋我亲爱的丈夫。这些日子我们翻山越岭四处寻找墓地，但是没人愿意卖给我们，如今我才真正的体会到我们是陌生人，是外国人。将近 20 年了，我们和这里的人们生活、工作在一起，最后就像彼得，将生命也留在了这儿，很奇怪事情竟然是这样。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母亲明白这并不奇怪。对于那时信异教的中国人来说，坟茔不仅是掩埋尸体的地方，也是死者的灵魂享受供奉祭祀的地方。当时一位内地会的老传教士写道：

生者每年两次带着食物和水酒来到祖辈的墓地，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会来享用子孙的供祭。还要烧一些纸钱、纸衣、纸屋和纸轿椅给死者在阴间使用。

出于担心一个外国人会惊扰祖先的魂灵，所以人们不敢把我父亲葬在自己的土地上。母亲知道这些，但她还知道如果父亲果真被葬在一块儿平常的墓地中，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忍受不断有人在它的周围祭祖。圣经中耶稣死的时候也没有自己的墓地，但上帝却让一个叫亚利马太的约瑟的财主给耶稣提供了一块新坟墓（太 27: 57 - 60），同样，上帝也预备了一个人给我父亲提供了一个安息之所，这让母亲感到分外的欣慰。这位属神的人在他的田地里为我父亲划出了一片美丽的土地。

母亲在葬礼前给家里写了信，提到人们对我的父亲的惨死的回应：

我觉得，上帝是在通过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以强有力的方式对这个城市里的人们说话。如果上帝知道只有如此巨大的牺牲才能唤醒了人们去接受十字架的福音——就是彼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讲道的内容——那么我和我的孩子们也愿意为主做出这种奉献。

父亲关于神无条件的爱的信息不仅在十字架上得到了印证，还继续向那些绝望之中的人说话。12 月 14 日去世的不只是我父亲，在河曲还有上百人死于那天的轰炸，受伤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死的死，伤的伤，土砖房都成了废墟，河曲再也没能从这破坏中恢复过来。想象一个城市没有急救医院或红十字会，没有赈灾，没有任何的社会服务，人们所承受的该是怎样的痛苦！当他们认识到我的父母在战争期间和他们在一起所付出的代价时，他们对福音比以前更加敞开。

葬礼到来

父亲去世 14 天之后，我父亲的好友放下宣教事工骑马赶来：斯威勒·豪特在路上走了四天，乔治·林沃德走了两天。奥克尔 斯威勒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我在河曲看到的是怎样景象啊！一排排房屋倒在废墟里，到处都是可怕的轰炸后还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从那个瓦砾堆上可以依稀辨认出那曾经是彼

得的卧室，也就是他妻子和同工们在那个恐怖的午后把他挖出来的地方……我们到的还不太晚，因为昨天才找到的墓地。

……一小组虔诚的年轻信徒正在紧张地做着葬礼的准备工作。由于教堂只剩下了残垣断壁，只好搭起了一顶大帐篷，但帐篷内外都被装饰得很漂亮。他们的双手被爱牵动着，将一朵朵纸花编成花圈，写着动人悼词的旗幡……从远近各处送来。追悼大会是 12 月 31 日周日下午举行的……成百上千的人赶来参加，站在帐篷外的人比里面的人还要多。

在帐篷的入口处，高悬着一幅绸制的灵幡，上面写着：“他为拯救世人而奉献了自己”。白色的帐篷（中国人表示哀悼的颜色）的中央摆着一口棺材，上面盖着中国和挪威的国旗。教会成员和城里的人送给父亲的挽联、挽帐都是白色的，只有一位德国神甫带来的是黑色的绸幡。母亲写道：“到了最后的告别的时间，这位神甫站起来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句话真好。……整个追悼会的主线就是他为拯救这个地方的人而舍下了生命。这件事本身就讲出了大有能力的信息，胜过任何讲道。我们的朋友们多么舍不得彼得，他们多么爱他啊！”

黎明下葬

因为有可能会出现空袭，下葬定于第二天的一大早，也就是 1940 年 1 月 1 日。母亲曾记述了葬礼前夜的情景：

整个晚上，那些年轻人都在守灵。他们围坐在帐篷前的一对篝火旁，大声地唱着赞美诗歌颂上帝荣耀。周围所有的人也都听到了，他们在歌中表达的对救主的感谢，还有对那位给他们带来福音的人的感谢。对那些异教徒来说，这是一个怎样的见证啊！他们晓得这不只是言语，他们已经看到活生生的证据，基督徒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有上帝的慰藉而得以前行，我们不像绝望者那般痛苦。

第二天清晨，人们都到得很早。很多妇女根本没有回家，而是在这里坐了通宵……就在那一年的第一天，出殡的队伍在黎明中行进了约 45 分钟

……在一个名叫“水草谷”的安静的地方，我亲爱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就这样永远安息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了。在这里他将一直长眠，直到那复活的早晨。对那些伤心的人来说，我们有着怎样荣耀的盼望——我们会再见面的！

在奥克尔 斯威勒的宣教文章《来华传教士》[Kinamisjonaeren]中，也给这个葬礼的故事添加了一些细节：“无论是帐篷中的礼拜，还是遗体安葬仪式，都笼罩着一片惊人的肃静——这是按着中国的标准。没有很多话要说，但心已被充满。18 个身强力壮的信徒，抬着他们的牧师走向他最后的安息地。很多人打着灵幡挽联，走在灵柩前面，其中一幅挽联上写着：‘好牧人为我舍命’。一大群送葬的亲友走在棺材的后边。坟茔离城有 2 公里远。”

十字架的主题

坦特 陶拉在写信回挪威时，选择了十字架的主题。她说：

（彼得·托杰森）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边，总是高举十字架。在街上、在教

堂里、在去村子的路上，他都希望有十字架带来光明……此刻我感觉到十字架是一个大能的见证，各色各样的纸花（这儿的冬天没有鲜花）装饰着红色的十字架，早晨的阳光把它照得格外鲜亮。这使我想起一首诗歌，《十架一路引我行》。

他继续讲起在河曲的二十年里的生活，父亲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中国人谈起他时都称赞他很能“吃苦”，意思是说他愿意吃周围人正在吃的苦，愿意分担他们的痛苦和难处。陶拉继续说：

甚至最偏远的、被人遗忘的村庄，他都愿意把十字架的好消息传给他们，他也从没因为爱惜自己而不去这么做。他的愿望就是“在每一个拜偶像的地方让人们看到十字架”。愿上帝祝福并坚固他的妻子和孩子，使他们能够经受与丈夫和父亲分离的考验。孩子们在最后一封写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选择了分离。”他们的父亲从来没读到过这封信，因他已经跟耶稣一起回天家了。

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送的挽联上写着：“为了你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向亲爱的父亲致以最后的敬意”，然后用大字印刷体写着“一切都是为了耶稣的缘故”。

孩子们得知噩耗

在数百公里以外的芝罘，我们收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但是母亲很安全。这个消息用了十天时间才从战区送到我们这里。

校长叫我到她的办公室，以她所知道的最温柔的方式告诉我这个消息。生活完全中断了。一位我最喜欢的老师多年以后告诉我：“当时你看起来如同所有的快乐都离开了你。”

爱德华被绰号叫做“蜜蜂先生”的老师叫到教师休息室，看到了那份电报。“蜜蜂先生”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就向他分享：“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然后他们就一起跪下祷告。“世界轰然倒塌了，”爱德华后来说，“但约翰福音 14:27 在那些日子支撑着我们，蜜蜂先生短短的几句话帮了大忙。”

哈肯被老师在她餐厅里安排的晚餐深深打动着，他也有过绝望，但当时的问题是，所有和他住在一起的男孩子们都对他过于友好。没人跟他开玩笑，他甚至不被当成宿舍里几百个男孩子中的一员，在那里，每个人对他都小心翼翼。

当托杰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时，他很害怕是不是又违反纪律了。上一次他被叫去时是被捆着去的，而这次却在被告知消息之前，有人递给他一杯茶。像哈肯一样，他也发现之后的经历更加叫人沮丧：每个人都出于对他丧父的考虑，在饭桌上递饭给他。而平时从没人会想起给其他人传递食物。

后来我们四个孩子相聚了，托杰回忆说：“爱德华带给我们很多安全感。”他好像本能地感到他要担负起父亲的职责，进而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起居。他愿意跟我们谈话，还让我们提问题，因为我们对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要炸掉我们的房屋，挪威可是一个中立国啊；我们也问起为什么没有防空洞。所有一切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我后来写信给外婆说：“托杰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很可爱。在得知消息后，我开始读一些关于天国的经文给他听，并提醒他，我们会在天国里见到父亲的。但是他马上告诉我说，他已经带领两个小男孩儿接受耶稣了。在他患白喉病住院时，和那两个男孩儿在一起。”他很高兴他们两个也能进天堂，和父亲，还有我们大家在一起。

在医院里的那段时间，是一个特别的时期，上帝就在那个时候为托杰和我预备应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托杰患了白喉病，我在他患病前和他在一起，就这么我也被隔离了。在医院，托杰在病中和上帝分享了很多，他为父母祷告，也为不信耶稣的小朋友祷告。

甚至作为只有八岁的孩子，托杰似乎都能够意识到父母需要我们的祷告。我也有一种感觉，他们处境危险。在医院里，我做过一个梦，梦见他们为生活而抗争。当我焦虑地为此祷告时，上帝给了我极大的平安，他会看顾这一切。

当有些老师问爱德华他是如何勇敢面对父亲去世这件事的，他回答说，“上帝很早以前就已经显明，我们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在这里他是说，在与父母道别后，他和我都产生了同样的感觉——我们都感觉到家不再和从前一样了。对爱德华来说，他比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当事情真的发生时，这种感觉缓和了我们的惊讶。父亲的去世，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完全的意外。

“我们被迫去适应父亲的去世这个事实，这样就取代了适应芝罘的压力。”我的一个弟弟后来这样说，“语言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们通过思考并用英语表达这个巨大的悲剧，藉此学会了这门语言。”

对哈肯来说，的确如此。就在父亲去世之后，他创办了《儿童月报》[*Children's Monthly Paper*]。值得一提的是，三个月以后，作为一个在讲英语的学校学习的挪威学生，他很勇敢地担当起新创报纸的编辑这个工作。当时有很多欧洲的犹太人从希特勒手下逃出来，并大量涌入上海，此报纸的目的就是为那些犹太人筹款。由于上海的这种新需要，一些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原本是从事中国事工，现在被借调过去和犹太人一起工作。

在报纸上，哈肯学会了用他的新语言来描述父亲的悲剧。他写道：

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已经有了预感。我并不清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一切出于神。他只是想考验我，看我是否真的信靠他，并且了解到是他把父亲带到他那里去的……在父母离开我之前，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尽管当时我没有意识会发生这件事，就像门徒不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一样。

后来，我无意中听到哈肯的一个同学在别人面前大声地念这篇文章，这个孩子才十一岁，除了嘲笑和戏谑这场悲剧以外，她还不懂得该如何应对别人的悲伤，“哦，听一听哈肯·托杰森描述他父亲的死。”后来另外一个女孩儿也跟她一起开始嘲笑托杰写的东西。

听到这个，我冲到厕所，那是在寄宿学校里唯一一个私人地方。在那里，我的心都要哭出来了。

但是上帝也预备了他的安慰者。在漫长的寒假里，有一个专门为不能回家过圣诞的人安排的特别聚会。那个一月，带领者是艾丽斯和詹姆士·泰勒[Alice and James Taylor]（詹姆士是戴德生的孙子）。他们俩的儿子詹姆士·泰勒三世[James Taylor III]，那个时候跟我们一起在那个寄宿学校上学，他现在是海外传教士团契[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就是从前的内地会）的领袖。

“耶稣的再来”是这次特别聚会的主题。当时的我还在痛苦中苦苦挣扎，而这次聚会却提醒了我，这个世界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仅仅是个开始。我沉醉于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 - 18 节所描述的耶稣再来的情景，现在里边描述的也包括我的父亲，因为他就属于那些“已经睡了的人”。突然我看到亮光，我不应该像“没有指望的人……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一段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章节，突然听起来像是上帝让泰勒专门说给我听的一样。

还有很多挪威人和中国人写信给我们，表达他们对我们的悲伤是如何的感同身受。有时我甚至不敢在别人面前打开信，以免再次眼泪“瀑布”。所以我会把信带到厕所去读。另外有一次，在一节音乐欣赏课上，我又在教室里极力想忍住眼泪。那首歌从留声机里缓缓流出，是写给一个倒下的英雄的苏格兰民谣：

他走过高山，
他走过草原，
像一个夏天干旱时的喷泉，
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这和我倒下的英雄——我的父亲是如此相近，那时我觉得我从未如此地需要一位父亲。

关怀母亲

我们的心总是徘徊于思念已逝的父亲和顾虑仍然身处危险之中的母亲这两种情感之间。我们特别挂心的一件事就是还有多久我们才能见到她。令我们欣慰的是她找到了一个更安全的藏身之处（靠着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长城，在旧墙里挖了一个防空洞）。托杰写信给母亲道：“我希望新家会很好……很高兴炸弹还没炸掉这个房子。您的儿子，托杰。”

就像尼哥底母夜里偷偷拜访耶稣一样，共产党也跑到这个隐蔽的地方来找母亲，问了她一些问题，并对父亲在中国牺牲表示同情和钦佩。母亲给他们看我们全家福，里面有她和父亲还有我们四个孩子，很多人的眼睛里都含着泪。他们很敞开，愿意听耶稣来拯救我们的故事。他们中的有些人承认，在此之前，他们认为人只应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而现在，他们看到了生命的另一面。母亲写信提到这些机会，我们明白她为什么留下。但我们还是很担心她的安全。

挪威的战争让人震惊

那年四月，德国占领了挪威，母亲的安全体系中又一面墙就这么崩塌了。她写信给外婆道：“我为挪威卷入战争的消息感到震惊。就在我刚失去一切以后，

好像我亲爱的挪威也离我而去了。但这也让我们记得，我们在世上只是寄居的。我们的家在天上，在那儿我们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也写信给我的外婆：

“挪威也成为战区了，这是多么可怕！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在这儿经历着战争，也听说了欧洲的战争，我还一直以为挪威是这个世界仅存的和平之所。”

母亲很高兴收到了一封来自贺龙将军的私人信件，这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军官，他在信中表达了对挪威被德军占领的同情。这次与贺龙将军的联系帮助了河曲地区重建秩序。地主和城里的富人把持这里的治安保卫系统已有数个世纪了，就在日军不断地轰炸之后，这个古老的农村治安体系才被摧毁，也就在这个空档，贺龙的军队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开始与国民党合作对抗日军。

母亲提及这些镇附近的新面孔时写到：

他们并没有给我们制造什么麻烦……他们刚到这里的时候带着一点骄傲和生硬，但有时则就变得非常安静、温柔，

……当他们看到彼得的照片时，他们低声对彼此说，这个人把生命献给了这里。这时候你就能感觉到这些没有信仰的人好像可以感受到对上帝的敬畏。他们又看了孩子们的照片，他们认为有三儿一女非常幸运。然后他们就变得非常友好，还向我们保证他们还会再回来，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他们的心能够像溪水一样向上帝倾心。其中几个在聚会上听得非常专心。

建立新教会

到了 1940 年 5 月，对教会来说，前景看起来越来越光明。会众们又筹钱买了一个新地方用来聚会，坦特 陶拉和母亲转述了这件事：

上帝所允许发生的这一切事情都深深地烙印在他们心里。那间教堂，那个教会，那个他们曾称之为“家”的地方，被炸毁了，他们的牧者……被神接回天家。但是会众还在，这是那些空中的“大鸟”（指日本人的飞机——译者注）无法毁灭的。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责任……钱很快就筹好了，如此奉献的心志我们以前在河曲还从来没见过的……在五月份，合同就签订了……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们又有了礼拜堂、学校、小礼堂和供男女分别使用的接待室。

在河曲大轰炸之后，一些异教的人告诉基督徒们说：“现在你们的教会成了废墟。你们的牧师也已过世，这一定是基督教在河曲走到尽头了。”他们说这话并非嘲讽，而是带着宿命论的调调。

“不是这样的，”两位身为商界领袖的基督徒回答说，“我们都还在，我们就是教会。”

就是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代表河曲所有的信徒，给我们四个孩子写了一封令人难忘的信，来分担我们的痛苦：

亲爱的孩子们，请接受我们由衷的致意和诚挚的情感，你们失去了至亲无尚的父亲，而我们也永远与你们在一起。我们愿意分担你们深藏心底的悲哀和痛苦，尽管我们无法减轻你们的哀痛，但我们能帮助你们向天父祈求。我们相信你们将因此得到慰藉和力量，因为每日都担当我们忧患的上帝会来安慰

你们，所以你们的悲伤将不会太沉重。

母亲前来看望我们

最后，母亲写信回去给他们的差会说：“我看到神在示意我跟着他向前走。我们从前没有走过这条路，但是我们（她和陶拉）不应该丢下这些信徒，使他们就像离了牧人的羊，找不到聚集的地方。”但是现在有了新的教堂，母亲被基督徒的成熟所激励着，她在河曲的集会中看到了这种成熟。怀着一颗平安的牧者之心，她要开始长途跋涉来看望我们这些孩子。首先她要坐八天的板车穿过鄂尔多斯沙漠，往西北走，到达包头。还要乘火车和轮船，往东南走到达芝罘。捷径已被封锁。老孙已经八十岁了，自告奋勇地作她的旅伴，他告诉母亲：“我已经活够本了，在我死去之前想要为上帝再做一件事，就是帮你去找你的孩子们。就算我再也回不了河曲，我也是在上帝的手中。”

当托杰听说母亲将要进行的危险旅行时，他写了一封信：“亲爱的母亲，我预祝你一路平安，路上不遇到强盗，上帝与你同在，使你永远不会跌倒。”大哥爱德华和托杰谈话后，也写信给母亲，说：“他一想到你要来就非常兴奋，每天都在为你祷告。”

直到母亲到达之后，我们才听说了一路上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母亲需要托杰和所有人的祷告来托住她。第一次危险发生在渡黄河之前，从中国守军的一方来到日军驻防的一方，那里盗贼出没，行人无不闻风丧胆。但那时有一位中国高级军官坐在马上，向我母亲亲切地打招呼：“我上过您的主日学，您还记得我吗？”上帝及时地把他派来，保护母亲他们通过了危险区。

在河边，很多中国人等着渡河。但是母亲和老孙没有日本人的通行证，被告知不能过去。但是突然，人群中有一人，可能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中国人，给了他们一张通行证。人群中的每一个都很开心，看着她和老孙上了渡船。但到了黄河的另一边，真正的冒险才开始。

在鄂尔多斯沙漠里，大多数人从来没见过外国妇女，所以母亲成了“稀罕物”——一个瘦小的白种女人坐在板车上，和一个姓孙的老人在一起。第二天夜里，他们到了一家旅店，那天早晨，刚刚有三个客人被杀了。第三天，他们碰到了一伙士兵，带着武器朝他们冲过来。可能是这些士兵看到这个软弱的小女子和老头，就主动放下了武器。也可能是这两个人被天使保护着，他们没有受到袭击。第四天夜里，他们来到一家蒙古人开的旅店，这里的客人五花八门。仅在他们住的大通铺房间里就有三十个大烟鬼。“老孙安静地向神祷告”，母亲后来写道，“如果没有上帝，所有的一切都会出问题。”

后来，当他们从日本那方到达红军这方时，母亲被当作犯人关押了一天。她走在六月的酷暑下，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喝。她告诉我们，为了解决上厕所的问题，他们动用了一个团的士兵围着她。当她要求下了公路去小便，人家命令她就地解决。当然她很紧张，不可能那样做。最后，一个军官，很有属世的智慧，他告诉别人说：“这些老外很奇怪的，他们不可能像我们那样，所以我们还是得走开一下。”他忘了提的是她不止是个外国人，而且夹在一群士兵中间、孤单无助的女人。

在那儿作了一天的囚犯，她和逮捕她的人到了日军占领地区。在那儿，每个

人要么躲起来，要么出示证件。当母亲拿出她的证件时，一个日本将领过来帮助她。她对他说自己的丈夫已经过世，她想去看看四个孩子。他给了她一张通行证，并且看着她上路。由于战争的耽延，她辗转三个星期，先后板车，后坐渡船，又步行，再转火车，最后坐轮船才到达这里。

那个夏日，当轮船缓缓靠上码头，我们四个人就一直欢呼雀跃着。在甲板上，我们寻索到母亲的笑容。我猛然发现，九月以来，她的头发已然从棕色变成了灰白色，这充分说明，自从我上次见她以来，她经历了怎样的磨难。然而她一走下踏板，我就为能重新跟她在一起而激动非常，而无暇再去想她的变化。我们立刻沉醉在拥抱和亲吻中。

我们有一个小公寓，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月的暑假。我们用了很多时间谈论分开后所发生的一切。很有意思的是，看到爱德华代替父亲的位置，和母亲一起分担家里的事物。比如说，公寓应该布置一下，所以就会购置甚至更多的是租借一些需要的家具。这一切都是爱德华一手操办，并且安排妥当，我为母亲感到非常高兴。

说实话，大家有一次团圆真的很美好。我们问了在父亲去世以后所有隐藏在内心的问题。当然，在回想整个悲剧的时候，会有许多痛苦的时刻。就这样流着泪，让泪水洗刷带走内心的痛苦，这痛苦很多是自己藏在心里独自承担的，也有的是来自没有对别人设身处地的考虑。现在我们是一家人，可以将这些完全释放。但是在所有这样的长谈中，我们从来没有怀疑或质问过上帝为什么要让父亲离开我们。那一年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也受益匪浅。我们的好朋友拉格恩黑尔德·斯威特森，在奥斯陆为父亲举行的纪念会上讲话，在演讲中她这样总结了我们的感受：“在主的眼中，所谓‘巨大的代价’就是为主而死。这并不是说上帝不重视他儿女的生命，而是正因为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的宝贵，他们的死才得以成为巨大的代价。”

我们的内心很平安，一家人一起享受夏日漫长轻松的进餐时间，还用整个上午或者下午在一起游泳，或者在海滩上漫步。爱德华负责划独木舟，父亲在暑假之前就已经为我们买好了船，指导我们每个人轮流下海。母亲写信给外婆说，她在如此美妙的环境里和我们在一起，都让她变得很年轻。

随着九月的临近，我们知道我们得返回学校了。最让我们担心的是母亲要回到河曲。我佩服她的心志，但是私下里祈求神堵住她的路，这样她就不必长途跋涉，历经千难万险地回去了。欧洲的战事充满了不确定性，传言说日本要进一步侵略亚洲，周围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悬着。听到母亲和内地会同工们的谈话，我们有种不好的预感。

第九章 珍珠港和集中营

夏天过后，母亲离开我们前往北京，虽然知道回河曲的路暂时被封锁，她还是希望至少能回到她的“家乡”（山西）。那年九月她写信给外婆：“最后我们回到天家将是多么美好的事啊，不必再奔波……不必再别离。同时，我不再随从任何人而改变，而是要感恩赞美上帝带我平安回到山西和那边的传教事工。”

北京有很多山西的传教士，正等着发放通行证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在北京，母亲和另外两个斯堪地纳维亚人出乎意料地在几天之内就拿到了通行证和火车票，准备第二天动身出发回山西。但是日本与同盟国国家的政治形势突然紧张起来，他们的行程被取消了。所以母亲就开始照顾生病的坦特·赛纳（参看第一章）。救世军很友善地借给我们这些陷入窘境的挪威传教士一处房子，而且是免费使用的。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特别的帮助，当时由于希特勒的入侵，没有钱能从挪威汇出来。

在圣诞节前夕，没有一个传教士能回到山西。那里的战争还是很激烈，道路都封锁了，北京的日本人拒绝向任何一个传教士发放通行证。挪威人也不再有中立的特权。当德国人入侵挪威之后，哈肯国王逃到伦敦建立起挪威流亡政府，政府的部队加入联军作战。

母亲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回到山西，于是就返回芝罘。我们十分开心，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圣诞节。不过，我们首先纪念了12月14日这个日子——父亲的忌日，并且感谢天父，在我们失去父亲的第一年里一直保守我们。在那些天里，我们收到了很多纪念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感人来信，其中有一封是河曲的天主教神甫写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此投入了极大的感情。（参看附录2）

圣诞节之后，我们回到寄宿学校，而母亲则住在中国内地会的客房里，思考下一步如何行动。尽管面临着许多的不确定性，我们还是很感恩能在这样的剧变中依然安全地生活。母亲写信给外婆说：

彼得曾下定决心，只要我们还能对局势有一丁点儿的把握，我们就不能把孩子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我是传教士。如今我们的孩子被照顾的很好都是神的恩典。为了耶稣的缘故他们奉献了自己的父亲，但这样的事实并没有让他们变得心怀怨恨或铁石心肠，而是激励他们更加追求耶稣，为他而活……在学校里神也使用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母亲的传教事工

在1941年3月，神为母亲在芝罘开辟了一项新的事工。一个能容纳40人的宣教家庭需要一个新的女主人，她受邀赴任。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给她提供一个奉献社区的机会，同时也能照顾到她养家的需要。自从挪威那边的钱无法汇寄之后，神一直奇妙地供应着我们，现在她的官方支持又有了新的来源。母亲很感恩。

我们这些孩子住在学校寝室的时候，跟妈妈相隔只有5分钟的距离，所以每

天下午我们都会彼此探望，周末和假期也可以回家与母亲团聚。那年春天和夏天我们又一起享受了家庭生活的美好。我们四个都同意宿舍生活很有趣，可是我们也都承认和母亲分开就不是很开心了，然而目前这样的生活能使我们享受到这两个世界的快乐。

晚上在美丽的海边散步，给母亲一个向爱德华交心的机会。她想让他知道父亲对蒙古人的负担——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直说，等完成中国人的事工后，打算从河曲跨过黄河到蒙古人那里传教。爱德华愿意负担起这个挑战，相信是上帝在呼召他继续父亲的工作。于是他有了这样一个志向，就是到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蒙古人那里去。

但是，如果爱德华要追随父亲的脚步，很明显，他需要一些培训。他要去哪里？在爱德华毕业之前的几个月里，这个问题一直是母亲心里的一个负担。在德国人入侵挪威之前，计划让我们这些孩子回挪威读大学，但是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当父亲还在美国的时候，母亲通过信件认识了他的几个朋友，但是她觉得还没法张嘴向他们中任何一个要求收留爱德华。

但是，上帝就把这个负担放在了他一个仆人托里·毛斯沃尔德[Torrey Mosvold]的心里，使他来帮助我们。在他搬到纽约布鲁克林之前，母亲在挪威见过他。当托里在《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上看到彼得·托杰森被一枚炮弹击中殉道——第一个在中国抗战中死去的传教士，他为此很关注。四个月之后，德国人入侵了挪威，他就知道托杰森一家没法回到挪威了。有一天他被内心的声音所驱使，写信给母亲，向她提供帮助。在他邮出那封信的第二天，就收到了母亲的来信。她也同样听到了内心的声音。就这样，上帝为爱德华在美国预备了一个家。

当爱德华 1941 年 8 月即将离开，我们都很害怕家庭的再次崩塌。对母亲来说会更难过，她不止是失去了他，而且还是把他送去了美国，一个她并不熟悉的国家。我们这些孩子们失去了一个代替父亲位置的大哥。平时为了不让母亲有更多的操心事，我们这些小孩子有什么问题都会讲给他听，我们都很信任他的判断力。

但是他能走也是很感恩的。之后我们都很感恩他能在挪威政府得到一份工作，作为码头代理负责所有进纽约港的挪威船只。靠着一个很大的商业舰队，挪威以这种方式为战争作贡献。那时所有的挪威年轻人都被要求在国外可以参军，而对爱德华来说，这份工作就相当于是服兵役。看到了这么多战争的恐怖，很高兴爱德华不用去打仗。

珍珠港

当珍珠港被炸四个月后，让我们更加感恩的是，爱德华搭乘从中国出发的最后一艘船离开了。因为那时候突然间我们都成了阶下囚，是在家里。许多卫兵在我们门口张贴告示，上面写着：“这些房子都归大日本海军所有。”芝罘自 1938 年就被日本人统治着，当时山东省的官员和敌人签署协定，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日本卫兵站岗，他们戴着钢盔，穿着制服，脚上穿着沉重的靴子，手里拿着刺刀。但是这次有所不同，1941 年 12 月 8 日（亚洲时间），日本向英国和美国宣战。

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首先是日本人入侵和平的河曲，然后父亲去世，接下来德军占领挪威，这次事件只是另一个打击。现在全世界被

扔到暴力和破坏的开水锅里。有一部分打击是因为我们发现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从前他们驻扎在芝罘，对我们总是很随意、漠不关心，现在还是这些日本人，自从挪威加入了盟军成为他们的敌人，他们待我们就像真正的敌人。当我们离开院子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戴着臂章来表明我们的国籍，还要戴上我们的接种疫苗的记录。日本人会粗暴的向我们索要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守规则，他们就会无情的怒斥我们。

这些事情很容易让我们胡思乱想，设想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爱德华最好的朋友诺曼·克里夫[Norman Cliff 柯喜乐]后来在《幸福路的大院》[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中写道：“我们想象着自己被运到日本作苦力的画面，想到盟军若是战败了将会怎样。我们一辈子都要做囚犯吗？食物的定额发放已经起了效果，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发现自己总是处于饥饿状态。”

集中营

到 1942 年夏天，日本官员警告我们，我们会很快被送到南非。“大日本国军队”需要我们学校的院子。其他谣言说让我们搬到上海或者满洲。慢慢地日本人开始一次接管一座建筑物。后来有命令下来让我们五天之内全部搬走，包括 200 名儿童工作人员以及退休工人。当我们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几十个日本士兵围着我们，往他们想要的东西上贴标签。谁要是有收音机，照相机，手表或者精美瓷器，就都会失去这些东西。看着他们在我们值钱的物品上贴标签，以此来向我们宣告这件财产已经属于日本军队了，真让人极其恼火。

但是没有太多时间发泄愤怒，我们的“新老板们”让我们尽快搬出中国内地会的院子。当这些逮捕我们的人叫嚣着要我们赶快离开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无助。每一个人只允许带一个小箱子和卧具。1942 年 11 月 5 日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学校去往监狱，后来我们常常唱歌怀念我们的学校：

在古老的中国海岸，有我们所爱的学校，
我们常常唱歌赞美它。
但如今芝罘学校，
已经不在芝罘的海岸边。

在时局不太稳定的那几个月里，我的一位老师谱写了这首歌。1881 年，是戴德生在海边选择了这个靠海的、可爱的地方，为传教士的孩子们建起了这所学校。当我们离开那个院子的时候，很多记忆在大人和高年级学生的脑海里闪过。我们离开的时候有些人坐黄包车，但大部分人是步行。对我们来讲，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去哪儿？待多久？我们会饿死吗？

这种郁闷的想法被另一首歌所打断：

上帝就坐在宝座上，他顾念他的子民。
即使试探压着我们，重担让我们忧伤，
他永远不撇下我们！
上帝就坐在宝座上，他顾念他的子民
他的应许是确实的，他不会忘记你，
上帝就坐在宝座上

孩子们和大人们陆续地加入进来，就像有人后来写到的：“许多中国的旁观者瞪大了眼睛，洋鬼子的上帝似乎在这样的逆境中帮助他们。”旅途的后半段，当我们爬上孔庙岭时，我们高唱《主是我们的避难所》（由诗篇 46 篇改编）。最后我们到达了监狱，这原是美国长老会宣教机构的四栋房子。该机构的另一栋房子已经被商业团体占了。

中国内地会的四栋房子被占领，原因是学校里的四栋房子不够。那四栋集中营的大楼曾经是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学前班宿舍以及客房。在每栋房子里，以前的管理人员现在还管理这些房子，所以母亲负责管理第四栋房子。

我在日志中写道：

真是一个诡异的地方，人们出入都得在人的头顶上踩过去，没人知道 47 个人如何能塞进只有八个房间的房子里。不过不久人们就知道，该如何安排人的住处了。野餐式的午饭就在厨房的中间解决了。母亲晚点才到，她还带了另外几个大人物……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家如何在楼梯上全体集合，在那个狭窄的大厅里的盒子上吃了晚饭。

后来，

佩吉[Peggy]、特里克斯[Trix]、格雷斯[Grace]和我被丢到那个只有 10 乘 5 的小走廊里……房间就像冬天的冰箱一样，我们起床时，温度只有华氏二十六度。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

当然还是有一些谣传，说我们将会去什么地方，写成一首诗，用《英国精兵》的调子来唱：

有人谈到‘疏散’，也有人这样告诉我，或被敌军运到北京的旧庙里，
但无论什么样的信息传到这座远山，
我们都在一起，乐观、愉快依旧。

有人提到遥远的莫桑比克，有人说就是在华夏中国，
有人说上海的院落，所以我们不知该说些什么。
但在世界上所有的胜地中，没有哪儿能比活在芝罘的庙岭更让人兴奋。

潍县集中营

在传闻中被运到莫桑比克这类离谱事情出现之前，听说 1943 年的八月我们要搬到潍县集中营里。我们甚至还没有出山东，而仅仅坐了两天的船到青岛，再乘火车走 130 公里到潍坊，然后坐卡车到潍县。我们总共有 1600 名囚犯，成了比较大的集中营，在那里一直待到二战结束。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在船上度过的那两个夜晚，那艘船是货船而不是客船，所以里边好多年没有打扫过，也没有通风。我们进去时，一股恶臭的气味扑面而来。里边几乎没有可以挪动的空间，我们都躺在那里，我们的身体就这样彼此挤压着。然后蟑螂就开始在我们身上爬，太多了，以至没办法逮住或碾死。我们大约 250 人在那里，一个帘子隔开了女孩儿和男孩儿，突然一个小女孩儿由于怕黑和奇怪的味道而大哭起来。另一些人觉得在波浪起伏的大海中开始晕船了。诺

曼·克里夫写道：“地板很硬，船在晃动，我们的肚子很饿，老鼠都跑来围着我们。在我稍微瞌睡了一会儿时，听到几尺外‘帘布’另一边的女孩子们合声唱到：

耶稣，拯救者，带领我！
越过人生波涛汹涌的大海；
未知的波浪在我前面翻滚，
还有暗礁和险滩在前方；
海图和指南从他而来，
耶稣，拯救者，带领我。

海上航行结束后，紧接着是七天的火车旅程，没有水，而且一路尘土飞扬。那是九月干燥的一天，我们周围的地都已经被太阳烤焦了。伴随着燥热，一个艰难而又令人焦虑的问题在我们干裂的嘴唇中间冒出来：“我们究竟要去哪里？事情会一步步变得更糟吗？”

母亲写道：“旅程很难忘，我们体味了做一个囚徒是怎样的。”一个叫戴维·迈克尔[David Michell]的朋友在《一个男孩儿的战争》[A Boy's War]中写道：

很多我们的行李都丢了或送错了地方……我们只有两分钟时间把东西弄下车……我们拍了拍身上和行李上的灰，突然的下车让我们还有些迷茫，这时就听到了看守们急促的叫声，告诉我们爬到那开着门的、等待我们的卡车和摇摇欲坠的公共汽车上……一两里后，高墙和瞭望塔映入了眼帘……我们见到了带着刺刀的日本岗哨……两个大木门上面用汉字刻着“幸福路大院”[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我们就到了潍县集中营。

这里曾是一个长老会的院落，里边有教堂、神学院、学校，还有一个医院，像帕尔·巴克[Pearl Buck]和亨利·卢斯[Henry Luce]这样的名人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但是在1943年，这里被抢劫过，从此就被人淡忘了。有一个来的比较早的人把它形容为“光秃秃的墙和地板，昏暗的电灯，没有活水，没有简陋的厕所、露天的污水坑、工艺粗糙的面包店。两座带公共淋浴的房子，三个大的公用厨房，世俗的教堂，已经拆除的医院，几个棚子商店，几排牢房一样的房间，三栋高高的单身宿舍”。

但是当我们大约350个疲惫的旅行者从芝罘到达那里时，这个集中营已经变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社区。母亲写信给爱德华说：“这里的一切忙的就像时钟一样运作。我们都有自己的社区责任……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排队，一天要排很多次。”实际上，领取食物和水，饮用的开水，煤灰（与泥土和水泥混在一起做煤球用），去厕所，所有的一切都要排队。那里有1600个囚犯，排队在所难免，但是那种高度的组织性让我们感到吃惊，1943年3月随着第一批囚犯的到来，管理委员会就已经开始运作。

玛丽·斯科特[Mary Scott]，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她后来在《保持安全》[Kept in Safeguard]一书中写道：

日本人制定出一个计划来管理我们的“村庄”。他们要求选出主席和助理来组成九个集中营委员会：总务，纪律，劳动，教育，供应，岗位，医疗，工程和财政。

玛丽除了做这些“白领”工作，还负责厨房的工作：

同一周里，我既要监督服务队，又要打扫厕所。我要忙一个上午来清理厕所，洗淋浴……及时到达厨房。

在闲暇时间，她还要训练包括托杰在内的男孩子们打棒球。

我的“孩子们”一天下午邀请我去喝茶，七个人签了名，我到现在还保留着那张用铅笔写的请帖，我把它们和珍贵的纪念品放在一起。

奥运会英雄埃瑞卡·利德尔

另外一个在闲暇时间常常和年轻人在一起的英雄，就是著名电影《烈火战车》里的埃瑞卡·利德尔[Eric Liddell 李爱锐]。他在1924年奥运会上，起初拒绝了参加在星期天举行的比赛，后来代表英国赢得了400米跑的冠军，还创造了世界纪录。也就在他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功的那一年，这位“苏格兰飞人”来到中国做了传教士。在集中营里他每天都给年轻人安排一些娱乐活动，晚上和他们一起下棋或者安静的交谈。我们称之为埃瑞卡叔叔的那个人，不仅给宣教士孩子们也给没有信仰的人群带来希望。

有一个囚犯提到他时说，在我们大约有150-200码的小世界里“毫无疑问他是最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在微观上讲，我们就是一个世界，1600个囚犯代表了20个国家。他们有商人，政府官员，传教士，妓女，吸毒者和各类惹是生非的人，他们都远离家乡在中国享受做外国人的自由。我们没有像住在其他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受折磨，但我们的食物很少，又和污水坑，老鼠，苍蝇，疾病住在一起。若不是有像利德尔这样的基督徒们的慷慨支持，很多人也不可能在这样拥挤的集中营里能够应付这种残酷的生活。人们总会发现利德尔有一天为那位从前的妓女搬木架，又在另一天帮一个老年人搬煤球。

在集中营里有过一次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经历。那一次，我在厨房里要赶在600个人来领餐之前，单枪匹马要打死上百只苍蝇。那时埃瑞卡·利德尔正好路过，我和他很熟悉，他既是我的垒球教练，又是我的圣经老师。他停下来，进到厨房站在那里，专注的用心看了一会。他那钢青色的深邃的眼神，温和的微笑深深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告诉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为别人做一些诸如打苍蝇的这类小事来带人靠近基督。我曾听他讲，我们要么会使人们远离基督，要么带他们靠近基督。然后他发自内心的感谢我刚才所做的一切，因为我所做的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赞扬我，只有上帝知道我在做什么。

仅次于我父亲，埃瑞卡·利德尔是我所认识的最像基督的人。当我怀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按着两个英雄的名字给男孩起的名字就是埃瑞卡·彼得。(但是因为我没生男孩，我很兴奋的看到哈肯的第一个孩子用了这个名字叫埃瑞卡·彼得·托杰森[Erik Peter Torjesen]。)

灭四害之战

在埃瑞卡叔叔的鼓励下，我坚持打苍蝇，后来在组队的灭蝇运动中还成为团队的头头。同时，日本官方组织了一场捕鼠竞赛，因为当时集中营里的老鼠已经泛滥成灾。后来有蚊子到处嗡嗡引发疟疾。后来我们的床垫上出来很多臭虫在晚上叮咬人。有一天早上，哈肯在他的床上数出来500个臭虫，过了一会儿，

他就把死了的臭虫装在一个瓶子里拿出来给人看。我们在床垫上浇开水还采取了其他的措施，但是都是徒劳，所以我们常常被咬的很痒，伸手去挠。

伊丽莎白·霍伊特·戈德斯密思[Elizabeth Hoyte Goldsmith]到潍县时只有九岁，她后来写的《上帝是可信的吗？》[Can God Be Trusted?]中提到了“成百上千的红色小臭虫。很不公平，好像特别喜欢咬我，我的腿上和胳膊上到处是它们叮咬留下的疤痕。”她是这里 94 个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之一，因为她父母都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做宣教。芝罘学校的老师们特别照顾这 94 个孩子。在没有足够的教室、实验室、教科书和纸张的情况下继续给他们上课。很多班级是在外边上課，拿地面当黑板。战争过后，伊丽莎白向她的一位老师问起当年在集中营里的生活，她回答说：“在夏天每个夜里我会去你们睡着的地方看看，你平躺着睡在床单上，浑身都是汗水，身上穿的很少。我的工作就是帮你逮臭虫。”

1944 年的夏天，监狱里的生活很差，除了精神受挫，很多人身患伤寒、痢疾或者是疟疾。同时，食物供应也仅限于面食，诸如面条、面汤、馒头之类的。战后在接受温哥华一家报纸采访时，一对夫妇说两年的饭食就是“韭菜，很差的青菜，一点肉渣儿和没有小麦面发酸的窝头。”

在囚犯中间，芝罘的孩子们可能是最健康的了，我们从来没有住在商业社区的人们那种奢侈的生活，在我们父母宣教的小村落里，或者是在芝罘，用很少的钱要养活 300 个饥饿的孩子的寄宿学校里，我们常常唱起那首歌“不管他带我去哪里我都跟随到底，不管他用什么为我充饥，我都欣然下咽。”

狱中歌声

当然，我们个人对上帝的信仰产生了非凡的影响。记得在一个主日的晚上，又有其他人加入到集中营的教会里一起高唱《宝架清影歌》：

愿在宝架清影中，事主爱人行道，
我不寻求旭日光华，因有慈光引照；
世界虚荣无可贪图，得失无关重要，
但将罪恶看为羞辱，宝架看为荣耀。

神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能否不看环境，单单满足于他的“慈光引照”。那天晚上，我对上帝说，即便是在狱中，我也因他而满足。后来在复活节期间从威尔士来了一位救世军传教士，比伊斯特太太[Mrs. Buist]，用她清亮的女高音唱起《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当她站在水泥地上唱起了我心中的盼望，我深深地确信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经常被问到，为什么我们在监狱常常唱歌，那可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我们连周末都不能出去，也喝不上一杯咖啡，不能歇息，但是，我们可以唱歌，所以我们就尽情的唱。我们可以填上自己的歌词，（“如果我有天使的翅膀，我将从潍县的世界飞翔”）。或像 1945 年，谣言四散的时候，我们就用“把我的邦妮带回来”的调子来唱：

俄国人已经占领挪威，
报道说拉保尔还在美国盟军的手里，
但是我觉得那是个谣言！

卫兵在周三统统离去，
周末我们就可以看到释放的自由
想到明天的喝茶时间，
连喝茶都是一个谣言！

但是在监狱里最宏大的音乐是救世军的乐队带来的，没有谁比母亲更喜爱这个乐队了：“在主日那天，救世军在外边演奏，在监狱里能拥有这样的自由真的是很好。”她给爱德华写信（回复他在两年里发来的第一封信）说：“乐队给我们营造了很好的主日气氛，他们演奏的圣诗都是我和你们父亲年轻时候爱唱的。他们用号角和喇叭来演奏，给我们这些在集中营里的人们很大的鼓励。”

家庭生活和母亲的事工

还是在那封信里，母亲描写了我俩所住的小房间（哈肯和托杰和芝罘的男孩子们住在宿舍里）。弟弟们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先把饭从厨房取回来，然后在哈肯自己垒的灶台上热一下。母亲的信里充满着对上帝的感恩，感谢他让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尽管情况很差，母亲还是为能够和孩子们以及内地会的同工们在一起而充满感恩，她想，这样总好过在监狱外边独自承担着单亲家庭的重担。

小说家 J.G·巴拉德[J.G. Ballard]所描述的上海附近的龙华监狱里，同样有着监狱所能提供的安全保障。他故事里的小主人公吉姆为了给自己可怜的菜单中加道菜，就在集中营外边设下抓野鸡的陷阱：

那天早上在点名后，他溜出篱笆……第一次设下陷阱是在离篱笆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对第一次爬过带刺的电线的吉姆来说，那已经是很远的距离了。他回头看着集中营里那个安全的世界，看着围着栅栏的小屋和水塔，看着卫兵室和宿舍，几乎害怕自己要被永远驱逐出来了。

当然，监狱的生活自有其弊端。但尽管有着诸多的艰难，母亲还是很感谢上帝让她在狱中成为他人的力量。有很多人到她那里一起祷告分担他们的重担，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不在房间里，她可以用我们的房间来给他们用。她也为那些没有来的人感到很有负担，所以她和一些妇女成立了服务委员会，人们可以为一些特别的需要寻求帮助，或者为那些有需要的朋友代求。这样母亲就接触到很多她本来不可能接触的人。

她当时一页记录有幸保存下来了：“考克医生[Dr. Corkey]向服务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照顾迪迪[Di-di]（他母亲要做手术）。威廉小姐[Miss Williams]愿意搬到他们房间和那个孩子住三个星期。”另外一个 11 个月大的孩子，在她母亲生病的 7 个月里，由两个义工来照顾。母亲还开始了“洗衣新方案”，通过这个方案，那些病重或者虚弱的人在洗衣服方面能够得到帮助。监狱的生活随着在监狱里的年日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这样的帮助。很多人放弃了照顾自己或家庭的尝试，而那些有服侍心志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忙，努力的挽救集中营社区，避免出现骚乱。

母亲在“白象交换”（在聚会上彼此不清楚对象地交换礼物）中，表现也很积极。这个活动是由她的好朋友霍巴德太太[Mrs. Hubbard]发起的，她的丈夫从一开始就是集中营的领头人。正是休·霍巴德[Hugh Hubbard]写了有名的“潍县考验”：

一个人的幸福取决于他拥有什么，或者他是什么；取决于外部环境还是内心世界；取决于或好或坏的生活体验上还是在由此素材提炼出的东西之上。

我想母亲通过了那个考验。她尽可能地寻找机会去帮助集中营里的人，就如她在外面时一样。母亲还有许多其他的服侍工作，其中包括妇女援助小组，为此，她探访那些生病和孤独的人，帮助那些过度劳累的母亲们做针线活，并组织了一个托儿所“短期照顾小孩子”。因为有很多人发出抱怨，厌倦生活，母亲有时就非常的忙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都见不到她。甚至作为一个囚犯，她也还是一个传教士。

兰顿·吉尔基[Langdon Gilkey]，在他的著作《山东集中营》[Shantung Compound]里，描述了像我母亲和埃瑞卡·利德尔这样的人。他写道：

在传教士这个群体里，似乎有一种独特的气质，那就是，当有需要的时候，每个人都只会躲开，只有他们自然且毫不做作地作出回应。做这些事情并不引人注意，但是如果没有人这样的付出，我们集中营里的人就不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说在我们集中营的存在中有任何上帝恩典的明显证据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所为。

秘密信息通道 [“bamboo wireless” 竹制无线网络]

在 1600 个囚犯里，有 400 名基督教传教士，就在我们的集中营从芝罘转移到潍县之前，已经有 400 个天主教神父和修女被转移到北京，尽管还有一些人留在了那里。其中一个是名叫雷蒙·德·迦哥特[Raymond de Jaegher]的比利时神父，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他自愿做卫生巡逻队长的工作。这样就给他一个与每天来集中营运送生活垃圾的苦力们取得联系的机会，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拥有了获得外界消息的秘密渠道。戴维·迈克尔给我们讲了下边一个故事：

“不许游手好闲，也不许和别人说话！”看守咆哮着说。而这时候，德迦哥特刚好在看守的视野之外监督干活的人，与此同时，他还紧紧盯住那个帮他传信的苦力……当看守在角落里的时候，那个苦力就转过去，看着德迦哥特那个方向，朝灰尘里吐了一口……德迦哥特……就从灰里边把那苦力吐出的小丸捡起来。他一路心里狂跳着回到自己的小屋，把这个卷的很紧的胶片打开，发现一小片丝绸，上边写着消息……有几次险些出问题，比如有一次一个看守……用枪上的刺刀逼着一个新苦力张开嘴……他轻轻一咽就把那个小丸吞下了，那上边写的是最新消息……尽管有几次这样的挫败，消息还是能够不断的传来……与外界取得联系后大大的鼓舞了士气，壁垒被战胜了。

另一个消息来源就是日本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对他们的纪律性和对权威的崇拜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现在有了变化。看守开始因酗酒而踉踉跄跄，并且向爱德华的朋友诺曼·克里夫这样慢慢学会了他们的语言的人抱怨自己的上司。有一天他和一个同伴在门口边倒灰边和值班的看守说话。闲聊之后，克里夫问道：“战争结束了吗？”

对方回答说：“还没结束。”另一个看守用汉语夹杂着日语和手势告诉我们战争已经结束，所有的囚犯都要被射杀，所有的日本士兵都要剖腹自杀。其他的囚犯也从看守那里听到了同一个消息。得知这些之后，我们盼望盟军胜利的心情很复杂。

解放

一切以一种很美好的方式发生了。虽然通过“秘密信息通道”我们得知已经停战，但是还没有得到抗战胜利的官方确认，直到有一天这个消息从我们头顶的蓝天上传达过来。那时我 13 岁，托杰后来在挪威的学校里写下了这个故事：

大约一年前，我经历了一生中最快乐也是最惊讶的一天。那是在 8 月 17 日上午 8 点钟，我在外面抽水，在回来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听到了什么东西，就停下来仔细听，但是又听不到。我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从很远的地方，我听到飞机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日本飞机。这次我确信了，开始绕着集中营跑着大喊着：“飞机，飞机！”但是我并非一个人，突然我就看到所有人跑出集中营观看。

在那个晴朗的夏日早晨，我们就站在那儿，看着那架四引擎的美国飞机正朝着我们飞来。很多人眼里充满了泪水，其他人则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我站那里，喉咙哽咽，看着那架飞机越飞越近，我就开始欢呼。不久，他就出现在我们正上方，我们就大声欢呼，用尽全力呼喊。这种敬意发自 1600 名囚犯的喉咙，我觉得他们在飞机上一定听到了。

飞机盘旋一会儿之后就越飞越低，欢呼的人们看到有红色，黄色，绿色，蓝色和白色的降落伞从空中下来，七个人在集中营外着陆。我们几乎无法控制住激动的情绪，我发现自己在一大群人中间，人群像洪水一样涌向关闭了三年的大门。看守害怕地跑开了，像一群野牛，我们冲向平原寻找我们的营救者。当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把降落伞举在肩膀上，像英雄一样扛着进了集中营，这时候乐队奏乐，我们唱起盟军各国的国歌。若是没有在高墙内 3 年的囚犯生活，没人能想象重获自由的美好……

现在我们的解放者接管了集中营，一位芝罘的老师写道：

昨天我们举行了庆祝胜利的晚宴，每人一个西红柿，还有一个苹果！宴会的气势简直势不可挡！第二天我们跑出来的时候，中国人很惊讶地看到我们都是赤脚；有的去接孩子并带回家。他们还送来棉质的里衣。男孩子和男人们也都没穿衬衫，但是这些可爱的中国人觉得我们压根没有衣服穿。中国基督徒一整天都在门口给我们送食物。

能够重获自由，并且有这么多东西吃，人们都为之激动万分。要我们等到 9 月 25 号，也就是允许我们出来的日子，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们现在在盟军的保护之下，知道我们能回到祖国。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河曲？”我们希望在离开中国回国之前能去看看从前的家。但是当这场战争刚刚结束，为了争夺统治权，红军和国民党的矛盾又逐步升级，回到河曲已经成为不可能。

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回家还是回挪威，或者去北美看望爱德华和他的新婚妻子詹妮。当后者的大门向我们敞开之后，我们非常开心地乘船去往这个不太熟知的国家，去往新大陆，这个我们谁也没去过的地方。

第十章 父母在内蒙古的事工 以及在中国事工的继续

在等待了两个月后，我们开始了 28 天的海上航行，乘船穿越了太平洋。1945 年最后一天我们到达了加拿大不列颠省外边的新威斯敏斯特 [New Westminster]。船在海港抛锚，因为我们要等到新年假期之后才能靠岸。但是当领航员出来走向轮船，我的弟弟们厌倦了大海，请求要到岸上去。谁能拒绝这两个瘦得皮包骨头、对第一次踏上北美的土地充满热情的孩子的请求呢？

哈肯和托杰获得码头的批准在这个农场国家漫步，领航员就把他的汽艇留在了那个码头附近。他们再一次踏上坚实的土地，感到非常开心。托杰讲到了他们这个冒险故事：

我们溜达到田野上的时候，发现奶牛在吃草，这让我们感到很好奇。这些年来在芝罘和潍县，我们没有见过奶牛，所以我就朝一头奶牛走过去，试图抓住它的乳头，我想尝一尝牛奶的味道。但是，牛开始变得有些烦躁。突然，农场主从远处朝我大声嚷嚷，我很紧张，因为他穿过田野朝我走来，但是我还是设法解释说：“我只是想尝一下牛奶的味道。”

“牛奶？你从哪来的？你没喝过牛奶？”

“我们是从你能看到的那个港湾的船上过来的，刚从中国回来，我们住在那儿的集中营里没有牛奶。”

“那你们在中国和谁在一起？”那个农场主问到。当他得知我们是和中国内地会在一起，他感到十分诧异。

“中国内地会？嗨，我们支持中国内地会！我们仔细查看了祈祷书，每天都按着名单为传教士和他们的孩子们祷告。”他语速很快地讲，粗犷而热情，让哈肯和我一时语塞。

“现在上帝让你们坐船刚好到了我的田地里，这就是告诉我，我的祷告，神已经应许了。”他继续说，“哎！你们现在还活着，正如我所祈祷的那样！”

突然，他说他要告诉其他祷告的人们，这里有一个活的见证来回应他们的祷告。战争期间，每个星期五晚上在他的农场都有一个祷告会。但是，当他得知，我们有更多的人的时候，他震惊了，在听到所有信息之后，他决定请船上所有的中国内地会成员，下来开一个大的庆祝会。我们可以呆在那些为我们祷告出狱的人们家里。

我们在这个新的基督徒之家里度过了三天的感恩庆祝活动，之后就回到船上正式靠岸。红十字会接待了我们，载我们去位于温哥华的中国内地会总部，非常友好地给我们送来过冬的衣服。然后我们登上开往多伦多的火车，在那里我们和爱德华以及他可爱的新娘詹妮团圆了。

团圆

我在日记中写道：“在被数不清的记者问候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爱德华和詹妮。”次日的报纸就刊登了我们喜乐的家庭团圆照片。接下来我们开始弥补这些年无法见面和通信的遗憾，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互相问起讲述这些年发生的故事。我们住在内地会总部，但晚上去爱德华和詹妮的学生公寓共进晚餐。爱德华当时在多伦多圣经学校[Toronto Bible College]读书，而詹妮在传教士医学院[Missionary Medical Institute]读书，他们都在预备将来在中国内蒙古地区的事工。

在四月份，学校的学期结束，我们就跨越国界去探索另一个新地方——美国，这次是詹妮的妹妹一家向我们敞开了她的家。战后基本上不可能找到我们全家可以居住的公寓，所以母亲非常感谢他们的接待。她已然学会了绝不想当然地看待家庭生活，而是永远把这些看作来自上帝的特殊礼物。

我们也可以有机会和他们分享战争期间我们蒙神所爱的故事。纽约附近的挪威自由福音教会是父亲 30 年前讲道的地方，特别是其中第六十六大街教堂是他被按立的地方。很多人都还记得他，有一个人对我讲：“我每天都提名为你祷告。”我感到很诧异，母亲也是。她写信给挪威：

这次在布鲁克林和新泽西[Orange, New Jersey]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在自由教会见到了很多朋友，我感到非常开心……所有的孩子们都和我一起为主的恩惠作见证。在几次聚会中，全家人起来发言，上帝也使用了我们的见证。当孩子们起来讲述上帝给他们的带领，常常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祷告说，希望自己能被保守，并能在基督的服侍上有分。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亲戚，他在布鲁克林听到过我们的见证：“噢，我永远都无法忘记你母亲能够经历战争回到家乡，真的很幸福。她有这么多的孩子上台讲话，好像你们有八个孩子。”

我们并没有八个孩子，但是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确实增加了人口。母亲的第一个孙子雷夫·彼得[Leif Peter]也就是爱德华和詹妮的孩子。这就意味着，托杰森一家七口要和兰德鲁兹[Landruds]一起住在他们那四个房间的小套房里！但是并没有住太久。六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一大群人就一起离开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母亲发现没有父亲和我们在一起，回到挪威是多么的令人害怕，我们好似又回到了那种悲痛之中。1937 年离开挪威的时候我们全家有六口人，而现在，1946 年要回去的时候，却只剩下 14 岁的托杰，哈肯和我要在美国读书，爱德华和詹妮打算去内蒙古。

但是母亲再次转向神，从神那里获得了力量。她找到了一个事工：就是与挪威各地的会众分享战争故事以及上帝对我们的恩慈。与此同时，她还管理了一所可容纳三十人的“布道之家”。在那里，她和托杰及其他传教士家庭住在一起。

爱德华完成父亲的心愿

在 1947 年年底，爱德华和詹妮出发去中国之前，到挪威向母亲和詹妮的母亲告别，他们都希望能在挪威向神的子民讲述内蒙古的需要。母亲非常高兴，因为爱德华正在继承父亲所未完成的任务。爱德华给《来华传教士》提交了一篇文

章，这就是他的故事，讲述了神是如何借着父亲所关注的事情来呼召他向内蒙古传福音的：

如果现在福音没有到达内蒙古，我们还会失去下一代人——这就是当年父亲越过长城去探访中国定居者时遇到蒙古人，他当时的想法。我当时还小，已经不记得他讲的话，但是在他在在中国为主殉道之后，在我得到主明确的呼召之后，我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如果可以，他一定会把生命奉献给蒙古人的得救事工上。如果有什么事让父亲感到伤心，那就是在长城稍北一点，那里有 8-10 个蒙古部落，他们没有上帝，对这个世界也没有盼望……父亲盼望能有人跟随这个呼召把福音带给他们……上帝两年多一直呼召了我，直到上帝的恩典在我的生命中得胜，我心中才有了平安。

航行到中国

1948 年 9 月 1 日，爱德华，詹妮和小雷夫乘船前往中国。在他们启航之前，他们的资深传教士告诉他们说现在去蒙古的时机比从前好多了。他有一个 8 匹骆驼和 3 匹马拉的活动房屋，正准备组成一个团队深入到蒙古境内。爱德华简直等不及了。

当他们到达离天津很近的塘沽，詹妮说她遇到了第一个文化冲击是，她发现爱德华好似回了家乡，当她还在研究这片全新的土地，爱德华正操着地道的汉语和他们在街上碰到的人交谈。那位资深传教士在天津和他们碰面，告诉他们由于共产党人在那里的优势，他已经离开内蒙前往宁夏，不过，在银川有一个五个房间的小旅馆已经为他们预备好。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大部分的外国人转移离开中国北方的同一天里，这一小批朝圣者则是花了 3 个半小时飞到内地，又从银川坐车到甘肃省学习蒙古语。

爱德华在小旅馆里写信给我们，讲到未来将要出现的一切令人兴奋的可能性。二月份他们生下孩子之后，就可以回宁夏或者深入到甘肃的西北部，或者去新疆。由于八百万蒙古人游牧部落在中亚到处转移，爱德华他们将有很多选择。

“我们是 11 月 28 日父亲的生日那天到达的，”爱德华从兰州给母亲写信，带着圣诞节的问候，他写道：“今年我们全家分散在世界的四方。”我们在三个大洲：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但是我们在灵里是与爱德华和詹妮一起在中国的，和他们一同在中国为基督开拓新的疆界。

爱德华很高兴，他的语言学习是对旅行的很好帮助，让他们能去探索未来更多的可能性。他和他的资深传教士多次前往甘肃的边境，进入到青海省，只要是蒙古商队可以去的地方，他们都想办法去。仅仅是在青海，他们得知就有 13 万蒙古人，分成 29 个部落。在 7 月 25 日的时候，他们还在打算去都兰，在西宁和青海湖的西边，那里有 12 个蒙古部落。但是由于中国内战的突然升级，这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撤退是早晚的事，爱德华和詹妮知道他们在中国的时间屈指可数。

第二座托杰森坟墓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动身离开中国和蒙古，直到托杰森家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又增加一个新坟墓。小大卫是2月4日出生的，常常很满足的微笑着。但是在3个月大的时候突然病重，疼痛地呻吟着，看过医生了，但是还是死在了詹妮的怀中。

那时，爱德华还在内蒙地区考察的途中，起初詹妮以为他赶不上葬礼，但是他奇迹般地早早赶到张掖，在那里有一个电报等着他，所以他就按时赶回来了。大卫被葬在其他几个传教士孩子旁边，这样大卫就和他祖父一样埋在中国的黄土地上，等待复活的日子到来。

几个月后，去青海的旅程被取消了，当时毛派政权官员不批准。爱德华和詹妮后来写信说：“随着解放军力量的壮大，他们越走越近，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离开。作出这样的决定对我们来说很是艰难，但是当我们真的在1949年8月13日离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就是主的意思。”

他们和两个蒙古家庭在一起，包括他们自己的语言老师和其他传教士，他们在香港外边的南岛创办了蒙古研究所[Institute of Mongolian Studies]，在那里他们忙着修订蒙古语新约圣经和为将来的传教士预备的语言学习手册。“祷告求主预备时间回到蒙古，”他们在九月写道，“在灵里我们得胜！”他们仍然决心保持父亲的梦想不灭。

母亲中国之行的计划

就在爱德华和詹妮离开中国的那个月，母亲动身离开挪威。她计划到美国看望哈肯和我，然后希望能在某个时间去到中国。她充分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但是还是希望她所爱的河曲能向她再次敞开大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广东解放。

中国内地会做出一个有争议的决定，就是在共产主义政府下继续进行中国的宣教事工。当英国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时，他们把这个承认看作对自己决定的进一步确认。“另外，中国不会改变！”一位中国内地会的作者写道。“在这一千年里，先后经历外国入侵，政治剧变，而这个国家从根本上还与从前一样。她没有抵制过征服者——她吸纳了他们！中国人将比共产主义更长寿。他们看似让步，但最终总是我行我素。”这个乐观的看法给母亲带来了盼望。

夏天快过完的时候，哈肯和我在芝加哥车站的月台接到了母亲和托杰。火车进站的时候，母亲还是和蔼依旧，而托杰不再是刚从集中营出来时候那个皮包骨头的小家伙。他身材高大，手里拿着滑雪板，就像一个体育英雄一样看着我。我们和他相处了几天，补偿一下三年的别离，我把他安顿在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我刚刚从该学院毕业，打算去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继续读研究生，而哈肯也在那里入学了。因此我们为母亲和我们两个在明尼那波利斯预备了一个套房。

母亲很激动，自从1940年父亲过世之后的那个夏天，她第一次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一起在家里。但是她依然还是一个朝圣者，总是提醒我们只要可能，她不久就会回到中国。她现在还是个传教士，正如父亲在世的时候一样。神给她的呼召与父亲的呼召是截然分开的，所以不管父亲在不在，都不会影响到她要不要继续自己的事工。在挪威有人试图打击她的积极性，建议她稳定下来开始舒适的生活方

式。但是母亲并不感兴趣，她已经得到呼召要做列国的先知（耶 1：5 – 10）。

作为一个传教士先知，她利用每一个机会告诉年轻人再也没有比为主拓展新的疆域更让人激动不已了。露丝·斯特姆·特依阿噶拉金[Ruth Stam Thiagarajan]，这位去往西藏的传教士，还记得 1949 年的秋天，参加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College]传教士大会时说：“我突然注意到一个身材纤细的妇女穿着黑色外套，身边有 6 个小伙子。我被她所讲的话完全迷住了。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我真的很想知道她是谁。”

除了在教会和学校讲给那些对宣教感兴趣的人，她还发现在明尼苏达大学里有 200 个中国学生。不久就有基督徒邀请她去参加并帮助他们的查经活动，当时使用的是中文圣经和英文圣经。随着小组的壮大，母亲就祷告求神给她一个大的房子能够开放给他们这些离开中国亲人的学生们。到了 1950 年，神果然给我们一座房子，每个周日都坐满了中国学生。

台湾和明尼苏达打开的大门

1952 年，母亲听到了来自台湾的召唤，让她去帮助那些从共产主义中国逃离的一群难民。那年她 60 岁，她登船前往一片新的土地去面对新的挑战。那年 9 月，我和母亲乘坐飞龙号[*Flying Dragon*]穿过太平洋，当时我和国立台湾大学[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签订合同担任英国文学的教师。

爱德华和詹妮他们，已经从香港搬去台湾的屏东继续在蒙古难民中传福音，母亲到了之后就加入了他们。在那里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听到了爱德华用蒙古语讲道。由于他和詹妮专注于向蒙古人传福音，但是也认识到中国难民的需要，所以很感谢母亲的到来和帮助。在台湾停留了 3 年多之后，在讲汉语的中国人中间，她已经协助建立起三间教会。

但是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在那些年里，她不仅要与哈肯和托杰分离，而且当我在台湾工作两年之后回到美国与鲍伯·马尔卡姆[Bob Malcolm]结婚时，母亲也没能出席。明白了错过唯一的女儿的婚礼对她来说有多么难过之后，我这样描述当时的庆典仪式：“母亲的座位空着，那时她在台湾，母亲明白了‘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与孩子分离’的真正意义。”

后来，她结束台湾的旅居回到明尼那波利斯，在那里她忙着汉语查经小组，这个小组后来发展为一个教会，在学生和在职人员之间取得了发展。在那儿等着她的还有托杰，准备把他的挪威妻子赖登介绍给她。结束兵役之后哈肯也回到了明尼那波利斯，依然单身的他在 1957 年决定为母亲和他自己买一栋房子。她再次把家庭看作来自上帝的祝福。中国学生继续到那里找她，很多人在这个家中跪在沙发旁接受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在感情和灵里，乃至在婚礼这样的正式场合上，她都是他们的母亲，而且是他们孩子的祖母。（除了这些中国孙儿们，她不久又有了赫尔德[Hild]和罗夫[Rolf]这两个托杰与赖登的孩子，他们住在镇上，生活很快乐。）

30 年后，我仍然与一些认识我母亲并且称呼她为母亲的家庭见面，双城华人基督教会[Twin Cit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已经增长到 300 人，而且有了自己的教堂。我很荣幸能够在最近介绍黄存望[Joseph Wong]在会议上发言，也很高兴能够分享这份喜悦，他所牧养的教会正是从我母亲帮助建立的查经班发展来的。

母亲的最后一次东方旅行

由于宣教的呼召，三个孩子结婚时，母亲都在太平洋的彼岸，现在哈肯决意要扭转局面，不想在美国结婚，坚持要去台湾举行婚礼，由哥哥爱德华和姐夫鲍伯（我丈夫）来主持典礼。所以母亲决定这个时候去东方参加家里的最后一个婚礼。

母亲已经 70 岁了，她乘飞机跨越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看望鲍伯和我，然后去参加婚礼。那时候我们是做学生事工的传教士，而她那里有很多中国学生的故事。在母亲到来之前，我在一个学生会议上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一个理想的学生工作的工人不能超过 30 岁，我把这个观点转达给她。

“噢，不是的，”她说，“这和年龄没有关系，而是要看人的心，你热爱学生吗？”她没有放弃学生工作，一直做到 73 岁，超过那个“理想年龄”40 岁。

她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完全陶醉在和克里斯滕[Kirsten]和罗依斯[O-i (Lois)]这两个孩子的玩耍中。我们有时也请她在教会和小组中，包括在牧师团体[Ministerial Fellowship]里讲话。讲到上帝的恩惠和信实，她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神情。讲了几个战争期间的故事之后，她又回到自己最喜爱的话上：“哦，但是神在最糟糕的环境里如此的恩待我们。秘诀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经历，”一位传教士后来告诉我，“不管怎样她都走过来了，依然赞美神，感谢神允许这一切发生，对神的慈爱和怜悯充满了感恩。”

作为她的女儿，我知道母亲和别人一样也会灰心失望，但是她会花一整个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晚上）进行祷告，把自己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圣灵会亲自安慰她，就像用油来抚慰她里面的伤口。神会通过经文用合适的话语对她说话，或者直接进到她的思想里，这样母亲就会重新鼓起勇气。

这次见面以后，我们和母亲一起去参加哈肯和卡伦在台湾的婚礼。我们和爱德华的六个孩子以及我的两个孩子一起参加了婚礼，我们都过得很愉快。母亲充分享受着这样的家庭活动，特别是和孙子外孙们在一起。婚礼之后，母亲和我前往香港，开始一次情感旅行。香港，那里保存着我在中国度过的童年的回忆，且是唯一向我们开放的中国城市。我们回想从前在那里的几次停留：1936 年和 1937 年，我们作为难民住在这里；1938 - 1939 年，二战后我们在那里等船；1954 年，母亲和我享受这次旅行。然后我把她送上去老挝的飞机，和哈肯与卡伦在他们家里住上一段时间。（哈肯当时在老挝与美国新闻署一起工作，该署是政府的公关部门。）

1962 年秋天，母亲精力充沛地回到明尼那波利斯她的中国会众们那里，我和鲍伯于 1964 年回到明尼那波利斯的时候，她的髋部骨折。在医院里那张宽大的病床上，她好像比我上次见到她时更皱缩了许多，现在看着就好像一只小鸟。实际上她的骨折是为了照顾上帝的小鸟。她在一个寒冷的早上拿着食物出去看他们，滑倒在结冰的台阶上。

后来，母亲坐着轮椅在家里走动，我问起那只挂在植物上的金翅雀。她告诉我那天她结婚周年，没人为她庆祝，她就给花商打电话定了一个特别的植物。尽管她没有告诉人家那天是她的结婚周年纪念日，也没说自己的丈夫已经去世，人家还是在给她送植物的时候带给她一只孤单的金翅雀。对她来说，它带来了上帝

的信息：虽然她已经很老了，只要还活着，她就可以继续歌唱。

母亲退休了

我们和母亲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休假，然后回到菲律宾群岛，她也打算退休了。当时爱德华和詹妮在新泽西休假，她就去和他们一起过冬。从那里她回到挪威的家中，赶上参加她差会的年会。在那里，她因四十五年来积极服侍中国人民而受到表彰。她还献上了她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她最后的赞美诗。

我于 1967 年和 1970 年回到挪威，那时母亲再次因髋部骨折而坐在轮椅上。我们见到了坦特 陶拉，她说自己很高兴能过来拜访我的母亲。当然她们又回想起当年为河曲带去福音，也在那里留下足迹。她们一起祷告。但是有一天母亲讲了一句话，让陶拉哭笑不得：

“陶拉，你觉得我们必须还要回到中国吗？”

“哦，不必了，” 陶拉回答说，“我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上帝悦纳我们所做的一切。”

“哦，这样挺好，我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我们不必再回到中国了。”

母亲对自己想回到河曲的夙愿妥协了，最后她觉得不回到自己付出那么多的地方也是可以接受的。

母亲所在的路德宗敬老院的主管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多次讲到我那内在生命丰盛的母亲：“她不需要外在的刺激，她在自己的内在世界里与神同在。” 敬老院里其他的人只有空洞的凝视，但是母亲则是在与神交流。她的记忆力减退，也不能分辨出时间地点，这时她就祷告，或者谈论主的事情，她就完全在场。她和上帝生活在一个没有时间和地点的世界里。

这种不受时间影响的日子一直持续到 1970 年 12 月 12 日母亲归天家的那一天。敬老院主管写信给还在菲律宾的我，减轻了我不能在场的痛苦：

我整个下午都坐在那里握着她的手，她很安静平和，我为她唱诗篇和赞美诗，希望信息能够传达到她那里……她静静地呼吸着，一直闭着眼睛躺在那里，直到下午 6: 50 的时候心脏停止跳动。她走得十分安详平和，我们就那样一直坐在那里陪着她度过最后的时光……她的走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对我来说就像失去一个很好的朋友。很高兴你们夏天的时候在这里，哈肯也在这里。我相信她的心和你们如此贴近，所以空间上的分离并不重要。她活出了丰盛的内在生命，在那里，你们都在。

爱德华飞去挪威操办她的葬礼，自从 1920 年母亲签下生死状而奔赴中国，已经过去了 50 年。她愿意为中国人的福音生命而活，也愿意为之而死。和父亲一样，她荣耀了主的名。父母都跑尽了当跑的路，守住了当守的道。现在两位朝圣者都终于回家了，在那里：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 12: 3）

尾声

回到河曲(黄河之歌)，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那里的人和事让我牵挂了半个世纪。我曾被切掉了我的生命之根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曾和那些关心我、同我戏耍的中国人，还有那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失去联络。所以那次回去真的是在回家，它给了我一种内心的完整感。“黄河之歌”在我心中再度唱响。

在父亲长眠于黄河之滨 48 年之后，我回到了河曲。张医生信守承诺，当我们的飞机抵达山西省会太原时，她为我们办妥了一切手续。很高兴，她提出可以陪我们一起到河曲。

我在 1988 年 2 月 4 日的日记里写道：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上午 7 点半我们出发，路过一些城镇，比如我母亲结婚前住过的静乐，然后是类似沙漠的地区，那里有一簇簇的干草和一些羊，更多的是我记忆犹新的沙丘。从太原到河曲，过去我们要骑着骡子走 8-10 天的路程，如今沿着黄河驱车行驶在柏油路上，8 个小时后我们抵达河曲。到达之后，七位市里的神父为我们接风。通过老全当县长的儿子，我们找到了老全，他曾是我们的看门人，县长在我们的影集中惊喜地认出了他。

县长捧着影集开心地笑道：“瞧，这是我的老父亲。”他说老全至今还在坚持读经、祷告和唱诗，总是对他讲一定要悔改归向主，否则就得下地狱。他在陪同的人面前讲起这些的时候非常释然和骄傲。县长也提到他的父亲曾做我们的看门人这个事实，这立刻就和我的过去建立了联系，让我更加确信自己真的是回家了。

第二天，我情绪饱满地醒来。我真的在河曲吗？那天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一下不停地聊了 13 个小时。先是老全一来说：“玛利亚来了！”他还记得当年和我们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又有许多故事要讲。他看到我的影集里有他和河曲聂牧师的照片，很是高兴，聂牧师现在在内蒙古牧会。老全现在 73 岁了，他讲到当年我们家的房子被炸，提到我父亲时用他的中文名字叶永青或叶牧师，叫我母亲叶师娘。

“叶牧师是个好人，”他继续道，“我生病的时候他为我煎药，他陪了我三天三夜，冷的时候他给我买件皮衣。我当时得了肺炎，全无胃口。”

老全带我们去了水草沟，我父亲墓地所在的地方。墓地现在位于一片耕地的中间，但是周围邻居都知道那个地方，拆去篱笆和墓碑的时候他们都在场，至今还记得它确切的位置。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看书了解到中国有十几亿的人口要养活，不能拿出肥沃的土地来用作坟地。不过，还是有些震惊。我的脑海里还是母亲和坦特·陶拉描述的画面：坟墓座落在一位农民奉献的一片寂静之地。她们说，墓地围着整齐的木栅栏，每到春天，墓地四周的花园里鲜花盛开，在通往花园的门口，木匠曾问母亲是否可以放一个十字架，因为父亲总是跟他们

讲到十字架。

虽然没有这样一个怀旧布置，但是爱德华的女儿吉恩·瓦波格[Jean Valborg]做了一个可爱的陶瓷碗放在她祖父的墓上。河曲的领导们也请来县里最好的书法家在上面写上：“叶永青之墓”。

很多邻居聚集到墓地，三位老人说他们对叶牧师很熟悉，也记得父亲当年下葬的地方。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妇女说她是我从前的玩伴。

看完墓地，又去拜访了几位邻居，然后我们去老全家吃饺子，县长和全氏家族的人都在，美食之后，老全拿出已经破旧的圣经和诗歌本，我们一起唱诗，谈论主道。虽然我汉语水平有限，我和这位老人很默契，在某种程度上，我和那些语言上容易沟通的人还达不到这样的合一。老全实在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他告诉我们当年在劳改营里度过了九个月，他被弄到那里去清洗基督教思想。

饭后，老全带我们去看老房子，或者说是房子遗址。他认出来一段房顶和一个窗户，房子的残余还像我童年时候那样。那里是储藏室，我们冬天在里边储存葡萄干。门口的池塘还在，我还记得那个池塘，水井也还在。然后我们走到当年也被日本人轰炸了的教堂遗址上，不管旧建筑是否存在，我的心里都在高唱：“我们站在神圣的土地上。”

在老邻居们中间走动的时候，我遇到三位老人，他们还记得我们家，对叶牧师也很有印象。我们回到宾馆的时候，人们继续来拜访我们，直到晚上9点，其中一个人是我从前的玩伴，她是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来的。她告诉我们她叔父也是个基督徒，还派他儿子去找他过来。那位老人已经是82岁高龄，来了之后，回忆起很多事情：“叶牧师来问我是否想加入教会，叶师母还治好了我兄弟的大脖子病。不过，我爹没有加入教会。文化大革命那阵子，政府还派人来问话。我跟他们说，我啥也没做错，只不过是被治好了病。”然后他很羡慕地补充说我对父亲很孝顺。“我的儿孙对我很不好，就因为我是基督徒。”

河曲之外的歌声

2月6日我们出发前往黄河，我们小时候在那儿玩耍过。由于河面结冰，他们问我们是否愿意走过去到内蒙古，于是我们就到了父亲一直梦想着要传福音的地方。

我后来在日记里写道：

就在河中央，我的心被震动了一下——神正在使用河曲的教会、使用聂牧师来到蒙古人中去。先是爱德华，现在是这些宝贵的河曲基督徒，尽管他们知道会有逼迫和分散，就像《使徒行传》1:8所讲的那样，“有大逼迫临到教会，他们在全地四散。”赞美神，因他使用这种古老的方式。

我站在河中间领会真理的那一刻之前，一直想知道基督徒们曾经有着怎样的遭遇。为什么我只见到不多的一些人？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年轻的基督徒已经离开了内蒙古，在那里有2万从河曲县里搬去的居民。现在河曲全县只剩下12万人口，河曲县城里有1万人，和1939年被轰炸期间一样的数目。正当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口早已翻了几番的时候，河曲的人口却没有增加。

后来他们还向我们讲起内蒙古教会的增长情况。在省会包头市（河曲向北 130 英里，我的家人很熟悉这个城市），有 10 间注册教会，100 间家庭教会。仅去年就举行过 1000 次洗礼。我很清楚地明白，这也是父母当年操劳所结出的果子。他们的赞美诗融合在黄河之歌里，深入到了离河曲几英里之外的内蒙吉。

研究人员赵天恩在他的叙述中也提到过内蒙古教会的增长：“在过去的 40 年里，尽管存在着大逼迫，或者正是由于这逼迫，中国教会从不足 100 万已经增长到 5000 万。”《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的作者戴维·巴莱特 [David Barrett] 也讲到同样的好消息。他说在过去的 2000 年里，自从新约教会产生以来，中国教会的增长胜过任何其他教会。感谢神，我的父母在那些数字的增加上有份。

当我在冰冻的河面上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感谢上帝对我长期以来的问题给出了部分答案，我常问：在我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为什么我必须要失去他？那年我才 14 岁，爱德华 15 岁，哈肯 11 岁，而托杰只有 8 岁。当然直到归天家，我们才能解答这些困惑。但是那时我感到似乎我已经捕捉到一丝答案的痕迹。我有了新的见证，父亲的遇难不是枉然。

河曲的见证

后来，在宾馆温暖的床上，我对全能者又有了其他一些问题。在这个地方可能有家庭教会，但是我们不是很确定。而河曲的情况又如何呢？为什么这里不能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有个教堂呢？我不愿意说父亲的死没有持续地感动着河曲，其他的一切都看似很好，但是在河曲，主日没有基督徒聚会唱诗赞美是件让人痛苦的事。

那晚在我们休息前，来宾馆看望我们的人中有一位是何灵医生，他现在是县医院的院长，那个医院是一栋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我母亲的诊所在山西的这个地区曾经是唯一的医疗中心。从那个诊所到现在有自己的医院，河曲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何医生在我的影集里认出了他的祖母，讲到她每天祷告，一直坚守着她的信仰。最后他说：“从来没有人说过你父母的坏话。”

他讲这些的时候，我想起自己从前听到从河曲传来的消息，当时处于共产党接管的早期。那些与传教士有来往的人都被指控为与帝国主义勾结，但河曲的基督徒们说：“叶永青不是帝国主义者，他来自挪威这样一个小国家，在我们中间生活，也死在这里，永远是我们中的一员。”

四十年后我再一次听到同样的说法。我们和县里领导三个晚上的谈话慢慢地就成了固定了一个主题，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讲道：“我们现在 40 多岁了，虽然我们从来不认识你的父亲，可他是我们县历史里的一部分。我们从长辈那里听到很多关于他的讲话和事迹。”

我渐渐明白圣灵在延续着活的见证，来记念那个来到他们中间的牧者。这生动的见证一代代传递下来，而那座墓更是强化了这个见证。父亲的墓强烈地代表了他对当地人民的热爱和奉献。文化大革命期间，《圣经》都被焚毁，教堂也被关掉用作仓库，牧师和平信徒们要么被杀害要么入狱。然而父亲的陵墓一直在倾诉着他对河曲人民的爱，谁也堵不住这片墓地的嘴。

那时候河曲没有可见的教堂，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黑暗的日子里，它却有一种没人能挪去消除的东西。墓碑被拆去了，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墓地在哪里。没有人忘记那位自愿留下的牧者，他和他们一起受苦，一起遇难，最后埋在他们中间。我们其他人最后都离开了河曲，而父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来没有离开过。

然后我就看到了母亲永远没法看到的答案，在尽力回到河曲之前，她就回天家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 20: 29）。但是对我而言，神给了我回来亲眼看到答案的恩典。

在我们在河曲的最后一个上午，当我们驱车出城的时候，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停下片刻再看一眼那片墓地。但是我知道张医生很着急离开，因为我们的许可证已经到期了。我努力克制着多年的情感在内心的涌动。当我们路过时，我朝父亲墓地的方向看了一眼，哽咽着留下泪水，在心底默念：“爸爸，再见！”

记念叶永青

我为什么要在 14 岁的时候失去父亲？在我们离开中国几个月之后，这个问题有了另一部分的答案。受张医生之邀，哈肯和卡兰在 6 月份去河曲（没有在 2 月份和我们一起去）协助她举办当时的一个医疗研讨会。6 月份的时候，河曲的县领导决定为叶永青（彼得·托杰森）修建一座纪念碑，所以哈肯和哈肯作为亲属受政府的邀请去参加纪念碑揭幕仪式。对父亲和他所事奉的主来说，被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尊敬是多么大的荣耀。（碑文全文见附录 1）。

我们开始确定记念仪式的日期。父亲为河曲舍下生命已经有 50 年多了，我们希望我们这四个子女以及各自的配偶，还有尽可能多的孩子和孙子们都能参加河曲举行的叶永青记念活动，因为“耶和华本为大，该受极大的赞美……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诗 145: 3-4）。在河曲，我们要感谢神所做的大工，记念他的作为并将此传讲给后代。

所以，当十字架的精兵被人记念的时候，得荣耀的会是谁呢？当羔羊的追随者们甘心乐意地献上生命时，荣耀就归那被杀死的羔羊。

正如一位中国内地会的长者所讲的那样：

神自己就是赎罪羔羊，他们（神的追随者们）的死是在传扬他的名，听从他的命令……有一天我们将得永生，与基督一同做王，但是到那时我们能够再为他做出牺牲吗？当罪恶和痛苦不再有，当眼泪被擦干，我们还有现在这样的恩典去与他同工一起受苦去“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吗？

我在这些话中找到了得胜的注脚。基督为河曲和内蒙古所受的苦，而我们这些失去父亲的孩子则有幸得以进入到这受苦中。我实际上并没有失去父亲！他死去的方式和他选择冒着生命危险的原因都为我的生命树立了一个英雄榜样，父亲一直在用自己这种爱的方式对我说话。我所体尝的苦难同化在更伟大的事业中，同化在那抓住父母播撒福音的目标中。

父亲 17 岁时在挪威瞥见那种恩典和荣耀，他用“还有我自己”这句承诺为中国签下了生死状。在他和我母亲出发前往中国，签下那份为中国福音事业舍命的声明时，这个诺言被更新了。当他们决定留下与河曲人民一起受苦，一起死去的时候，他们再一次签下了生死状。有一天，我们将从黄河之歌中听到得救者的歌

声和着天国的齐声高唱：

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启 19：1，6-7）

叶永青的遗产

- 安德鲁 T. 凯瑟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 以赛亚书 55: 9

瓦尔波格这些年反复阅读以赛亚书 55 章这段经文，她虔诚地信靠这句话，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一家的悲剧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家庭团圆

凯莉在河曲对叶永青（彼得·托杰森）历史的调查提醒了很多当地的中国人，让他们记起叶永青一家为河曲人民所做出的牺牲。她在山西的调查和走访，让一个个坚持不懈、充满爱心、敬虔诚实的故事浮现在人们的面前，也打动了河曲那位具有现代改革头脑的党委书记，他打算树立一座纪念碑来确认叶永青作为真正的“人民烈士”的地位。

在 1989 年这个工程突然停止，也中止了联系。那位有同情心的党委书记调离了，接任的是一位很保守的领导。后来又突然有了联系，1990 年叶永青分布在全世界的子女和孙子们收到邀请函，要他们在八月份去参加在河曲举办的家庭团圆及庆祝活动。

叶永青的四个子女携配偶、孩子和孙子们抵达北京，总共有 16 位成员出席活动。他们安排了一辆 23 座的汽车，请了几名司机和导游带领他们去太原。当时北京到太原还没有高速公路，就是到了北京也对山西的情况知之甚少。车上那点放行李的空间大部分被油桶占住了：因为旅行社怀疑在山西能否买到汽油，他们在那个城市没有办事处，也没有合作的代理。一路劳累驱车 500 公里，用了 17 个小时才从北京到了太原。他们颠簸在山路上的时候不禁想起小时候的骡子和板车。

到城里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没人请他们吃饭，也没有得到通行许可去河曲。第二天上午，还是没有许可，也没有河曲官员的回话，其他官员也没有消息。下午晚些时候，来了一个消息：副省长想见他们。

副省长郭裕怀按政府贵宾的待遇接待了叶永青一家。四个子女按年龄顺序就座，爱德华坐在副省长和他的翻译之间，短暂的寒暄之后，副省长开始谈到过去以及将来。

“我研究过你们家的历史，印象很深，你们让我想起中国的传统家庭。今天我看到你们家三代人回到故乡来敬仰你们的先祖。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只是短暂停

留：六个月，一年，也可能是两年。他们有的是来教书、完成工程，或者是来挣钱，然后就回国了，还有些人来是想拿博士学位，但是你们的父亲与他们不同，不是那些遇到灾难就离开的人。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回来，长期留下来。”

郭副省长看着爱德华说：“你们这代人年纪大了，你们已经完成了毕生的工作，该下一代人回来了。”讲到这些的时候，副省长用手指着爱德华和詹妮的儿子叶福礼[Finn Torjesen]，他和妻子桑迪[Sandy]坐在一起。

叶福礼和桑迪在台湾长大，桑迪的父亲弗兰克·丹尼斯医生[Dr. Frank Dennis 谭维义]在台东创办了罗吉费纪念医院[Logefel Memorial Hospital 台东基督教医院]，这是一所首批建立的专门服务于部落人民的基督教医院。叶福礼和桑迪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一直都是好朋友，直到在美国读大学期间，他们的友谊开放出爱情之花。结婚后，他们一起在台湾服侍多年，然后搬到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叶福礼从事教会发展的事工和技术教学，这些活动是由协同会[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主办。他们小时候在台湾长大，所以对汉语比较熟悉。副省长看着叶福礼和桑迪说：“我们希望你们二位能回来继承叶永青的精神，叶牧师为山西人民舍下了生命，你们希望自己能为山西人民做些什么呢？”

叶福礼回答说：“我恐怕很难做，我是在印度尼西亚宣教，我怎能回到中国呢？”

副省长说：“我知道，可是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你们可以做哪些工作？”

叶福礼解释说他不是商人也不是教师，但是他同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郭副省长建议他回来在西方资源和山西的需要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叶福礼答应了，说自己需要两年的时间来结束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还需要一年时间在美国休假并处理协同会的事宜。他答应会到那个时候至少有一次短暂的拜访。

但是叶福礼也提出一些需要保证的方面。他一生几乎都在海外工作，意识到在异国生活会遇到的挑战和应变。他认为除非山西可以允许外国专家及其家人“正常”生活，在中国长期居留就不是切实可行的。基于此，他列出了三项要求：

住房：

叶福礼向中国官员解释说，没有自己的厨房，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人长期住在外国。酒店无法提供合适的居住，外国人是按年来计算自己居留中国的时间，而不是按天。

交通：

司机可能不错，但是日常生活需要一个正常的自己可以掌控的程度。外国人在山西生活，必须能随意并且有权决定按自己的便利方式去旅行或者日常交通——不管是骑他们自己的车还是开自己的车。

通讯：

没有与外界可靠的联系，外国人没办法解决无法避免的思乡问题。直拨国际电话，而不是通过接线总机，能让外国人和本国的亲友们取得联系。

副省长许诺在叶永青一家回到山西后，那时候山西也会有所发展，他将尽力来兑现这些要求。

第二天，叶永青一家登上开往五寨的列车，然后坐汽车去河曲。他们的朋友张医生和她丈夫钱启东又一次做陪同，当时就举行了宴会和仪式。

在 1990 年 8 月 10 日，家庭成员们在山脚下集合参加纪念仪式。纪念碑上蒙着绿布，四五个当地的老基督徒也来和这一家人聚会。叶永青家的成员每人分享一段话来纪念他们的父亲。全家人唱了几首赞美诗，然后当地的官员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们即将离开河曲的时候，叶福礼已经收到邀请在来年回到当地的一些学校里任教英语。

第一次远征

1991 年 8 月底，叶福礼和桑迪带着他们年幼的双胞胎戴维[Davin 叶致远]和丹尼斯[Denise 叶宁静]到达中国，他们和桑迪的哥哥比尔·丹尼斯[Bill Dennis]一起，当时鲍伯，凯莉，爱德华和詹妮计划在路上从不同的地方与他们汇合。马克和雷内·斯特兰德在中国的事工方面很有经验，自 1985 年到 1987 年在中国东北从事英语教学，他们也加入到叶福礼和桑迪的这次旅行中。马克[Mark Strand 马克己]和雷内[Rene Strand 周瑞妮]认识到叶永青家族遗产所提供的独特机遇，他们为有可能在英语教学领域之外的农业、科学、社区发展和其他领域里工作而大为振奋。叶福礼为这个团队起初的计划是在河曲的学校任教两到三个月。当他们 1993 年通过官方渠道再回来时，很有希望能将此发展为长期关系，并带动他们的工作。然而从一开始，事情的轮廓就不是很清晰。

到达香港之后，叶福礼开始着手准备文件来申请签证在河曲工作三个月。山西政府提供的邀请函在香港领事馆的人无法辨识，他们就明智地放弃了邀请函，申请了三个月的旅游签证。

他们在广州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经由位于北京和太原中途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他们计划在石家庄安排一辆汽车载着他们和行李一起到达太原，然后去河曲。他们到了的时候已经凌晨 2 点钟，没有找到车子，但是比尔·丹尼斯发现一辆停靠小镇的火车正要出发前往太原，大家匆忙赶车，在列车出发前总算把自己和行李弄上车。

依然是在很早的时间到达，那时候太原的天还没有亮，他们出发前往 1990 年团聚时候住的那家旧旅馆。他们看到旅馆工作人员们惊讶的脸，被告知旅馆不能接待外国客人。疲惫的旅客们顺着被推荐去镇上最贵的一家酒店，这远远超出他们的预算。他们尽力得到旅馆的工作人员的同情，并询问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旅馆工作人员虽然持怀疑态度，还是给周围其他旅馆打电话帮他们询问情况。几分钟后，旅店工作人员笑着给他们指示去三桥酒店的方向，那家酒店的价格他们能负担得起，而且能够接待外宾。

第二天张医生来见他们，这次她带来的是坏消息。河曲的官员没有权力给外国客人发放签证，也就是说实际上从技术角度是无法接待外国来访者的。他们需要马上去忻州，那里在山西中部，离太原的北部有几个小时的车程。而且，只有叶永青家族的成员才允许留在忻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教，他们最后还要在任教三周之后离开忻州回家。叶福礼讲，去忻州就去忻州吧，但是他们要带着所有成员，要么一个也不走。

然后就开始了等待，忻州学校不愿意接受所有的外国人，而这些外国人希望

情况能够有所改变。过了一些日子，张医生的丈夫钱医生突然出现宣布说学校官员来了，要带他们去忻州。

在第一周里，马克和雷内的英语教学专长显露出来。学校的校长和他们磋商签订一个为期两年的合同，以汉语辅导来交换英语教学。在其他组员离开之前，他们还打算在河曲作短暂的旅行。

在凯莉和鲍伯秋天访问山西期间，他们住在太原基督教堂里，并在那里参加礼拜。这家教堂以“大红门教堂”而闻名，因为在正门有一个传统的朱红大木门，他俩被当地人的虔诚所感动。桑迪的父母弗兰克医生和萨丽·丹尼斯[Sally Dennis]在秋天的时候也来到了山西。弗兰克被热情邀请去访问河曲、忻州和太原的大部分医院。

第二次考察

在1992年9月，叶福礼在太原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寻找各种在山西长期工作的机会。第一次的考察不是特别成功，虽然马克和雷内·斯特兰特在忻州教书并学习，但是他们与叶永青一家返回山西没有任何的正式联系，忻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没有兴趣与叶福礼或者他的家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认识到这个情况，叶福礼和爱德华出发在太原来了一趟旋风式快速旅行，他们按照前几年在山西搜集到的名片逐个联系，打过电话，做过拜访，吃过饭，然而他们的工作还是没有眉目。

就在他们即将结束在山西考察的前几天，爱德华手上那沓名片只剩下一张没有联系过，他对这个人印象很模糊，回忆起当时他们和郭副省长会面时这人也在场，爱德华觉得他还能从大家的合影里认出这人。于是他和叶福礼带着渺茫的希望去寻找这位在省外事办任职的副主任。

当时包括省外事办在内的办公楼正在施工中，看起来不像个办公处所，倒更像是被轰炸后留下的废墟。最后终于找到了办公室，一位慈眉善目的官员接待了他们并询问来访事由：“也许你们可以告诉我要做什么。”

叶福礼和爱德华互相看了对方一眼，这真的是他们在离开之前能建立工作关系的最后机会了，爱德华清了清嗓子然后又从头到尾讲述起整个叶永青家的故事：“我父亲从挪威来到山西……”

“挪威？”他打断了爱德华的话，“我自己几年前就在挪威工作过！”他介绍自己是田锡钊先生，那位副主任的上司。田先生确实在挪威一家公司工作过，而爱德华的一位亲戚也在那里任职。田先生听完整个故事之后说他当天下午就去见郭副省长，亲自跟他谈谈这次见面的事。

那天晚上，叶福礼和爱德华接到田先生的电话，邀请他们作为尊贵的客人参加一个宴会，副省长特别要求田先生的上司以及他们整个办公室要好好关照叶福礼和爱德华接下来几天的生活，确保他们一切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这个任务由田先生来负责，他现在很想知道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真是风云变幻啊！就在短短几天之内，医院，贸易以及所有当地政府管辖的行业都向叶福礼和爱德华开放了。那年秋天叶福礼离开时热血沸腾，满脑子都是

各样的选择和远景，所有一切都显示了未来的巨大潜力。

最后一步

随着在中国最后这次旅行，叶福礼也结束了他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他一家人住在美国，着手向长期以来支持他们的朋友、家人以及教会介绍一个新的国家和一项新的工作。

1992年12月24日，爱德华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了美国永青家庭服务社 [Evergreen Family Friendship Service (EFFS)]，性质为非盈利组织，“永青”二字取自于彼得的中文名字叶永青，并参考了纪念碑上镌刻的经文(摘自耶利米书第17章)。注册为非盈利、公益性(非宗教)组织是为了在美国的基金可以免税。

在1992年8月到1993年6月之间，共收到了40多份潜在申请人的资料。1993年7月，第一届永青大会及退修会召开了。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中还包括来自协同会的资深对华传教士佛农·毛特森[Vernon Mortenson]，他前来庆祝自己的女儿帕特利西亚·毛特森[Patricia Mortenson]转入永青社。1949年以前出生于中国西安的帕特，也慷慨地分享了她多年来的服侍和对外宣教的经验，来帮助运作正处于婴儿学步阶段的美国永青家庭服务社(简称永青)驻美办事处。

1993年8月23日，高[Kao]与萨瓦斯基[Sawatsky]两家加入了叶福礼、桑迪、戴维和丹尼斯的行列，当时他们正准备前往山西太原。几十年后，叶永青一家回到了山西，准备继承和发扬叶永青牧师的精神，服侍山西人民。

事工现状

当这些新一代先锋们抵达这片土地，山西几乎还没有其他外国人。作为新组建的“公益”公司，他们第一项任务就是探索什么项目能够造福山西老百姓。起初几天用在和当地政府官员交涉，他们这几个家庭被允许在当地安家。马克和雷内结束在忻州的教学和学习后帮助叶福礼在太原购置了永青的第一份产业——府西街67号二楼的一套房子。其他住处由太原负责外国人居留工作的官员来协调。当初来乍到的他们搬进第一套房子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挑战，想要为他们的家配备好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用品绝非易事。

不久，他们就清楚认识到永青需要更改中文名字。当地老百姓来找他们咨询节育，还有来找保姆的，经过这几次尴尬的来访之后，他们认为“家庭服务社”在中文里不能表达预期的涵义，名字就缩略成“山西永青咨询服务中心”，目前这个组织还在运作。

最初阶段的调研显示，农村地区的医疗培训和英语教学是山西人民最需要的服务。从那时起，永青的公益工作扩展到很多不同的服务领域。

咨询工作

从历史上讲，彼得·托杰森(叶永青)参与过帮助修筑山西的一些道路，今天，人们对他的纪念已经建立起山西和外界之间的桥梁。永青的咨询工作有效利用了这个桥梁，为山西各个方面的发展提供国外的专业性的意见。从传统的商业咨询、当地研究，到各种培训，教会援助，以及教育和体育方面的交流，永青的咨询工作随着山西需要的变化而变化。

英语培训

当年在河曲小小的学校里，一群努力的年轻学生跟着奇怪的挪威人学习，这幅古老的画面如今依然存在。今天，永青的英语项目寻求通过英语教师培训来使山西老百姓受益，目标人群是来自山西几个贫困县的中学教师。每个夏天，永青的专业外教成员会深入到乡村，为这些从未听过英语母语人士讲话的年轻教师提供为期一周的免费英语课程，河曲就是其中一站。他们把新颖的教学技术和教学资料介绍给这些乡村教育工作者，给他们带来无法想象的机会——当地教师自身的教学技能得到提高，学生的学习环境也得到了改善。永青的英语教师也在城市里开展工作，他们帮助教会和政府部门进行英语培训，还为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提供英语家教辅导。

医疗工作

就像很多年前的瓦波格，永青的医务工作者致力于用自己的医学恩赐来服侍山西人民。他们把重点放在农村，永青的医护人员协同当地医务工作者以及政府官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培训和专家意见。该项目类别很多，富于变化，其中包括诸如基本的乡村医疗培训（称作鞋匠项目[Cobbler Program]，目的是“为中国赤脚医生穿上鞋子”），婴儿健康检查[well-baby check-ups]，胎儿监测[antenatal monitoring]，全科医学培训，在当地医院临床实践，以及撒玛利亚基金[Samaritan Fund]——为没有能力支付治疗费用的人提供经济援助。永青的医护人员居住在乡村，他们在那开展工作，重视与当地的合作，并参与到各项力所能及的工作中。

社区发展工作

彼得和瓦波格在日本侵华和国民党武装攻击期间帮助难民逃离灾难，这一善举让当地百姓对他们永远感激不尽。永青开始社区发展项目同样是为了服务于现代山西的弱势群体。从小额信贷和奖学金到救灾和职业培训，永青的社区发展工作寻求缓解诸如贫困以及其他导致许多山西人民发展滞后的问题。

农业发展工作

彼得和瓦波格花了很多年同河曲周边贫困地区的饥荒及其后遗症做斗争。永青农业发展工作自然源自于永青其他农村项目中，如今还包括新技术的引进和新市场的开发，农民合作社，培训中心，还有一个示范养猪场。永青所有的发展项目都将重点放在与那些受益于他们的培训和帮助的人们进行个人互动。

山西永青国际学校

就像很多年前彼得和瓦波格努力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安全、有教养的家庭，永青今天欢迎广大的家庭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此，他们成立了一所“一间屋学校[one-room school house]”来为自己的孩子们提供中小学教育。充分利用了最好的西方教学和住在异国生活所带来的独特机遇，山西永青国际学

校旨在培养有信仰的孩子们，保证他们在护照签发国和中国都能自在生活。

山西永青咨询服务中心国际交流处

作为一个实体，交流处负责永青与当地警方和政府官员的大部分官方交流，使永青的全体成员能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安排住房、财务、签证、居留以及工作许可。永青所有的来客和来访都由这个交流处负责处理，它是永青向当地官员展示自身特点、介绍永青咨询服务中心事工的主要方式。

这就是叶福礼、桑迪以及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的同工们以叶永青（彼得·托杰森）的名义在山西继续开展的各样事工，以上对今日永青现状的概述只是他们为耶稣基督所做事工覆盖的广度和深度的一瞥。

永青的服务宗旨

在最初几年里，同工和这些家庭成员们达成共识，一致通过了永青的服务宗旨：

山西永青咨询服务中心协助山西省及中国发展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公益性服务工作，继承和发扬叶永青牧师的精神，接受上帝在生命中的呼召，彰显信仰耶稣基督的价值。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年来已经形成一些与众不同之处。为了对永青及其在山西生存和开展事工的独特方法有个更完整的认识，有必要看一看几个核心价值观。

长期承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她的成长不是以年计算，而历经朝代更替变迁。历史是有力量的，长期的奉献能够给山西带来变化，永青的存在就是对此的一个有力见证。彼得和瓦波格甚至他们的孩子们在山西多年的付出，为永青今天的长期事工树立了楷模。

今天，山西永青咨询服务中心要求成员必须承诺能长期工作，并严肃认识到自己将要用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在山西服侍主。为了帮助这个承诺更具可行性，该组织在当地购置了房产，这使得国外的基督徒能够在永青有很强的家庭归属感，愿意扎根山西。

文化融合

只要有可能，永青就努力让自己的事工和生活与山西人民的节奏合拍。很显然，在很多领域里永青的事工旨在指导和引领中国的发展，但是即便是在这些领域，该组织依然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来寻求一种平衡，既要尊重当地喜好又要向对山西发展有害的当地习俗发出挑战。不管是在医疗、教育、发展、还是咨询事工上，为回应当地的要求和条件，他们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不是盲目地照搬外部的一些做法。

要求一个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晓得何时需要适应，何时需要面对，其实不容易。随着长期居留，要想达到这样的敏感度，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在语言上达到熟练流利。为此，永青要求所有的成员（包括孩子）都能在一定程

度上熟练掌握汉语，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如地在中国开展各自的专业工作。新来的永青成员要等到完成相当于在当地学习两年汉语的水平才允许开展工作。

如果没有用山西话自如交流的能力，也不能真正理解当地人民的喜怒哀乐。有了流利的语言，就打开了交流、理解、同情和行动的大门。

合作关系

永青事工的核心是合作的理念。彼得和瓦波格到达中国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强调当地人要有当地人的教会，这很重要。聂牧师和周贵基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他们跟在彼得和瓦波格身边，一起工作，亲身经历着他们的生活，然后带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到新的地方，进入新的人群之中。

在现在开展的所有项目中，永青寻求与当地同工和官员的共同合作。为了利于允许永青成员和本地同工团结协作方案的实施，那些会导致外国成员取代当地同工的项目是不在考虑之列的。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永青都会尽其所能地确保当地人对项目所有权的控制，以便最终达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这使得永青近来更加重视本地员工在给山西带来积极变化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视本地同工在属灵和专业方面的发展，他们更有能力影响自己的社会。

开放的基督徒

这一点强调要把合作精神带入与山西本地信徒的关系中。永青也真诚地认识到在历史上，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中确实存在错误和欠妥的部分，充分尊重当地信徒团体的主权和自治，就意味着行动之前要征求意见，旨在服侍而不是领导。

本着叶永青的精神，永青来山西服侍的独特邀请使得该组织有极大的自由，这让我们在中国社会所遇到的每个人面前可以宣告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后代所继承的精神遗产，即继承叶永青的精神继续服侍。与此同时，这个邀请也带着极大的责任，高层官员对永青是信任的，永青也不愿辜负这份信任。本着这样的目的，永青在中国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强调基督徒活动的广度，更深远、更大胆地理解中国的宗教规章，希望通过目前诚实的展示能够得到更大的信任，并使所有信徒在未来能享有更大的自由。

工作职场与福音禾场

最后，永青的同工像彼得和瓦波格一样把生活的全部看作对上帝做的见证，不论是欢笑、吃饭、祷告或者是在家里工作，彼得和瓦波格都活出神的荣耀。这也是他们分享的一个呼召，今天的永青对那些愿意加入的家庭所报的期望也是如此。不过更重要的是，永青仍然拒绝那种把生活严格分为“属世工作”和“属灵服侍”两种活动。永青在中国不是一个披着服务大众“外衣”的福音机构，而是相反，工作要被严肃对待，进而在工作中服侍神。永青的同工们努力活出“盐”的生活，就像“城造在山上”(太 5: 13-16) 彰显给所有人。不论是与老农一起在田间劳作，和官员一起用餐，在教室上课，与信徒一起学习神的话语，还是在市场买菜，永青的成员都竭力在每件事上服侍主，只

有以这种方式永青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和山西人民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在山西省的西北角，黄河在转弯处环抱着一个小城的郊外，就在这里矗立着一座纪念彼得·托杰森（叶永青）的石碑，碑上用汉语镌刻着耶利米书第17章，第1节和第8节：

倚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可靠的，
那人有福了！
他必像树栽于水旁，
在河边扎根，
炎热来到，并不惧怕，
叶子仍必青翠，
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
而且结果不止。

通过山西永青咨询服务中心今天的服侍，叶永青的生命以及许多年前做出的牺牲仍旧结果不止。

永青所做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在其背后神仍旧是那位“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的神，仍旧是在叶永青一家伤悲的时候仍于他们有益的神。神带领过那些年轻的仆人们，今天他也同样带领他仆人们前进的道路。山西永青咨询服务中心的成员们来到山西把神所赐的一切拿来服侍邻舍，谁是他们的邻舍呢？就是那些在山西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们。很多年前，他们中有些人因为看到了这个挪威家庭为服侍神舍己地付出，而凭着信心来到中国。

多亏有那么多像叶永青一家的人们的工作和牺牲，中国今天才有了自己的教会——一个不断壮大的教会。目前这里依然有很多空间留给海外那些愿意在中国服侍的敬虔信徒。彼得和瓦波格的故事今天仍在这个以他们名字命名的组织中继续，因为那些加入到永青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立下了生死状。今天如同过往，目标只有一个：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 腓立比书 1:20

10周年版后记

今天，当我坐在这个中国小餐馆里享受一盘川味回锅肉和美味的中国饺子时，我想到了祖父母当年来到中国所遇到的情景。中国对他们来说很遥远，而且他们当时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做出的是更永久的选择，他们没法冀望于他人的支持和鼓励，就像我和我的家人一路走来所感受到的。

我是看着祖母瓦波格在台湾服侍中国人长大的，听到很多有关祖父彼得的故事，以及他们二人和孩子在中国所的一切。当我姑妈凯莉·托杰森·马尔卡姆第一次写《我们签下了生死状》[We Signed Away Our Lives]这本书时，我很高兴地看到那些故事能写出来，也听到了父辈之间积极地讨论每个事件的细节，包括他们父亲的去世，家庭成员的各种离别，以及在日本集中营里的挣扎，一些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童年时代的特别记忆。

然而，若不是后边发生的事情，这也不过是另一本书，讲述一个特殊家庭的个人悲喜剧。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我们家能够重游当年彼得和瓦波格在山西工作的地方。访问之后，山西省的一位副省长大胆地迈出一步，邀请我们这个传教士家庭回到山西，发扬叶永青的精神继续服侍山西人民。

这个故事于是就超越了我们叶永青这个家族，而包括进了全世界的男女老幼。我一直很震惊地看到来自北美、欧洲、亚洲、澳洲的人们回应这个呼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以基督徒的身份公开地来到山西，继续彼得和瓦波格已经开始的事工。

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也许已经对过去的这些人的精神和勇气感到惊叹，但是也要注意到，神用他那奇妙的手持续地施恩于中国人民。这是讲述上帝想要祝福中国一个几乎不知名的省份——山西的一本书；这也是一个关于山西在上帝荣耀己名、赐福世界这个更大的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故事。

我有一个祷告，就是这本书所讲述的事情能够让你们请求上帝继续赐福山西省，也祷告上帝借着山西来赐福全世界。今天我坐在中国，品尝着美味佳肴，我是有福的，不只是因为食物，也是因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寻求和信靠爱他们的那位神，并在这样的寻求和信靠中成长。

我盼望在 20 年里能够读到山西的中国弟兄姊妹所写的续篇，我祷告这个续篇讲述一群山西的男女老幼为主签下生死状——不是去死，乃是为神的荣耀而活。

叶福礼

山西永青咨询服务中心执行主任

2003 年 6 月于上海

附录一

叶永青牧师河曲纪念碑碑文：

牧师叶永青先生一八九二年生于挪威。幼年献身基督。稍长，向往东方，尤慕中国，以传福音于我国民间为己任。

一九一八年，二十六岁，奉派来华，选定河曲为其教区。自是，举凡救灾、医疗、教育均有贡献，造福地方，深植友谊。

素奉圣经金句

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

他必像树栽于水旁，

在河边扎根，

炎热来到，并不惧怕，

叶子仍必青翠，

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

而且结果不止。”

“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为座右铭。故以叶永青二字为华名。

先生毕生勤劳忠诚，宣示和平爱人之道不倦，力斥侵略战争。一九三七年日寇侵我，先生助我军民，反抗侵蚀；惜事机不密，为敌军探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突以编队飞机俯冲轰炸教堂，先生殉焉。年四十七岁。

先生酷爱中国，毕生为服务人民，抵抗日寇而死。缘立石于此瞭望河曲平原之地，以慰其灵，而垂永久。

附录二

河曲一位德国天主教神甫在叶永青逝世周年发给瓦波格的信：

愿平安、恩惠归于我们尊敬的叶太太：

在您丈夫逝世周年之际，请允许我向您及您的子女致以忠心地慰问，也请代我向叶牧师的父亲以及家人转达问候。我们敬重那些为祖国奋战牺牲的勇士，然而当一个传教士献出了他生命，我们所有的人，尽管怀着悲伤，却能分享神圣的喜乐。叶牧师作为上帝的战士站在最前线，承受着战争的伤痛，却也获得胜利的不朽冠冕。再等待片刻，您就能与他相见，永不分离。愿您丈夫的工作和牺牲有助于我们亲爱的上帝缩短那些饱尝战争苦难的日子，不久就是整个世界的和平。

再一次向您的子女致以我真诚的问候，愿他们像其父亲一样虔诚、勇敢。

致以由衷得问候！

普罗斯波·卢伯[Prosper Luber]神甫

大事年表

(楷体为政治事件)

公元前 1766 年 - 公元前 1122 年	商(殷)朝在黄河流域繁荣昌盛，中国文化发源于此(大约在摩西时代)。
公元前 255 年 - 公元前 206 年	秦朝，以中国命名，出现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连接起 1500 英里的长城。
1840 年 - 1842 年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武力侵入中国，打开对外贸易，取得内陆航运权，随即出现宣教活动。
1892 年	彼得·托杰森(叶永青)和瓦波格·托杰森出生于挪威克里斯蒂安桑。
1900 年	义和团运动。
1911 年	辛亥革命结束长达 3600 年的王朝统治，孙中山宣誓为第一任总统。
1913 年 - 1916 年	彼得 2 月份离开挪威前往位于明尼苏达州路什福特的挪威福音自由教会圣经学校。
1914 年 - 1918 年	彼得在穆迪圣经学院学习三年之后前往美北浸信会神学院继续学习。返回挪威进入宣教事工。
1916 年 - 1918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 年	瓦波格参加护士培训，预备宣教事工，跟随彼得回到挪威后二人订婚，他们被批准成为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候选人。
1919 年 - 1920 年	彼得乘船前往中国。
1921 年	瓦波格参加为期一年的圣经学校学习，之后进入中国内地会学校。乘船出发前往中国。
1921 年 - 1923 年	彼得在长城与黄河交界的河曲开展全新的福音事工。
1923 年	瓦波格在结婚前完成必需的两年语言课程。
1927 年	彼得与瓦波格在山西成婚。
1928 年	蒋介石发起反共行动，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
1928 年 - 1935 年	由于时局动荡，5000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离开中国，叶永青一家返回挪威休假。
1936 年 - 1937 年	蒋介石国民党建立起一党专政独裁政权。
1937 年	时局好转，叶永青一家返回中国。
1937 年	在河曲出现多年的复兴。
	叶永青一家在挪威休假。
	7 月份日本侵华。
	尽管在战争期间，叶永青一家从挪威返回中国。由

	于山西已经出现战争，瓦波格带着四个孩子前往位于湖南的挪威学校，而彼得尝试回到河曲，但未能成功。
1938 年	彼得于年初抵达河曲，由于日军向湖南逼近，挪信义会决定把学校转移到香港。
1939 年	在最后一学年，挪威流亡学校关闭，叶永青的孩子们转移到山东芝罘的中国内地会学校。
1939 年	彼得夏天从河曲前往芝罘与家人团聚。 <i>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i>
	叶永青四个孩子离开芝罘，彼得和瓦波格返回河曲。
	彼得 47 岁死于一次日军轰炸。
1940 年	瓦波格留在河曲牧养信徒，他们失去了教堂和城镇，还有牧师。她于夏天回到芝罘与孩子团聚。
1940 年	德军 4 月入侵挪威，挪威流亡政府在英国加入盟军。
1941 年	<i>珍珠港被炸，所有盟军国家的公民被日军俘虏。</i>
1942 年	在芝罘的中国内地会学校和所有盟军国家的公民被押送集中营。
1943 年	所有芝罘的俘虏包括叶永青一家被转移到潍县，1600 个俘虏在那里被关押到战争结束。
1945 年	叶永青一家以及其他俘虏被盟军解放，并开始出发前往北美。
1946 年	6 月瓦波格和托杰回到挪威，哈肯和凯莉留在美国读书，爱德华和詹妮预备到中国内蒙古。
1948 年	爱德华和詹妮出发前往中国开展彼得未尽的蒙古宣教事工。
1949 年	政治和军事事件迫使爱德华和詹妮从中国大陆转移到香港，在那里协助建立蒙古研究所。 瓦波格和托杰抵达美国，托杰读大学，瓦波格依然希望在看望美国的孩子之后能够回到河曲。 <i>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i>
1950 年	瓦波格和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一起查经学习。
1952 年	爱德华和詹妮移居台湾，继续在蒙古人中间开展事工，并邀请瓦波格前来协助中国难民。
1956 年	瓦波格回到明尼苏达华人圣经班，后来这里成为一间华人教会。
1966 年	瓦波格在 73 岁时从中国留学生事工中退休回到挪威生活。她为宣教 45 年并忠心服侍中国人而感到无比荣耀。
1970 年	瓦波格去世，享年 78 岁。
1980 年	中国的大门奇迹般地再次打开，叶永青家的四位成

1990 年

员回到故乡河曲。

在叶永青葬在河曲 50 年之后，当地为他立碑纪念。

(全书结束)